

第46卷第2/3期 (總第247期)

2020.2.20

每冊港幣30元



香港人抗爭的破與立
新冠肺炎：再次反思新自由主義與生態斷裂
氣候搶劫的政治
今日拉美之左派和右派：克勞迪奧·卡茨訪談
從信奉托洛茨基主義到追尋土著力量
竭力尋求社會主義
托洛茨基：民族主義和經濟

香港人抗爭的破與立

小點

踏入2020年，超過100萬香港市民無懼政權暴力威脅，上街示威遊行，延續著從去年6月以來的大規模動員。抗爭運動的口號，也從香港人加油演變為香港人抗爭。

警察越來越暴力的鎮壓，特別是11月對中大和理大的狂暴進攻，讓運動越來越認識到雙方武力懸殊，以武抗暴代價沉重，不能解決問題，運動需要另找出路。

抗爭運動從街頭走進社會的轉捩點，是民主派在11月區議會選舉大勝，與此同時，黃色經濟圈開始流行，工會更成為重要組織方向。這幾方面的發展，讓抗爭運動從街頭反抗暴政，深化為在社會多方面組織力量，走向更深層更持久的抗爭，從破走向立。

破，是打破政治冷感，擺脫依賴惰性，不再接受現行制度秩序，反抗政權和既得利益者精英統治。

立，是行動起來，團結、組織自主的力量，探索民主、自治的途徑，本著良知、博愛，爭取一個能尊重生命、彰顯公義、貫徹公平的新社會。

破，正如香港警察的聲譽「一舖清袋」，可以瞬間發生。

立，卻不能一蹴即就，需要長時間艱苦建立，是一個起伏不一的持久過程。在缺乏清晰的前景和途徑的情況下，更需要參考歷來世界各地抗爭例子，例如羅賈瓦(Rojava)的自治經驗，迂迴探索反思，從多番失敗與成功經歷之中，積累經驗教訓，爭取美好的將來。

從抗到爭的發展

抗爭運動的口號，從香港人加油、反抗、報仇，演變為香港人抗爭，反映著運動不同的階段。



香港人加油，源自6月反送中兩次過百萬人的示威。雖然迫使政府暫緩修例，但在北京加強「全面管治」的路線下，香港政府也嘗試以更多途徑加強鎮壓。

7.21是一個轉捩點。港府除了以「暴動」罪名加諸在西環示威的「暴徒」，更讓元朗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市民，警察袖手不理。警黑合作，並沒有取得震懾的效果，反而導致警民關係決裂，抗爭口號也改為香港人反抗。

港府不但沒有退讓，反而採取了不斷升級的武力手段，「以暴製亂」，警察越來越多使用催淚彈、布袋彈、橡膠子彈以至實彈鎮壓，加上喬裝挑釁、縱容黑幫橫行、使用法庭禁制令等，多方面打壓市民，造成了不歸的局面。尤其令人憤慨的包括8.31太子地鐵站警察恐怖襲擊市民、封

鎖消息，10.1真槍擊傷中學生，還有懷疑陳彥琳、周梓樂及其他人被警方殺害、被自殺、被跳樓，還有更多的被捕者被私刑、被強姦等等，激發香港人要報仇。

警察狂暴的鎮壓和市民武力反抗，在11月警察攻打中文大學和圍堵理工大學達至高峰。中大對峙當天，警察在全港共發射了4,693發彈藥，包括2,330發催淚彈，理大圍城第二天更發射了7,647發彈藥，包括3,293發催淚彈。從6月至11月底，共發射29,863發彈藥。到今年1月15日共拘捕7,019人，學生佔4成。

持續多月的警察暴行和香港人——特別是年青人——的英勇抵抗，在各國媒體的廣泛報導下，在國際社會造成重大反響。美國一項民調顯示，超過一半人同情抗爭者，迫使美國國會和特朗普迅速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香港政府和背後的北京政權也不得不暫時收斂瘋狂的暴力場面。

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取得壓倒性勝利，建制派大敗，清晰地反映了市民對政府的取態。

然而，中港政權並沒有改變鎮壓市民的路線，只是採取了較隱蔽和多方面的恐嚇，包括以大規模包圍拘捕來震懾抗議的市民，加強對公務員、教師和其他階層的恐嚇，以及打擊星火同盟、凍結其戶口等等。

今年元旦，超過100萬香港市民無懼政權暴力威脅，上街示威遊行，延續著從去年6月以來的大規模動員。抗爭運動的口號，也演變為香港人抗爭。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被駱惠寧倉卒取代，反映北京不滿中聯辦之前的做法，希望駱能改變局面。然而，在加強全面管治權的大前提下，儘管作出小恩小惠籠絡人心，但政權以武力鎮壓的政策並沒有改變。即使北京有意在經濟民生上作出改善，但在各方面既得利益勢力抗衡下，任何解決經濟矛盾的措施也會成效有限。更何況這次抗爭運動的目標和動力並非直接是經濟性的，而是從一開

始的反修例的政治要求，進而是反抗警察和政府的暴力鎮壓，主要動力更是對前線抗爭者的人道同情支援。

政權的鎮壓和市民的反抗，逐漸形成長期拉鋸的局面。

從街頭抗爭到社會組織力量

抗爭運動從6月大規模爆發到7月1日佔領立法會，顯示了光是和平遊行是不足夠的，「是你教我們，和平示威是沒有用的」。勇武抗爭者武力對抗政權，和理非也諒解、同情和以各種方法支援前線武力抗爭。

警察越來越暴力的鎮壓，到11月對中大和理大的狂暴進攻，讓運動越來越認識到雙方武力懸殊，以武抗暴代價沉重，不能解決問題，運動需要另找出路。

抗爭運動從街頭走進社會的轉捩點，是民主派在11月區議會選舉大勝，與此同時，黃色經濟圈開始流行，工會更成為重要組織方向。這幾方面的發展，讓抗爭運動從街頭反抗暴政，深化為在社會多方面組織力量，準備走向更深層更持久的抗爭。



民主派在全港18個區議會之中取得17個的大多數，這個重大勝利，是廣大市民向政權表態，實質上也讓民主派主導了未來四年的區議會運作。以往區議會被建制派壟斷，控制地方資源，扶植親政府組織，削弱居民自發的動力，避免居民起來爭取權益。現在有機會讓區議會民主化、資訊透明化，讓資源可以由居民善用、監察，啟發市民大眾對民生議題干預的動力和進行組織，讓政治進入社區，與民生結合起來。

黃色經濟圈，又叫良心消費圈，在抗爭運動開始後不久已被提出，網店、團購已開始籌備。近月來，市民標籤餐飲及其他黃店，大排長龍進行「懲罰」，更是在多區出現。建制派、港府以至北京都大為緊張，口誅筆伐之餘，更抵制其供應鏈甚至破壞黃店，恰恰顯示其潛在的重要性。黃色經濟圈頂著各種障礙打擊，仍然堅持下去。在貨幣金融方面也出現從中資銀行調走存款和將港幣轉換美金等行動，希望加強壓力。社區貨幣也被提上議程。這些發展儘管仍在初步階段，面對不少困難，但也顯示了市民嘗試以消費者的身份進行抗爭。

工會是工人運動傳統保護自己對抗資本家的方式。去年8月5日三罷，估計有數十萬市民參加罷工罷課罷市。不同行業和階層的市民，其後也繼續在努力嘗試組織起來。今年元旦遊行首次由工會帶頭，標誌著經由工會組織生產者的方向。將政治抗爭與工運結合的新舊工會，更具有重大意義。官方數字顯示去年下半年有近100個新工會申請。在《二百萬三罷聯合陣線》中，去年底有49個工會，新成立或籌備中的工會有18個，新工會總人數超過6,000人。今年1月底，單是《醫管局員工陣線》的申請人數已超過15,000人。

在社會各方面組織力量的嘗試，結合著抗爭運動一直以來的和平示威、連儂牆、人鏈、各種「和你」行動、民間記者會、本地和國際文宣等活動，令運動逐漸深化，積累更強大堅實的持久抗爭力量。



抗爭運動的破與立

半年多的抗爭運動，市民，特別是年青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也成功迫使港府撤回送中條例、推出一些籠絡人心的小恩小惠等，更讓民主派在區議會選舉大勝。然而它的深層意義遠遠不止於此，而是在於它的破與立。

破，由港府、建制和背後的北京政權一手推動。從政府當初強推逃犯條例，繼而以不斷升級的「以暴製亂」，「以法治國」，對市民，特別是年青人，造成巨大打擊、創傷，令社會重大撕裂。其所作所為，令更多人認識到統治者暴力的真面目。真正的暴徒就是這些統治者。最想社會特赦的，正是這些建制當權者。

破，不斷以血、淚、自由以至生命的代價，在網上、在直播鏡頭前，讓大多數市民看到這個政權、建制的狂妄、虛偽、荒謬。議會由建制把持，立法淪為花瓶；政權橫行，行政專斷跋扈；警察、律政、法官操控法治，司法的不公義，隨處可見。

破，是打破政治冷感，擺脫依賴惰性，不再接受現行制度秩序，反抗政權和既得利益者精英統治。

立，是行動起來，團結、組織自主的力量，探索民主、自治的途徑，本著良知、博愛，爭取一個能尊重生命、彰顯公義、貫徹公平的新社會。

行動！不單是一百萬、二百萬人上街和平遊行，不單是成千上萬從青年到銀髮、醫護、記者

以血肉抵擋警棍、催淚彈、子彈，不單是165萬人以選票抗議現行政制，還有無數市民不斷以金錢、物資、精神支援抗爭前線，以各種文宣在本地和國際上推廣抗爭，以及在社區、消費圈和工會組織抗爭力量。

團結！汲取了2014年雨傘運動的教訓，抗爭運動打出「不割席、不分化、不篤灰」的口號，在持續鬥爭中不斷抵抗各種各樣的分化，跨越不同階層、性別、年齡、種族、宗教、文化的分野，促進「和勇一家」，形成「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凝聚為抗爭共同體。團結的動力也讓運動探索如何對不同意見、策略、方向，作出檢討和批評而不分化。無疑，團結抗爭的努力是會不斷受到內外既得利益者或野心精英分化、破壞，例如當權者以至各方勢力吹噓港獨、強調國家，要將「身份認同」轉變為「身份政治」，以分化香港市民與內地受政權鎮壓和蒙騙的人民。以局部的團結將其他人分化、區隔，正是統治精英為了自己而損害他人利益的恆久技倆。團結與否，是被統治者與統治者漫長鬥爭的過程。

組織！勇武抗爭者沉重的代價，促使社會努力嘗試在社區、經濟圈、工會組織力量，結合著抗爭運動一直以來各方面的行動，令運動逐漸深化，減少在街頭對抗警察暴力所帶來的打擊和傷害，同時也可能減少部分激進抗爭者走向恐怖手段和城市遊擊戰的吸引力，讓運動可以連結更廣泛層面，積累更強大堅實的持久抗爭力量。

自主！2014年提出的「命運自主」，也是今次運動的重大議題。政權、警察不斷升級、毫無節制、強弱懸殊的暴力打擊，令人們尋找任何可以制止統治者暴力的方法，在國際社會尋求支援，爭取到美國國會和特朗普緊急通過制裁法案，令港府和北京稍為改變策略，更多以其他方式打擊抗爭運動。但與此同時，特朗普在羅賈瓦突然撤軍，背棄了主力打擊伊斯蘭國的敘利亞民主力量，也令不少人起了戒心，強調最重要的是群眾要建立自主的力量，只有這樣才能打破被人即用即棄的避孕套角色，在兩害取其輕的選擇之外，以群

眾自主的第三力量，反抗各方統治者。

探索！19世紀以來，社會主義開啟了人民爭取美好將來的前景。20世紀兩次大戰的資本主義殺戮，促成1917俄國和1949中國革命以及其他殖民地解放運動湧現。但斯大林主義嚴重破壞了這個前景。隨著蘇聯陣營瓦解和中共走向一黨專政的國家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更被吹捧為獨領風騷。各地人民反抗統治者的鬥爭在缺乏前景的情況下，更艱苦地探索能真正符合自己持久利益的方向和途徑。現代科技幫助了資本主義全球化、金融資本壟斷和統治者監控人民，但同時也提供了各地群眾動員抗爭的平台。21世紀資本主義危機加劇，全球社會矛盾不斷爆發。各地群眾抗爭經驗的積累、傳播，幫助了被統治者對美好將來的探索。



民主！激發香港市民起來反抗的逃犯條例，背後是內地的不民主實況。回歸22年，特別是這半年多，揭示了港式民主的真面目。抗爭運動讓香港市民嘗試建立基層大眾去中心化的多元民主。運動也在探索如何對選出來的代表和賦予公職人員的權力作出監察，包括必需的新聞自由、資訊透明度、公眾知情權等。對2014年「大台」的爭辯，固然顯示了一些人要築起自己的「小台」，但更反映了大眾對由上而下的精英的不信任，要避免他們利用大眾和阻礙大眾發展創意和動力。「兄弟爬山，各自努力」，背後是對各種行動和

理念的理解和兼容。更具深層意義的，是運動在探索如何處理社會上無可避免的多種利益、理念、文化、傳統等的存在，讓大家團結在一起，和而不同地組成一個由市民主導的多元社會。同樣要探索的，是各自努力與齊上齊落、民主與統一行動、自由與紀律、個人與集體之間的關係，在捍衛個人自由的同時，如何與集體結合，如何從集體利益中體現個人自由。

自治！人民的真正自治，是北京以至全世界統治者最害怕的；人民起來爭取自治的抗爭，是統治者最要暴力鎮壓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50年不變」，是中英統治者當初彼此的妥協，也是給予香港人的糖衣。現實是北京越來越要主導統治香港。「國家主權」成為統治者和精英鼓動、鎮壓和分化兩地人民的工具。自治成為政權越來越飄渺的承諾，卻也可能成為香港市民抗爭的前景和途徑。真正自治的力量，需要市民團結組織起來，是一個漫長艱苦的過程。自治的區議會、黃色消費圈、更政治性的工會等，都開啟了新的自治組織途徑，未來更有可能嘗試例如有機農業、良心環保工業、社區互助維修、運輸等的黃色生產圈，擴大自治的範圍和力量。

良知！是人性，是對大是大非的基本判斷。「黃藍是政見、黑白是良知」。抗爭運動不斷超越個別利益的考慮，讓良知浮現出來。

博愛！是對大家的關懷、愛護，也是潛藏的基本人性。在持續抗爭的過程中，特別是對前線抗爭者的同情和無私的支援，抗拒著資本主義你死我活的競爭、分化和對人性的壓抑。

尊重生命！對比著統治陣營的“甲由論”、“黃色物件”等滅絕人性的價值觀和對人權的踐踏，是抗爭者在整個過程中不斷顯示對生命的尊重和珍惜，對個別過火行為的批評也很多從這點出發。要捍衛人權，要尊重和珍惜生命，還要包括尊重和珍惜對所有生命賴以生存的整個地球生態，要制止人類造成的全球氣候轉變和對生態的破壞。香港人的抗爭與世界各地，特別是年青人，對氣候轉變的抗議，都是否定資本主義競

爭至上、唯利是圖的邏輯，要發展另一套讓生命能與地球持續共存的價值觀。

彰顯公義！支持抗爭者持續下來的重要推動力，是在傳媒、直播眼見的整個政權建制的不公義、目無法紀。捍衛新聞自由、求證和紀錄真相，令公義得以彰顯，成為抗爭的特點之一。然而，現有的法制基本上仍是基於保護統治者利益的法律。要推翻政治精英統治，由市民制定捍衛大眾利益的法律和監察它的施行，才會實現真正的法治，真正彰顯公義。

貫徹公平！現實中的「勝者為王」、「輸在起跑線」、「強權就是真理」，反映著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傳統等各樣不平等、歧視。自古以來的父系社會、封建傳統、特別是資本主義，都是公平的大敵。要消除對性別、年齡、種族、宗教、文化、教育等歧視及背後既得利益和根源，要靠被歧視者的抗爭，也要社會接納多元，幫助受害者共同爭取，才能貫徹公平。



共同爭取美好的新社會

破，正如香港警察的聲譽「一舖清袋」，可以瞬間發生。

立，卻不能一蹴即就，需要長時間艱苦建立，是一個起伏不一的持久過程。在缺乏清晰的前景和途徑的情況下，更需要參考歷來世界各地抗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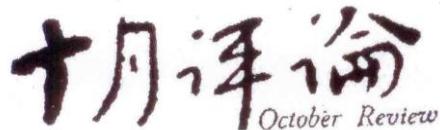
例子，迂迴探索反思，從多番失敗與成功經歷之中，積累經驗教訓，爭取美好的將來。

環顧世界，2011年阿拉伯之春，開啟了全球新一輪抗爭。儘管未能取得重大成果，仍然留下經驗、教訓。2019年各地廣泛的抗爭浪潮，顯示資本主義危機深化，大量群眾，特別是年青人，起來反抗統治政權、抗議經濟危機、全球暖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羅賈瓦的經驗。從2011年敘利亞內戰爆發到現在仍在努力奮鬥的羅賈瓦自治運動，結合庫爾德、阿拉伯和其他民族，在組織“人民保衛力量”和“婦女保衛力量”對抗侵略的同時，強調地方自治、婦女解放、民族共融，推行以合作社為基礎的各種民主自治機制。羅賈瓦自治經驗，值得我們深究與借鑒。

回到香港，2014年雨傘運動被鎮壓下去，卻觸發2016年魚蛋革命的勇武抗爭。2019年以來大規模群眾對抗政權的抗爭，亦顯現了彼此在武力上強弱懸殊和勇武抗爭的局限。踏入2020年，抗爭運動在無忘初心、堅持五大訴求之餘，實際上正在建立群眾自主的基層力量，發展、探索、反思未來的路向和前景。

香港人持續的抗爭，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嘗試，譜寫著歷史的一個章回，也會啟發全球各地群眾互相交流反抗統治、爭取自主的抗爭經驗、教訓，共同為一個美好的新社會加油努力！

2020年1月31日



第46卷第2/3期（總第247期）

2020年2月20日出版

出版/編輯/承印：《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 號

Address: GPO Box 10144, Hong Kong

E-mail: octoberreview@gmail.com

Website: <http://www.october-review.org>

[本刊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敬愛的讀者：

大家好，我們將會推出《十月評論》紙質版與電子版。懇請選擇《十月評論》版本及填寫閣下的聯絡方法，謝謝。

- 紙質版
- 電子版
- 紙質版與電子版
- 不需要了

聯絡方法：

姓名：_____

電郵：_____

郵寄地址(如有改變)：_____

回覆請寄：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十月評論》

或電郵：octoberreview@gmail.com

《十月評論》

網址：<http://www.october-review.org>

Dear Readers,

October Review will publish both a printed version and an electronic version. Please kindly choose your preference and fill in your contact informa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 Only a Printed Copy
- Only an Electronic Copy
- Both a Printed Copy and an Electronic Copy
- None

Your contact information:

Name: _____

E-mail: _____

Mailing Address (if changed): _____

Please send your reply to:

October Review, GPO Box 10144, Hong Kong
or by E-mail: octoberreview@gmail.com

October Review

Website: <http://www.october-review.org>

權力歸於人民、實踐地區民主 —— 區議會改革芻議（轉載） 社會民主連線

借波瀾壯闊的反送中運動之勢，民主派力量在區議會選舉大勝，18個區議會中，取得17區的議會多數，160萬民主派選民，以選票對林鄭政權、警察以及助紂為虐的建制派狠狠的掌摑一巴！今次區選大勝，是半年來香港人抗爭運動的成果。港人爭民主反暴政的意志，以選票化為議會的勝利，更重要是，街頭抗爭並未止息，港人動員波濤不斷，抗爭運動既要化零為整，同時也需化整為零。各區區議會的所在地，正是「零」的部份，沒有活力充足的「零」，便不可以有強而有力的「整」體進攻。因此，民主派主導的區議會，必須站在民主抗爭運動的前沿，以議會配合和促進港人爭民主反暴政的洪流，以地區為基礎，凝聚民意，組織抗爭力量。過去，區議會在政府和建制派的操控下，淪為中共和政府的應聲蟲，為惡法苛政搖旗吶喊，地區權力和資源分配，變為政治酬庸，利益輸送，權力分贓的場地。今天，必須改弦更張，區議會擴權革新，迫在眉睫，我們在此有以下幾點建議，希望能回應區議會在新形勢下，應該肩負的任務：

1.毋忘初衷，「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今屆區選大勝，正是變相公投的勝利，民意授權清晰。在四年任期内爭取落實「五大訴求」，是所有民主派區議員的當然任務。設立常設的監察警權工作組，監察及調查跟進區內警方濫權及違反人權行為的投訴；並透過議會提案、地區公投等等議會內外的行動，活化「五大訴求」在區內的討論和動員，凝聚成全港性民主運動的堅實力量。

2.爭取強化地區行政權力，增加區議會財政權：特區政府2000年殺局時，訛稱會將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的權力下放區議會，但是食言至今。區議會作為一個全民選的地區議會（當然議員除外），有民意授權作基礎，地區行政權力必須比地區政府部門為大，改變妹仔大過主人婆的局面。

2.1賦予地區行政實權：就地區內公共設施、醫療、福利、文化、康樂、環境衛生和地區工程等項目的興建和服務提供，擁有規劃、制定先後次序、

審批、推行、管理和人事任免的權力。相關的政府部門以其專業協助議會執行。

2.2獨立財政權：政府應撥出一個百分比的差餉，劃歸區議會自主運用；區議會轄下的文康場地收費亦撥入區議會的財政收入。在實現財政獨立之前，政府增加對區議會的撥款，包括「社區參與計劃」及「地區小型工程」項目，增加後者的項目撥款上限至5,000萬元。

3.民主區政：區議會行政和財政權力增加，必須要獲得更大的市民認授和監察。區議會事務與區內市民息息相關，有利於實行直接民主。

3.1設立廉政工作組：監察及檢討區議會的撥款和利益申報程序、規則是否合乎公平、公正及公開的原則；並對投訴作出跟進調查。

3.2民選區議會：取消當然議員和增選議員。在區議會屬下的工作組，可委任與工作有密切關係的人士作委員，但只是諮詢的顧問角色。

3.3增加會議透明度，例如直播會議，會議逐字紀錄，容許新聞界及地區人士列席旁聽。包括區議會大會及屬下工作組。公開重大工程項目和服務提供的財務資料，包括合約、標書、財務評估等。

3.4直接民主：重大的政府政策、地區工程項目和公共建設必須以地區公投等方法諮詢民意；設立地區市民提案權，容許獲得一定百分比當區市民提名的提案必須在區議會內討論；改革「社區參與計劃」，成立包括地區市民和團體在內的遴選委員會，審批項目及制定年度優先次序和比重。

3.5強化監察制度：特別是重大的地區建設和服務，以量性及質性評估準則，衡量項目效益。

4.設立區議員平台：18區區議會雖然各有地區特色和需要，但是，區政不少是涉及全港性政策，以及區議會共同面對的問題。成立區議員平台，協調及討論合作項目和提出建議要求。

5.民生項目：討論及跟進涉及重大民生的項目，例如回購領展、港鐵；全民退保、租金管制等。

新冠肺炎：再次反思新自由主義與生態斷裂

青岩

2020年新春，中國湖北省武漢市爆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瘟疫擴散。

根據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官方網站，截至2月18日24時，據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報告，現有確診病例57805例（其中重症病例11977例），累計治癒出院病例14376例，累計死亡病例2004例，累計報告確診病例74185例，現有疑似病例5248例。累計追蹤到密切接觸者574418人，尚在醫學觀察的密切接觸者135881人。累計收到港澳臺地區通報確診病例94例：香港特別行政區62例（出院4例，死亡1例），澳門特別行政區10例（出院5例），臺灣地區22例（出院2例，死亡1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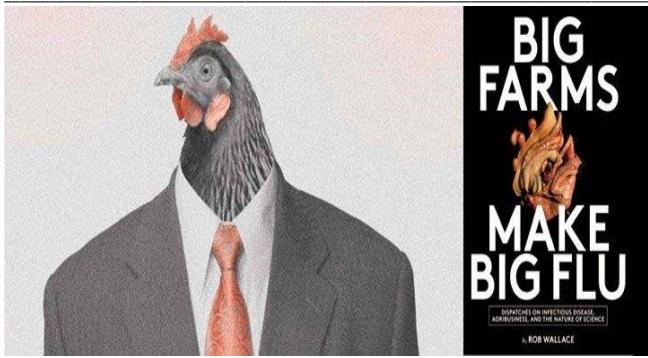
新冠肺炎疫情勾起人民對抗2003年非典以及2009年甲型H1N1流感的回憶。以下引述美國生態學家羅布·華萊士(Rob Wallace) 與鍾南山院士及其課題組反思兩次瘟疫的文章，對照當下，值得借鑑。

華萊士在《大農場製造大流感》(2016)*(Big Farms Make Big Flu)*撰寫人畜共患病的威脅日益加大與新自由主義所推崇的現代農業實踐之間的關聯，特別是跨國農企業的擴展與歸併，以及食品生產不同階段的垂直整合。我們吃到的食物越來越集中於大規模生產的企業，成群的不同的動物擠在畜棚裏，被迫在短短數月內快速生長至成熟，然後被屠宰加工，最後運往世界各地。這些不同的動物逐漸趨於基因相同，面對感染的病原體，並無免疫，再者，長期共處而交叉感染，病毒隨之進化。大多數新的菌株沒辦法打破物種的差異，直接作用於人類，但是持續的進化終有突破這道防線的可能。

華萊士指出，疾病的根源是複雜的。埃博拉”最早是在埃博拉河地區(現屬民主剛果共和國)識別的，他認為這種基於絕對地理的命名沒什麼用處，但是從關係地理的視角看待這個問題，信息量就很大。濫伐森林以便於從事伐木和採礦作業，其結果是導致人類與蝙蝠的接觸機會增加，而後者是埃博拉病毒的自然宿主。多年來，當地忙於推進經濟結構的調整，忽略公共衛生服務建設，情況變得更加糟糕。為了償還調整結構所需的貸款，生產經營收益源源不斷地流向世界金融中心：倫敦或紐約。

華萊士認為要讓疾病的命名包含真正的資訊要素，那麼“豬流感”應該叫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流感”。這場流感的病毒接近1918年病毒，當時是鳥類傳染給人類，後來又影響到豬，2009年以前，病毒已經在豬體內進化幾十年。第一例

“豬流感”在墨西哥境內發現，許多媒體不約而同地稱其為“墨西哥流感”。華萊士認為，1992年通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廢除保護性關稅，小農生產者迫於競爭壓力而虧損破產，或者被大型企業吞併，高度整合導致豬群中的多樣性受到侵蝕。華萊士判斷，沒有<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就不會出現2009年的“豬流感”。



另外，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呼吸系統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主任、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院士及其課題組，在《廣東社會科學》2005年第1期，發表《抗擊SARS實踐與新人文精神的思考》。該文指出SARS乃“生態斷裂的結果”，也是“環境病、城市病和生態病的發作，也是人文精神疾病的發作”之例證，全文歸納有以下三個重點：(1)維護公共醫療系統；(2)關注人與自然環境關係；(3)推動可持續發展與生態文明。儘管文章並沒有直接批判新自由主義，但卻直斥其核心價值：公共事業私有化、市場經濟壓倒一切、城市工業文明優越等。以下引文可印證：

(1) 維護公共醫療系統

- SARS事件警示我們：經濟發展並不等於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並不等於人的發展。著眼於人的全面發展，我們必須把人的健康納入科學管理的視野，下大力氣發展公共衛生事業，修正、完善醫療衛生制度和社會保障體系。
- 一味強調發展經濟，將市場規則引入醫療衛生事業，我們的工作出現了偏差：國家減少了對公共衛生系統的投入，在實踐中「重治輕防」。影響最深的是基層，特別是農村和貧困地區的醫療衛生發展滯後，醫療市場因過度市場化而導致群眾「看病貴」。SARS及其後的禽流感告訴我們，構建、編織一張遍佈全國城鄉、運作高效、銜接有序的醫療衛生網路，這是健全的社會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因為在這個社會，如果發生流行性疾病的威脅，就沒有哪個地方是特別安全而可置身事外的，每個人的健康與安全得到保障，才有社會的健康和安全。

- 建國初期，我們在短時間建立了遍及全國的三級醫療預防網，大搞愛國衛生運動和群防群治，在經濟困難，投入小的情況下，在遏制傳染病流行、提高人民健康水準方面，做出了舉世矚目的成績。
- 「修正」、「完善」醫療衛生制度和社會保障體系，就是國家要加大對醫療衛生尤其是公共衛生的投入，避免放任醫療機構過度市場化，把以往片面突出的「醫」和「療」改為強調「預防為主」；同時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構築保護弱勢群體、農村和貧困地區的防火牆，化解社會風險，營建和諧社會。

(2) 關注人與自然環境關係

- 有一個認識誤區需要指出：果子狸並不是SARS病毒的「罪魁禍首」，牠是人們不健康飲食方式的「受害者」。SARS事件使我們相信，人類與傳染病的鬥爭將是艱難的、長期的鬥爭。因為，隨著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和人類社會的進步，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行為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其中很多因素助長傳染病的傳播，如由於人口流動頻繁，增加了人群的接觸機會；色情服務、多性伴侶促進了性病傳播；食品工業化生產中加溫不足、消毒不嚴發生的食物中毒；醫院中廣泛採血、輸血、透析引起的血源性疾病傳播；濫吃野生動物導致病原微生物在不同的宿主中進化繁衍；城市建築過於密集，公共設施承載超負荷等。要改善我們的生存境況，營造健康的生活環境，必須審視自我，養成科學的行為方式。
- SARS的爆發告訴人們，自然環境是絕對不容忽視的因素。其實，早在SARS發生之前，人們就一再接到同樣的警告，諸如森林面積減少、植被破壞、水土流失嚴重、荒漠化遞增，乃至大氣中的臭氧層被破壞，全球性氣候變暖等等，這樣的報告不絕於耳，只不過還沒有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罷了。SARS對人的生命構成直接威脅，其警示作用足夠大了。雖然對SARS冠狀病毒產生原因的研究還未有定論，但不少醫學界人士認為，很可能與環境有關。

- 人類社會步人工業時代後，以人的欲望無限擴張為內核的物質主義和以人的意志過度放大為內核的「征服主義」，使人在永不停頓獲取更多物質的對客觀外界的征服和索取中，不知不覺地滑到了與自然為敵、從而反過來受到自然報復或懲罰的可怕淵藪的邊緣。
- 在現代社會，發展的標準更重要的是與自然和諧，共同獲得發展的可持續性。這意味著談發展一定不能離開自然的基礎，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不可超越地球的容納度。在人口增長使地球不堪重負的情況下，發展只能是滿足人的正當需要而非所有需要。人的正常需要不是完全由人自身盲目定義的，生產力發展如果被用來生育更多的人口，並且用於滿足那些違背自然精神的奢侈欲望和高消費、高浪費等「需要」，這必然超出地球生態系統的限度而使其崩潰。這從自然的角度看是缺乏正當性的。
- 也就是說，需要和發展等都要放在地球生態系統中考慮，以維護自然與人及人類社會的平衡為依歸。簡言之，關注自然環境是與經濟、文化、政治發展密切相關的科學發展的第四維視野，對此，我們必須予以足夠的重視，否則，仍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發展觀。
- 人類征服自然呈現全球性、快速性和空前破壞性的特點，致使自然界向人類發出了生存危機的警報。從現在起，我們必須摒棄輕視自然、以征服者姿態對待自然的惡劣態度，必須高度重視環境保護和生態平衡，做到與大自然和諧相處，堅決摒棄人類中心主義。必須節制生育和控制人口，宣導可持續消費，必須顛覆「高資本投入、高資源消耗、高污染排放」的發展模式，大力發展迴圈經濟和生態產業，實現可持續發展。
- SARS 首先在中國城市的環境下觸發和迅速傳播的，主要流行於人口密度較大的大、中城市，暴露出城市發展中不顧自身現實環境的平衡與和諧問題的嚴重性，是「城市綜合症」的通病性缺乏系統性醫治的表現，是城市發展觀偏移的後果。作為工業化基地及人類文明象徵的城市，已成為人類主要居所，城市生態系統構建對公共健康和人民健全的生活的關係日益重要。綠色城市理念立足於人的本性及其實踐的本性，將城市看作人類實現其本性的實踐和文化成果，促使人們同時關注居所的自然性和社會性及兩種屬性的融合，具有概括人類從灰色的生態系統走向綠色的生態系統，即人與自然和諧這種理想指向。

(3) 推動可持續發展與生態文明

- 人類的生存環境與其健康的關係實質上是生態平衡關係，疾病病因模式表明，任何流行的發生發展或多或少地與環境發生聯繫，SARS 事件就是一個典型案例。研究表明，SARS 病毒是由動物宿主傳給人的，但如果沒有生態環境整體上的巨大變異，SARS 不可能大規模流行。所以學界傾向於 SARS 事件是生態斷裂的結果，在社會學和文化學意義上，它是近代以來的工業文明征服自然的過程中，人類自然倫理和社會倫理扭曲，千萬地球生態圈結構及其一些要素和環節發生惡性變異的結果。所以環境病、城市病和生態病的發作，也是人文精神疾病的發作。

資料來源:

- (1) 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官方網站，
<http://www.nhc.gov.cn/xcs/yqfkdt/202002/8f2cf17f4c040d89c69a4b29e99748c.shtml>
- (2) “【武漢肺炎】病毒幽靈再現 鍾南山：我們是否吸取沙士教訓？”，<https://www.hk01.com>。“公共健康：“西班牙流感”的出現與疾病的命名”，斯揚/編譯，摘自科學撰稿人、The Spanish Flu of 1918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一書作者Laura Spinney 發表在 www.aeon.co 上的文章“Who Names Diseases？”，《文匯報》，2017-06-20，<https://cul.qq.com/a/20170620/021721.htm>

氣候搶劫的政治

亞當·狄倫·赫夫蒂

2018年10月8日，在世界兩端，宣佈了雙重災害消息：

- 在巴西，從第一輪總統選舉開始計票，賈爾·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贏得了46%的選票-足以表明他很可能在三周後獲得第二輪勝利。

- 在韓國仁川，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披露特別報告的結論：要將全球變暖限制在 1.5°C 以下，須在當代時間內，“要求社會各方面進行迅速，深遠和前所未有的變化”。[1]

這是知識分子悲觀的標誌性時刻。我們將需要進行反右翼民族主義的鬥爭，挫敗其反動的氣候政策並採取理智的做法，這樣的歲月是我們所沒有過的。隨著時間的流逝，這兩種災難交相回饋互動，每一個都使得另一個更難解決。
[2]

由於氣候變化助長現實中和想像中的社會緊急情況，在缺乏基於群眾的團結政治的情況下，基於恐懼，呼籲使一個社區獲得資源以抵禦其他社區的需求，引起了許多人的共鳴。當然，諸如巴黎協議之類的中間主義措施從來都不是寄予希望的理由—即使創造這些措施的世界政治並未因右翼民族主義的興起而被拋棄。

博爾索納羅直接針對亞馬遜雨林和居住在那裏的土著社區。他上任後不久，就簽署行政命令，將對土著保護區的監管移交給農業部，該部受制於農企業的利益，儘管此舉後來在國會受到挫折。在他當選的鼓舞下，特別是在投票支持他的地區，暴徒團夥的非法砍伐和掠奪活動增加了，對土著社區的襲擊也增加了。

博爾索納羅政府成員已向非土著人民開放農業和採礦權，認為這將使土著人民從其土地中獲得經濟利益。高級顧問奧古斯托·赫勒諾·佩雷拉將軍（General Augusto Heleno Pereira）否認亞馬遜是世界遺產的看法，呼籲發展並主張亞馬遜“應由巴西處理以造福巴西。”[3]

很難找到更清晰的例子，說明大衛·哈威（David Harvey）所謂的“通過佔有而積累”，在這種情況下，公共和自然資源被經濟以外的手段（有時是法外手段）加以徵用，以促使進一步的開發。[4]

哈威認為，合法正規地剝削工人的勞動只是資本積累的動力之一，正在進行的資本主義進程也依賴於馬克思所謂的“原始積累”，即通過公共物品私有化，軍事和准軍事徵用以及盜竊等手段積累資本。

哈威主要使用此概念來分析新自由主義政策（例如私有化和金融化）的動態，但似乎同樣適用於各種私人利益（通常與國家政府內部的要素有密切聯繫）在面對氣候危機的時候，以合法乃至法外手段佔有自然資源。

資源掠奪遭遇氣候否認

在全球範圍內，博爾索納羅的明確議程是掠奪世界自然資源，並確保“我們”的生存和財富，對抗與氣候變化有關的“他們”，這議程不是孤立的問題，而是民族主義極右翼讓氣候與地球一起變化的方法。

傳統上，氣候變化活動分子要求世界清醒認識到氣候變化的現實，而否認氣候變化者則將自己的頭埋在沙子裏。一些大型石油公司和工業污染企業過去慣於屈服或提倡氣候變化否認主義，如今，已經接受緩解環境損害並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對其定價的語言，而否認氣候變化主義則成為像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這樣的公開報仇者的庇護所。

然而，即使對於他們來說，否認氣候變化主義也已經成為小圈子受眾的資訊---煽動基層的肥肉，而在他們的背後，他們卻引導著掠奪性的積累形式。對於許多傾向於新法西斯主義或右翼民族主義的主要社會團體來說，面對氣候變

化的現實，與其說是阻止氣候變化，不如說是爭取政治和經濟權力，維護資源控制和攫取更多。

隨著人為觸發的氣候變化的加速，“經濟發展”和建立資源控制作為氣候爭辯的方法，成了當務之急，變得越來越公開。

例如，就在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報告發佈前幾周，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發佈報告，假設到2100年全球溫度將升高達到驚人的4°C（超過7華氏度），^[5]以支持特朗普凍結聯邦燃油效率標準的決定。

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意識到將氣候變化的損害限制在1.5°C內需要社會各方面進行迅速、深遠和前所未有的變化---並且得出結論，既然顯然這不會發生，我們不妨繼續前進，繼續燃燒化石燃料，因為相對寬鬆的美國燃油效率標準所造成的總增長幅度很小。

同樣在五月，國務卿邁克·蓬佩奧（Mike Pompeo）提出，北極融化的海冰不是危機，而是亞洲與西方之間貿易的機會，但前提是西方國家必須採取果斷行動，與俄羅斯和中國等競爭對手爭奪領土主張。^[6]

能源部為爭奪獎項，決定將其推向最極端，能源部已開始將化石燃料稱為“向世界出口的美國自由分子”。^[7]

對抗反動的極端主義

當然，在民族主義國家元首和各種不同形式的網路極端主義者之間，對氣候變化現實的極右翼回應是不同的。在極右翼種族滅絕的邊緣，生態法西斯主義是新興趨勢。2019年3月紐西蘭基督城槍擊事件中闖入了現實世界。射手的宣言將自己確定為“種族民族主義者，生態法西斯主義者”。

儘管環境激進分子甚至生態恐怖分子通常是由左派產生的意識形態驅動的，但生態法西斯主義將深層生態學的思想引入了白人民族主義價值體系。

生態法西斯主義者發展反移民形式的“救生艇倫理”，認為種族應該留在傳統家園中，社

會應該採用純素食，工業化前的生活方式，而且面對環境崩潰，應該允許人們死亡。

芬蘭偏向法西斯生態論的資深生態學家彭蒂·林柯拉（Pentti Linkola）問道：“該怎麼辦？”當一艘載有一百名乘客的船突然傾覆而只有一艘救生艇時，怎麼辦？當救生艇已滿時，那些討厭生命的人會試圖讓救生艇裝載更多的人。那些熱愛和尊重生命的人將抓住船的斧頭，切斷粘在船舷上的多餘的手。”^[8]

不難指出這種論點存在明顯的矛盾，例如，當白人民族主義者宣稱對澳大利亞或紐西蘭等殖民地擁有自然統治權時。這裏的重點是認真對待這些想法，而不是將其視為必須回答的價值體系，應將其視為意識形態症。

儘管即使是最右翼的議會黨派也拒絕大規模槍擊事件，但在歐洲、北美和澳大利亞主流政治輿論中，越來越強硬的反移民論盛行，讓全世界互聯網的陰暗角落得到鼓勵並採取行動。他們的靈感來自美國不太公開的大規模政治性搶手以及像ISIS的精通媒體的超級暴力恐怖分子。生態法西斯主義和具有生態意識的白人民族主義右翼的“精簡”形式可以鞏固其在極右翼亞文化圈中的地位。^[9]

社會壓力乘數

氣候變化的影響已經加劇社會壓力，使大量移民和難民流離失所。2007年至2010年敘利亞的乾旱加劇農村貧困和向城市中心的遷移，這是導致2011年起義的因素，最終當然還有許多其他因素，導致內戰和難民危機。^[10]

中美洲的乾旱使本來很貧困的地區的生活更加艱難。預計孟加拉將遭受氣候變化，嚴重洪災的打擊，而來自緬甸的羅興亞難民居住的考克斯集市地區可能特別脆弱。

印度希望季風季節有所改變。喀什米爾氣溫上升和水資源短缺可能會加劇印巴緊張局勢。^[11]

預計北非將會變得越來越乾熱。乾旱和糧食短缺加劇達爾富爾、奈及利亞和索馬里的危

機。跨學科的學者小組在2009年認為，氣候變化可能導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武裝衝突增加50%以上。[12]

如果將特定的衝突主要歸咎於氣候變化，那將是錯誤的，在中短期內人類更容易控制的一系列政治和經濟因素也很關鍵。但是，縱觀全球形勢，很明顯，除非社會發生結構性變化，否則我們應該期望在未來幾年中看到更多而不是更少的這類人類危機。

從短期和長期來看，一方面是移民政治和難民危機，另一方面是極右翼民族主義和新法西斯主義政治興起的危機，兩者之間，開始出現回饋作用圈。

例如，唐納德·特朗普在競選期間和擔任總統的頭兩年，其邊界危機宣傳比現實更誇張。特朗普上任時，對無證件過境人員的擔心已有多年下降，在2007-09年經濟危機期間及之後，有大量移民流回祖國。

在2010年代，由於美國外交政策，乾旱和政治僵局的加劇，中美洲的經濟和政治危機進一步惡化。在回饋作用圈的短期例子中，特朗普將注意力從旅行禁令轉向邊境，加劇修建隔離牆和隔離家庭的威脅。

消息開始在中美洲社區傳播，說如果你們正在考慮加入大篷車行列，現在是時候了--- 在特朗普成功地完全關閉邊界之前。所有這些都導致無證過境者急劇增加，儘管遠低於2008年前的水平。[13]

在歐洲大部分地區，氣候變化，真實存在的移民難民與幽靈似的移民難民兩者，以及極右翼的政治之間的回饋迴圈作用已經相當開啟，儘管其形式在整個大陸上差異很大。英國退歐的部分原因是仇外心理，儘管這部分針對的是東歐人尋求經濟機會以及歐盟難民政策。

馬泰奧·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在意大利強勢突起，因為他強調強硬的、往往是戲劇性的反移民政策，使其對環境更為友善的聯盟夥伴五星運動（Five Star Movement）黯然失色。

在法國，國民陣線宣稱自己是最強大的單一政黨，即使政治主流仍然可以團結起來否定

其真正的執政力。導致“黃背心”運動的危機表明，通過增加工人和中產階級的生活成本來減輕氣候變化危害的技術官僚計劃可能會面臨抗議和民眾的拒絕。

在丹麥，由於主流政黨本土主義丹麥人民黨（nativist Danish People's Party）擁抱仇外心理，在民意測驗中衰落。六月份，社會民主黨人通過支持反移民政策，奪取右翼的聲勢，贏得了巨大的勝利。[14]

在希臘，金色黎明（Golden Dawn）活動家經常對移民進行身體攻擊。同時，對希臘經濟的困境，期待出現任何議會或群眾行動解決方案，這樣的希望已經消退，因而，移民支援和團結工作已成為左派活動人士工作的關鍵成分。

匈牙利的維克多·奧爾班（Victor Orbán）拜訪美國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終於獲得國際合法性，而波蘭執政的法律和正義黨（Law and Justice Party）反對移民的規則，儘管波蘭很少見到移民或難民。

美國西部和澳大利亞，與“主權公民”運動相關的反聯邦政府牧場主和農村商業利益，一直是否認氣候變化最堅定的支持者。這裏反映了巴西的基本問題：關於公共土地使用的鬥爭，是出於公共利益管理公共土地，還是按照私人利益進行“明智使用”公共土地。[15]

將化石燃料留在地下，應對氣候變化和旱災，以及尊重土著主權，面對這些爭議性要求，釋放公共土地進行鑽探或放牧的邏輯，反映了剝奪性積累的相同邏輯：採取一切必要手段，建立對資源的控制，直至包括使用法外民兵。

氣候變化的中產階級化

面對氣候變化和移民幽靈，徵用和開發土地和自然資源的政治以及嚴格的邊界制度，符合世界勢頭上升的極右典型。但是，並不總是採用這種形式。也可以採取“氣候變化中產階級化”的溫和自由的形式。

邁阿密小海地的房地產價格上漲一倍，因為擁有海平面房屋的居民試圖逃離不斷上升的水域。[16] 亞利桑那州的弗拉格斯塔夫（Flagstaff）很多人逃離氣溫上升的鳳凰城。

由於加州的野火威脅有可能成為馬里布 (Malibu) 等富裕地區的生活常態，而且保險公司收取天文數字費率或拒絕再次補貼重建工作，因此許多居民決定搬遷到遠離森林的“天然景區”，帶去房地產業渴望的便利。

這就提出了問題，即自由主義和大多數左派如何應對右翼民族主義，新法西斯主義和氣候災難。在最壞的情況下，有趨勢可能會將自己孤立在部分受到修辭或文化抵制的孤島中，而沒有意識到我們將自己限制在飛地內。

這裏，禁止麥稈稻草之類，作為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是容易達成的目標，但這還遠遠不夠。如果原封不動並且不對系統性理解開放，道德消費的概念，例如“用自己的錢投票”支持“可以控制的事物”，就與飛地的邏輯有關。

加利福尼亞的自由城市，如三藩市和聖克魯斯，已經變得中產階級化，以至於可能缺乏其長期以來象徵著進步政治的客觀基礎。如果邊界依靠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和邊界巡邏等機構，分裂土地的掌控依靠民兵，則飛地同樣地依靠警察。

有了默契的理解：在飛地內，您有言論自由，擁有豐富的文化世界，種族和性別多樣性以及反對派政治，但是治安將維持基本的經濟和種族秩序。因此，在某些方面，自由主義飛地可以客觀地站在“堡壘歐洲”一邊，禁止移民進入，或是由美國西部分離主義民兵控制的地區。

主流和有組織的激進左派大多無視極右翼和右翼民族主義領導人在言辭和實踐上的這些變化。有時，似乎我們仍在與昨天的否定氣候變化主義作鬥爭。與此相關的是，關於“氣候變化如何影響我們所有人”的過時觀念有時會被重新包裝為環境運動中的新觀念。

例如，歷史學家迪普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撰寫過有關另類實踐研究和生態學的文章，他認為，即使氣候變化對富人和窮人的影響會有所不同，但氣候變化卻超越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層面，因為“與資本主義危機不同”，這裏沒有為富人和特權階層提供救生艇。”[17]

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可能是正確的，因為與其祖父母的世界相比，當今的富裕和中產階級的孩子將繼承在生物學上處於貧困狀態的世界，但卻忽略環境危機的意識形態面。還沒有看到“救生艇”的隱喻會變得多麼令人不安。

即使救生艇沒有多大用處，最後，法西斯主義的邏輯也會要求擊敗其他人以確保其擁有救生艇。這種救生艇邏輯延伸到擬議的應對氣候變化的技術“解決方案”，這些解決方案的意義不在於使世界變得更美好，而在於創造後人類的未來，讓少數富人可以逃脫遭詛咒的星球。

希望有不少富裕和中產階級的人們可以從本質上成為階級叛徒，為每個人爭取更美好的世界，但對他們有些人而言，阻力最小的途徑，將是利用民族國家的邊界以及城鄉的飛地，遠離亂民，掠奪剩餘的環境資源。

氣候危機並沒有超越階級因素。而是加劇乃至激發其新法西斯主義元素，並使生態社會主義 (ecosocialism) 或生態野蠻主義 (ecobarbarism) 的替代品變得難以置信。在氣候變化方面，新法西斯主義的動機是加速主義的，儘管散佈著恢復控制和使民族國家再次強大的幻想。

對抗死亡願望

瑞·泰拉達 (Rei Terada) 指出，應對掠奪和邊境暴力政治“需要一種語言，即法西斯主義如何影響人們的死亡願望，這是大多數政治所沒有的。”[18]

即使是最誇張的言論，也可以窺見一斑。“使美國再次偉大”的起源通常可以追溯到列根時代，但有顯著的不同，就是列根向支持者傳播樂觀主義的能力。

如果你反對列根，當然想吐，但這是關於美國在世界上的角色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故事，支持者可以毫不尷尬地歡呼。

相比之下，特朗普的“我們將贏得讓你煩倦”，具有民族統一主義的英雄式“迷失之因”言論的優勢。回到1950年代美國的“輝煌時代”是不可能的，無論是將其視為凱恩斯主義和穩定工作時代，還是白人至上和尊重傳統性別等級

制的“紳士主義”形式，都是不可能的。

特朗普支持者的心靈可能有意無視對某些事情，但並非天真。實際上，至少在另類右翼和更廣泛的千禧世代和60年代環境中，瀰漫厭世情緒。

這些特朗普支持者認為我們真的不能退縮。他們希望有人為他們而戰（白人和傳統性別/家庭價值觀認為的“我們”）；他們希望有人看到他們的敵人受苦。眼看著世界在燃燒，這太可怕了，但他們擁抱了前景中令人緊張的東西。

回到有些令人心煩的短語，參與生態社會主義或生態野蠻主義的鬥爭將需要逃避飛地的邏輯和界限。為生態公義的未來而戰，不能再被視為立即進行環境正義鬥爭的替代選擇。

認為氣候變化可以成為人類共同事業，這個觀點應該被理解為某種理想主義，對於激發階級叛徒可能是有用的，但將面臨對土地和資源的積累控制的爭奪。環境正義是由階級驅動的、種族化的、現時現地的氣候鬥爭。

立岩（Standing Rock）地區的鬥爭也許是這個時代的起始政治鬥爭。拉科塔蘇族（Lakota Sioux Tribe）和來自全國各地的環保主義者彙聚在一起，展開政治鬥爭，象徵著奧巴馬政府的結束和特朗普時代的開始。

在世界各地，各階級年輕人已經進行罷工，呼籲採取積極行動來應對氣候危機。當今的鬥爭，例如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不應被視為足以在資本主義框架內解決或減輕氣候變化危害的立法方案，而應視為舊時的過渡性要求，並且將整個氣候和社會正義的當前可能性，同進行更根本改變的計劃聯繫起來，從而有可能在受損的星球上實現凝聚性社會生活。

註腳

[1]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政策制定者摘要，各個政府批准的全球變暖 1.5°C 的特別報告 - IPCC

<https://www.ipcc.ch/2018/10/08/summ....>

[2] 哈克（Haque），“資本主義如何燒灼地球成為冒煙的法西斯溫室” <https://eand.co/how-capitalism-torc....>

[3] 阿德吉爾尼（Adghirni），“巴西告訴世界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

[4] 哈威（Harvey），“新'帝國主義'

eatonak.org/IPE501/downloads/files/....

[5] 艾爾佩林（Eilperin），鄧尼斯（Dennis）和穆尼（Mooney），“特朗普政府認為，到2100年，全球氣溫將上升7度。” [-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

[6] 漢斯勒（Hansler），“蓬佩奧：融化海冰為貿易帶來了新機遇”

<https://twitter.com/jmhansler/statu...> .

[7] 奧尼爾（O'Neil），“美國能源部將化石燃料更名為'自由分子'"

<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

[8] 威爾遜（Wilson），“生態法西斯主義正在極端右翼的邪教文化中復興”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c...>

[9] 胡克（Huq）和莫奇達（Mochida），“環境法西斯主義的興起與氣候變化的安全化”，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

[10] 克雷（Kelley）等人，“新月沃土地區的氣候變化及其對最近敘利亞乾旱的影響。”

<https://scholar.google.co.uk/schola....>

[11] 霍爾（Hall），“水源戰

爭”<https://www.dw.com/en/water-wars-ar....>

[12] 變暖增加了非洲內戰的風險。

<https://www.pnas.org/content/106/49....>

[13] 弗洛雷斯（Flores），“這就是為什麼創紀錄數量的家庭實際上出現在邊境的原因”

<https://www.buzzfeednews.com/articl....>

[14] 奧然基（Orange），梅特•弗雷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

[15] 菲力浦斯（Phillips），“將會流血”

<https://fusion.tv/story/254505/what....>

[16] 本森（Benson），“在洛杉磯，氣候變化的中產階級化已經在發生”<https://www.thedailybeast.com/in-la....>

[17] 查克拉巴蒂（Chakrabarty），“歷史氣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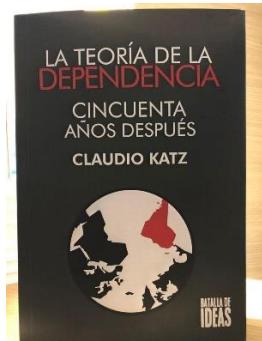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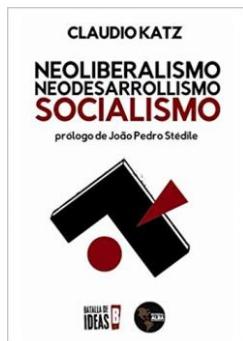
[18] 臉書評論，與作者對話，2018年9月29日

本文譯自：《國際觀點》，2019年7月5日，
<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6140>

今日拉美之左派和右派：克勞迪奧·卡茨訪談

克勞迪奧·卡茨、傑佛瑞·韋伯

2019年5月5日，我與阿根廷經濟學家克勞迪奧·卡茨(Claudio Katz)在其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公寓裏交談。我們討論了他最新兩本書裏頭的主題：《新自由主義，新發展主義，社會主義》(2016)和《依附理論：五十年之後》(2018)，以及當前複雜的區域局勢。卡茨透過深入而廣泛的調查，剖解了拉美進步政府最新一波衰落的根本原因和時序。同時，他強調了“保守派復興”脆弱，尤其在“保守派復興”之後，巴西耶爾·博爾索納羅政府癱瘓卻正正印證其脆弱。



在進步和恢復之間，許多懸念仍然未決：根據卡茨的說法，委內瑞拉是整個地區政治方向性最決定性的議會外戰場——那裏通過的東西將決定性地影響其他地方的發展，因為其既體現該地區進步週期最大膽的承諾，也體現其最深刻的矛盾。在即將進行的眾多競選活動中，阿根廷2019年10月的總統競選將是拉丁美洲中短期最清晰的試金石，已經使得國際金融機構不得不竭力證明其處方的合法性。對卡茨來說，在地緣政治和國際領域，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廣泛對抗在拉丁美洲各地以特別重要的方式表現出來，要求對帝國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立場重做思考。綜合而言，卡茨提供的是清晰的全景，造就當今拉丁美洲的解放政治，並推動走向仍然未知的未來。

韋伯：首先，你能否簡單描述你重要的政治與學術活動？

卡茨：嗯，我是拉丁美洲20世紀70年代的典型代表。我16歲時開始活躍於左翼圈子，是左翼政黨中的積極分子，在整個軍事獨裁時期(1976-1983年)參與半秘密活動。我也全職參與活動。我當過記者，後來回到大學，並在隨後幾年和幾十年裏進一步拓展。後來，出現了新時刻，2001年的政治運動，再次改變了我的政治活動，我們建立了左翼經濟學家網絡。我們積極參與2001年和2002年的民眾運動。後來，隨著拉丁美洲的政治變化，我多次訪問委內瑞拉、古巴、巴西和拉丁美洲其他國家，參加這一時期出現的各種倡議活動。作為現在的流行做法，我寫的所有東西都可以在我的網站上找到。



<https://katz.lahaine.org/seccion/english/>

韋伯：為了說明21世紀初該地區新左派浪潮的歷史，你能簡要地描述一下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的民眾運動的特點嗎？

卡茨：在那時，我用“人民反叛”這個詞來指這些運動，以便將其與經典的拉丁美洲革命——墨西哥、玻利維亞、古巴和尼加拉瓜——區分開來。與這些社會革命相比，這些反叛並不涉及挑戰國家、建立自治人民政權或者武裝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革命在這一邊，反叛在那一邊。反叛是很深刻的過程，但從未達到與拉丁美洲革命經歷相同的程度。進步週期乃從這些反叛中產生。進步週期是這些重要進程的結果：拉丁美洲社會與經濟變革以及某種反叛的重新出現，在傳統意義上是經典的，但其主體與動員是新穎的。

力量的平衡被改變，原來的新自由主義項目被動搖，失去了方向，失去了最直接代表這些項目的政府，再加上對拉丁美洲有利的國際經濟

情景隨著初級產品價格的上漲，產生了非常重要的社會和經濟救濟動力。

我認為，進步週期的另一個重要特徵是直接出現在街頭的民主成果，社會力量的平衡以及國家鎮壓機器的撤退。在立法和憲法方面也取得了重要進展。甚至取得了象徵性的成果，例如玻利維亞的土著總統，對該地區種族主義傳統的挑戰——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非常非常先進的憲法。

進步週期也恢復了以前的傳統，大眾的拉丁美洲政治意識形態。與古巴革命的重新相遇，與早期反帝國主義傳統的重新相遇。

與直到最近之前保持其權力的右翼政府 -- 哥倫比亞、智利、秘魯和墨西哥 --- 相比，這種進步週期尤其明顯，也就是說，那整個部分仍然不受進步週期的影響，並敵視進步週期。

韋伯：你如何描述這些政府的弱點和優勢，以及哪些情況是影響最深遠、最先進的？

卡茨：訪談涵蓋了我最新兩本書的主題，不是嗎？在《新自由主義、新發展主義、社會主義》，我認為，從2016年，在進步週期裏有我們可以稱之為中左翼和更激進的政府。一邊是內斯托爾·基什內爾（Néstor Kirchner）和路易士·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一邊是烏戈·查韋斯（Hugo Chávez）和埃沃·莫拉萊斯（Evo Morales）。

在我看來，他們不是相同的，而是截然不同的子型。中左政府擴大了權利範圍，但沒有改變政治制度。此外，每次發生重要的民眾動員時，政府都感到恐懼。因此，他們是接受變革和改進的政府，但總是對民眾行動感到非常恐懼。在基什內爾領導下的阿根廷，當有遊行時，人們看到了這一點；在巴西，政府面對2013年的抗議活動的態度非常明確，這些抗議活動改變了巴西的情況；勞工黨（盧拉·達席爾瓦和迪爾瑪·羅塞夫的勞工黨）沒有從中學到任何東西，因此右翼能夠利用這種情況。

在經濟層面，這些政府就是我所說的新發展主義者，他們試圖重組工業，恢復國家監管，但沒有改變新自由主義已經改變的東西。新自由主義調整了經濟方向，以農企業(agribusiness)

和初級商品出口為中心，為軸心。新發展主義試圖限制這種情況，但並不希望實質性地改變這種狀況。在阿根廷，這一點在農企業的重要性方面非常明顯，在巴西，則是對金融體系如此。也就是說，這些國家必須做出的兩個最重要的改變：在阿根廷這裏，處理對外貿易，在巴西處理金融體系。基什內爾主義和盧拉都不想往這個方向上推進。因此，在這兩種情況下，所能做的就是改善消費；但消費的改善非常脆弱，因為如果你在生產結構不改變的情況下改善消費，當局勢發生變化時，就非常脆弱。

在以後發生的事情中，中左政府的這些限制效應顯而易見。就巴西而言，勞工黨對雅伊爾·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的到來負有很大責任，因為在後期，特別是在迪爾瑪·羅塞夫（Dilma Rousseff）時期，勞工黨完全欺騙了各階層支持者。因此，勞工黨失去了中產階級，失去了工人階級，只在北方某些州保留權力。蜜雪兒·特梅爾（Michel Temer）是羅塞夫領導下的副總統，財政部長，是極端的新自由主義者。因此，在我看來，勞工黨產生了士氣低落的情況，當羅塞夫不戰而降放棄政府，接受了2016年的政變，讓右翼到來時，這種失望到達頂點。

阿根廷則不同。阿根廷大相徑庭。因為如果阿根廷也有詐騙的過程，失望的過程，那麼，克莉絲蒂娜·費爾南德斯·德基什內爾離任時，公眾對她懷有巨大同情，除此之外，這些年來，巴西和阿根廷的差別是巨大的；是黑白分明的。

在巴西，我們目睹了民眾運動的解散，在阿根廷，有民眾的動員；在那裏，有軍隊的回歸，在這裏，軍隊的回歸是不可能的；那裏有政治體系的崩潰，這裏是重組或維持政治制度。這裏出現了新的民眾行動形式，例如，涉及數百萬人的婦女爭取墮胎權利的抗議，工會權力的維持。阿根廷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已發生40次大罷工，在毛里西奧·馬克里（Mauricio Macri）領導下，阿根廷已發生4次大罷工，大罷工就是大罷工。因此，傳統上阿根廷是動盪的國家，而巴西是維持秩序的國家。也許這很有趣，因為同一類型的政府最終在政治層面上產生了不同的結果，儘管不是在經濟層面；在經濟層面，兩者達到了同樣的極限。但是，這裏發生的一件事，在那裏發生的是另一件事。

也許厄瓜多爾是第三個有趣的例子。厄瓜多

爾很有趣，因為人們可以或多或少地將拉斐爾·科雷亞與盧拉和基什內爾置於同一光譜中，儘管從阿根廷和巴西我們所看到的，是更多的威權特徵——科雷亞與社會運動的衝突，比我們在巴西和阿根廷的生活中更強烈。科雷亞在許多民眾運動中引發的那種憤怒程度在阿根廷和巴西都沒有發生。但在我看來，厄瓜多爾的有趣之處在於，最終贏得2017年大選的列寧·莫爾諾（Lenin Moreno）是科雷亞的人。

他以反對右翼的綱領贏得了選舉，最終組建了拉丁美洲最右翼的政府，按照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協定的條件，這個最右翼政府與麥克裏政府是相同的。這個人剛剛允許運送朱利安·阿桑奇，他以可恥的方式奪走了後者自衛的機會。重要的是，他也是這個過程的人。這就是我們一直在說的，在巴西，像在阿根廷一樣，也在同樣的過程中，有些人是完全右翼的。你可以說，特梅爾（Temer）是列寧·莫爾諾在巴西的表達。在阿根廷，沒有達到這個程度，但在每一種情況下，都是這些這個過程的局限的另一個相當顯露的要素。

另一種類型的政府就是我所說的"激進"政府，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沒有更合適的術語。這些國家包括委內瑞拉、玻利維亞。以及部分程度上的古巴。這裏的複雜點是查韋斯主義（Chavismo），這可能是所有當代拉丁美洲歷史上最關鍵的現象。我認為，查韋斯主義無法與基什內爾主義（Kirchnerism）、盧拉，甚至與玻利維亞的埃沃·莫拉萊斯相提並論。首先，因為查韋斯主義產生的民眾培力水準——參與程度、民眾組織網路、創造力、政治覺悟等，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也許在玻利維亞有，但肯定不是在巴西和阿根廷。

因為與阿根廷、巴西、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相比，委內瑞拉過去沒有類似的進程，所以也許讓人覺得如此驚人。沒有類似阿根廷的庇隆主義（Peronism），沒有類似玻利維亞的革命民族主義運動（MNR），沒有類似那段歷史的任何東西。幾十年來，沒有這樣的歷史經歷之後，委內瑞拉似乎在短時間內集中了許多國家以前所經歷的東西。這使得委內瑞拉更加兩極分化，最重要的是，在該區域其他地方沒有並行的情況下，引起了委內瑞拉統治階級的反應。阿根廷的統治階級對庇隆主義已有70年的認識；在巴西，

在盧拉之前，已經有路易士·普雷斯特斯（Luís Prestes）的經驗；更不要說玻利維亞一系列政治進程的經歷。因為委內瑞拉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情，佔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反應就好像是在20世紀30年代或40年代，就好像第一次發現人民的存在。這就是委內瑞拉成為關鍵過程的原因。

此外，我們需要加入查韋斯的政治激進主義。查韋斯是非常特殊的人物；他是拉丁美洲反帝國主義軌跡的組合，但大量吸收了古巴革命經驗，這是其他情況中不存在的另一個特點。古巴革命的意識形態幾乎就像查韋斯的組織意識形態一樣。此外，委內瑞拉是盛產石油的國家，因此，對於美國來說，委內瑞拉的作用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因此，由於這種結合，委內瑞拉最終成為該區域的爆炸點；但是，即使我談論的事情沒有發生，因為委內瑞拉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儲備，美國仍然會像看待伊拉克或利比亞那樣看委內瑞拉，這是拉丁美洲其他國家所沒有的。沒有哪個國家具有這種戰略意義。委內瑞拉石油公司在美國設有子公司CITGO，深深影響美國國內的石油價格，這一事實讓你領略到這個國家的戰略地位。

這把查韋斯主義變成了進步週期內的偉大過程，但同時也是與進步週期其餘部分本質不同的過程。委內瑞拉在進步週期中行使了某種領導權，但本身就是不同秩序的實驗，比進步週期更激進。這在經濟層面上也可見一斑，委內瑞拉因為石油租金的再分配遠遠超過了阿根廷、厄瓜多爾或巴西的收入分配，儘管矛盾的是，委內瑞拉依賴於極其脆弱的經濟，更依賴于單一產品，因此受制於緊張局勢險境。

由於這些因素的結合，委內瑞拉繼續是拉丁美洲衝突的中心，儘管進步週期已經過去。那裏發生的事情非常重要，無論有沒有進步週期，都會有這種右翼反應。即使查韋斯的死確實改變了很多事情，這一進程也遭受了非常重要的挫折，最重要的是，經濟戰爭導致國家幾乎退化。委內瑞拉的經濟危機，僅有美國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可以相比，其國內生產總值下降的百分比相同，大批人向外遷移，經濟崩潰。經濟戰爭和統治階級的敵意，加上委內瑞拉政府內部高度的任意率性、不負責任和腐敗，這樣的情形，造成了爆炸性的局面。

從這個意義上說，雖然進步週期已經不存在，

但委內瑞拉仍然存在。委內瑞拉將決定拉丁美洲的未來將會發生什麼，以及最終隨著進步週期會發生什麼。如果委內瑞拉已經消失，我們就將整理進步週期的總結的對話，僅此而已。但是，委內瑞拉非常重要，意味著在進步週期中發生的一切事情並沒有完成，因為週期的軸心結果仍然懸而未決，乃最激進的軸心，涉及最無法解決的問題。

由於這些原因，委內瑞拉正在發生的事情將決定未來。目前，有新的政變企圖。再一次，媒體話語中的虛偽，幾乎令人作嘔。委內瑞拉被視為人道主義悲劇，但哥倫比亞有600萬流離失所者，或大批中美洲人移居美國，而這些不構成人道主義危機。這是媒體的悲劇，在墨西哥有100名記者被暗殺，我不知道在哥倫比亞有多少，自和平協議以來，有100或200名社會領袖被暗殺，而在委內瑞拉沒有一個。這意味著討論委內瑞拉的事情有點複雜，因為宣傳掩蓋了辯論。這不是激情；激情是合乎邏輯的。但是，人們不能談論事實，因為現實被抹除了。

因此，這是如何解決委內瑞拉的關鍵主題，這是一場兩方面的鬥爭：一場反對政變和反對美國的鬥爭；又是查韋斯主義內部的一場鬥爭，要確定是否復原查韋斯主義。



我同意所有對查韋斯主義關鍵部分的批評。在我看來，說的輕一些，在經濟領域犯下的錯誤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但是，與此同時，有一定程度的民眾抗爭，這是完全令人驚訝的。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抵制委內瑞拉正在發生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這是由自下而上進程的力量。對於我們這些經歷過其他進程的人來說，在阿根廷，我們知道什麼是大眾的成果，不是容易抹去的東西，並且持續了幾十年。那是留在大眾意識中的

東西。因此，有過阿根廷經歷的人可以理解為什麼委內瑞拉人抓住這些成果，竭力戰鬥。否則，馬杜羅沒有倒下這一事實是無法解釋的。

所以，我們拭目以待。很難說清這次衝突，但在兩個月內，胡安·瓜伊多(Juan Guaido)自我宣佈的當權失敗了，企圖以卡車進入該國為藉口的人道主義危機失敗了，兩三次政變企圖都失敗了，電力戰也失敗了。太驚人了。

把委內瑞拉同玻利維亞相比而進行思索也是很有趣的。這將是很好的主題，值得更仔細地研究。散漫的意識形態激進主義非常相似。埃沃·莫拉萊斯的話語與查韋斯的論述非常相似。然而，使用天然氣租金，莫拉萊斯已經達到了宏觀經濟穩定的程度，改善或恢復民眾收入，引起了一些右翼政府的嫉妒。這說明了客觀事實——玻利維亞不是威脅，當國家不是威脅時，就有被忽視的機會。美國國務院沒有人在監視玻利維亞。如果發展不好，就發展不好，如果進展順利，就進展順利。這給了玻利維亞靈活的空間，而委內瑞拉則沒有這樣的空間。由於玻利維亞發展程度比該區域任何其他國家低得多，所以任何改善都顯得有意義。最後，可能重要的是，他們管理國家的是農民，本地人，保守的阿爾蒂普拉諾(altiplano，玻利維亞的高原)傳統，這使得埃沃·莫拉萊斯的行為如此保守。這正是查韋斯加勒比繁榮的對照物，查韋斯發起了龐大的計劃。與此同時，玻利維亞從來不是整個拉丁美洲的參照點，而委內瑞拉則一直是。因此，兩國的歷史命運是不同的。

古巴是另外的例子。但古巴的有趣之處在於，從右翼分子無法理解的奇跡的意義上講，其與穩定的玻利維亞有共同之處。一個一無所有，一無所有的國家，那是孤島……只有旅遊，一些礦物，什麼都沒有。然而，在整個地區，古巴擁有最令人欽佩的教育、營養，尤其是健康水準。另一個引起人們注意的事實是：一個可以忽略不計的犯罪水準，這在拉丁美洲其他地區是不可想像的。一個每年有一百萬遊客到達的國家，而旅遊業不會污染社會。同樣在波多黎各、墨西哥加勒比或貝里斯的旅遊業則造成災害，但古巴卻沒有。因此，我們看到，在人民意識中，長期構造的影響，築起社會價值觀。對於所有拉丁美洲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但這是另一個主題。

我的結論。進步週期的情況現在集中在委內瑞拉發生的事情上，以及該區域未來可能從委內瑞拉發生的情況中引生出的不同形式。

韋伯：從你的角度來看，所謂"進步週期的結束"是何時開始，為什麼開始的？

卡茨：與保守勢力的恢復一起發生。可以說，隨著保守勢力的恢復，這個週期結束了，其中的中心時刻是巴西的政變，後來是博爾索納羅，以及2015年阿根廷的馬克里的勝利。在現實中，保守勢力的恢復是選舉和政變的混合體。拉丁美洲的政治體系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面對更多的專制形式，所有形式的憲政正在失去意義。而且，權力結構正在加速發展增加其重要意義。選舉就像次要因素。在右派更加穩固的國家——哥倫比亞、秘魯、智利——選舉是無關緊要的。民眾參與程度極低。反對委內瑞拉的聲音很多，但在委內瑞拉，無論哪個選舉，選民人數都比哥倫比亞、秘魯或智利高得多。

在廢除政治、在更極端的社會約束的基礎上，保守勢力復興得以執政。因此，這裏的問題是，保守勢力復興大體上是穩定的。我們可以說，正如我們所知，進步週期已經結束。但是，保守勢力復興，是脆弱的嗎？我相信非常脆弱。重要信號引生了——例如，廢除南美國家聯盟（UNASUR），試圖建立南美洲進步論壇（PROSUR），成立利馬集團（Lima Group）以便在委內瑞拉組織政變。但這些是非常非常不一致的計劃。例如，隨著曼努埃爾·洛佩斯·奧布拉多（Manuel López Obrador）在2018年獲勝後，他們失去了其中關鍵支柱——墨西哥。

保守勢力復興的基礎是脆弱的，因為拉丁美洲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經典新自由主義經濟現在面臨了已發生變化的國際情景。結果，新自由主義者感到困惑、不安，不知道該怎麼辦。這嚴重侵蝕了保守復興勢力的政治計劃。換句話說，大問題在於，因為新自由主義鼓吹私有化，開放市場，但在我們所看到世界貿易戰的中間，如何打開市場和貿易？按照特朗普的做法，說自己是新自由主義者，是什麼意思？最認真的盟友應該是中國，但有相當不言自明的矛盾，因為新自由主義是美國的，親美主義的教條，帶有

美國的印記。不能說你的偶像將是中國的自由貿易。此外，主要投資來自中國，顯然，與上世紀90年代和2000年代相比，與早期的新自由主義相比，這裏看到的是沒有北極星指路的、沒有戰略的新自由主義。因此，政治表現非常脆弱。因為不太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有甚麼樣的計劃。

在這裏，我們正處於以僵屍新自由主義為特徵的保守勢力復興之中，因此前景是敞開的。進步週期有拉丁美洲計劃，還沒有啟動，但沒有新自由主義計劃，只有在委內瑞拉組織政變，但這不是計劃。即使他們說“我們廢除南美國家聯盟（UNASUR），另外創造組織”，他們創造東西，用以策動政變，而不是因為他們有什麼樣的策略。現在談論明確的保守勢力恢復週期還為時過早。

韋伯：這也解釋了，例如，博爾索納羅和馬克里在當前關頭的弱點？

卡茨：是的。我認為右派最大的考驗是博爾索納羅。對於拉丁美洲的這些右翼政權究竟是什麼這個問題，博爾索納羅將給出答案。博爾索納羅的作為，將告訴我們拉丁美洲新右派將會做什麼。因為博爾索納羅是新右派的純粹代表，同我們在歐洲所看到的非常相似，他是拉丁美洲的這種極右言論的代表，非常具有挑釁性，為了直接追隨美國、為了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反對民主成果。我們過去一年來一直在討論的內容是：博爾索納羅在多大程度上是法西斯主義者，或者不是法西斯主義者。我認為可以說，博爾索納羅有法西斯分子的成分，但法西斯主義是過程，巴西的法西斯化過程將是怎樣的，還不知道。博爾索納羅只能代表出發點。

為了在巴西建立法西斯國家，鎮壓必須建立更深的根基，並擁有非常明確的右派領導。這種法西斯主義可能是什麼樣子的先兆有兩個，第一個是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博爾索納羅必須首先達到皮諾切特的水準，達到這種程度的鎮壓和中產階級的反革命權威，面對威脅...就像對薩爾瓦多·阿連德的反應一樣，要到這個程度。為了讓反共意識形態生根發芽，以及為了政權的穩固，他必須發展烏里韋（Uribe）在哥倫比亞享有的社會基礎。不僅是准軍事組織的結構，而

且有哥倫比亞寡頭政治傳統中右翼中產階級的支持。嗯，博爾索納羅還遠遠沒有開始達到這兩件事情。

問題是，博爾索納羅政府，他掌權三個月左右，是一個笑話，一個玩笑，一個白癡的記錄。即使在狂歡節，也有劇團取笑博爾索納羅，他的漫畫節目；他所說的是瘋狂的想法，但卻是完全癱瘓政府的內部妄想。特朗普可能也神志不清，但博爾索納羅不是特朗普。博爾索納羅的政府是無所作為的政府。

巴西資產階級對博爾索納羅不滿。這是錯誤治理，換句話說，他們不知道如何管理公共行政的ABC。即使是國際冒險：去耶路撒冷，去以色列，也會引起問題，因為巴西非常依賴中國，並且依賴與阿拉伯國家的對外貿易。因此，博爾索納羅正在玩弄巴西的出口，而統治階層不會允許這樣子。因此，巴西的實際政府是軍隊。如果繼續朝這個方向發展，軍方最終將取代博爾索納羅，副總統漢密爾頓·莫爾尼奧將最終接管政府。因此，如果拉丁美洲的新右派是博爾索納羅，那就沒有新的右派。如果這是新的右派……我們將看到，說真的，當權只有三個月，現在下斷論，還為時過早。

另一個有趣的事實是，拉丁美洲沒有其他的博爾索納羅斯。有反動的右派，像烏里韋，傳統，但博爾索納羅斯呢？有趣的是，在墨西哥，洛佩斯·奧布拉多獲勝，也就是說，該地區另外的重要國家出現了重要的轉折，這是舊墨西哥右翼非常巨大的危機。此外，我要指出，在哥倫比亞和智利的選舉中，中間偏左出現了重要的增長。換句話說，在右派的另外兩個堡壘中，實際上正在成長的是哥倫比亞的古斯塔沃·彼得羅（Gustavo Petro）和智利中左派的新組織。因此，右派的議題是有很大的討論空間。

韋伯：帝國主義在這一切中扮演了什麼角色？能還原到美國嗎？中國在所有這些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卡茨：很明顯，特朗普正試圖在中國面前恢復美國的霸權。這就是特朗普的意圖。作為在中國面前恢復全球霸權這個戰略的一部分，拉丁美洲是關鍵的一塊。這是一個關鍵部分，因為，

對於美國來說，拉丁美洲是後院。中國的挑戰不在世界，而在拉丁美洲；換言之，對於美國來說，中國問題不僅是世界上的中國問題，也是美國自身的中國問題。

特朗普在拉丁美洲的姿態，是以一種非常粗糙和原始的方式恢復其統治地位。回到所謂的俱樂部政治：“我主宰一切，你們隸屬於我。”這就是為什麼特朗普侮辱墨西哥人，築牆，侮辱加勒比人，鄙視拉丁美洲。他沒有試圖建立政治集團，而是認為他們是從屬的附庸國。從這個意義上說，特朗普是在玩火，因為有一些拉美政府跟隨他，但特朗普的所作所為有點複雜。特朗普對待拉丁美洲國家就像對待他的殖民地一樣，但他實際上做不到，因為他沒有條件以軍事強權來統治他的殖民地。

所以特朗普只說不動。看看委內瑞拉的政變，典型的美國方式：艾布拉姆斯（Abrams）、斯彭斯（Spence）、博爾頓（Bolton）、魯比奧（Rubio）、蓬佩奧（Mike Pompeo），就像他們在羅斯福時代，第一個羅斯福，希歐多爾·羅斯福；他們認為自己是直接所有者，並認為他們因此可以隨心所欲。然而，直到現在，委內瑞拉還沒有像1983年的格拉納達和1989年的巴拿馬那樣，遭受入侵，甚至沒有遭受政變，如2009年洪都拉斯的曼努埃爾·塞拉亞（Manuel Zelaya）那樣。

換句話說，美國的言論與美國可以有效做到的事之間脫節。美國不太可能在委內瑞拉重複其在利比亞的所作所為，或者在伊拉克的所作所為。因此，特朗普的政治做法相當冒險，到目前為止——做認真的總結還為時過早——還沒有取得明顯的結果。

特朗普唯一取得的成就，是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這確實是重要事實，因為這是美國所尋求的。特朗普不想與全球化決裂，特朗普想要的是重新談判多邊協定，並將其轉化為雙邊協定。通過雙邊協定，讓美國的服務具有更大的權重，版權收費，對美國公司有更多的偏袒，這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中得以實現。所以，這是矛盾的，因為他不能使用武力，而且世界上唯一的他設法謀得重新談判的協定，是與墨西哥的協定。因此，奇怪的是，特朗普對洛佩斯·奧布拉多持謹慎的態度。總體而言，在這個狀況中，我要說，人們必須區分所說的和所做的事。

在我看來，美國的經濟優先事項是重新談判貿易協定，增加出口，限制中國的存在，並與中國競爭，這就是他們正在尋求的。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需要改變委內瑞拉政府。委內瑞拉對美國很重要，不僅因為那裏有石油，而且因為將向中國和俄羅斯傳遞資訊：“此處莫入”。因此，那裏發生的事情將決定一切——一切，一切，一切都集中在委內瑞拉。

如果美國不能實現其目標，如果查韋斯主義繼續，將像敘利亞一樣，俄羅斯將資助其軍事作用，在委內瑞拉有軍事存在；如果美國不改變這種狀況，俄羅斯會將其權力伸向拉丁美洲。如果美國不能改變現狀，中國的存在同樣不會逆轉。因此，到目前為止，我們在這裏，看著會發生什麼，但結構性事實是，中國正在滲透，美國正在退卻，美國希望收復失地。

美國最大的問題是，其天然的盟友是拉丁美洲的右翼政府；但是，這些政府的統治階級與中國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而美國卻不能給他們任何回報。阿根廷和巴西的主流階級向中國出售大豆，而美國不會購買大豆。美國本身卻銷售大豆；換句話說，巴西是競爭對手。那麼，阿根廷和巴西的農企業與其競爭對手美國而不是其客戶中國達成協議，可以獲得什麼收益呢？

因此，美國試圖做的事情是非常困難的。與此同時，拉丁美洲的每個統治階級都尋求維持其業務，保持其業務處於平衡狀態，由於沒有戰略，非常不穩定。換句話說，博爾索納羅要承認以色列，但必須賣東西給中國，那裏存在衝突；馬克里支援委內瑞拉的政變，但在阿根廷，我們不僅向中國出售商品，而且中央銀行的儲備依賴於中國的貸款，那麼政府如何管理這個呢？

我認為這是非常危急的局勢，正如我所堅持的那樣，這對委內瑞拉至關重要。也就是說，如果朝某一方向發生什麼事情，那就意味著這個方向贏了，或者另一個贏了。

所以，對我來說，中國是一大新鮮事物。從這個意義上說，拉丁美洲與非洲非常相似，但同時也有別於非洲。它與非洲相似，因為中國在這兩個地方都集中投資了原材料，並依賴這些原材料。這是中國做了基礎設施投資的兩個地區。其區別是，拉丁美洲更發達，政治經驗比非洲優越得多，拉丁美洲是美國的後院，而非洲是歐洲的後院。

在過去十年的進步週期中，人們有意識，認為有必要以不同的方式與中國談判，因為迄今為止，拉美-中國關係最大的輸家是拉丁美洲。從某種意義上說，拉丁美洲銷售初級產品，而中國銷售製成品，貿易逆差巨大，正在重新出現依賴的局面。對此有一種認識，但不是行動。例如，作為一個集團與中國進行談判，圍繞這個問題，有許多想法，但從未付諸實踐。從未轉化為實踐，因為作為一個集團進行談判，意味著減少每個國家集團，每個民族資產階級的自治權。例如，如果我們作為一個集團進行談判，將是南美洲國家聯盟（Unión de Naciones Suramericanas）與中國談判，在這種情況下，將不會是這個或那個向中國出口的阿根廷出口集團。而且，由於主流階級在本國內部非常強大，因此這種區域談判集團沒有實現。但是，這是拉丁美洲發展的唯一可能的道路，也是唯一的一條道路。



我不相信中國在拉丁美洲與美國一樣；在我看來，這是一種簡單化看法。這是政治之外的想法，知識界的想法，有帝國主義1，和帝國主義2。這是從外面看世界。我在拉丁美洲，如果我想在我們地區有進步的發展過程，中國就不一樣了。一個是傳統的壓迫者，另一個是可能的平衡砝碼，這將取決於該地區的行為。因此，在解放的計劃中，拉丁美洲可以有中國合作夥伴。在這一點上，這只是一個想法，但重要的是要考慮，避免簡單化，從依賴這個走到依賴那個。我不這麼認為，這個題目比較複雜。

韋伯：在拉丁美洲目前的時機，左派在社會鬥爭能力以及選舉方面的前景如何？

卡茨：嗯，要看，第一件事就是鬥爭，大眾

鬥爭。目前，右翼擁有主動權，但拉丁美洲仍然是世界上民眾動員水準最高的地區之一；雖不像在進步週期，但仍然是政治行動水準高於世界其他地區的地區。



我認為我們必須小心避免兩個錯誤：認為沒有什麼改變，現在我們和十年前一樣，這是錯誤。不。產生進步週期的四次反叛的影響已經用盡，類似的新浪潮還沒有到位。我們有抵抗，但沒有當時的四次反叛。因此，情況發生了變化，但與此同時，並沒有埋葬以前發生的事情，我們並沒有經歷我們過去所看到的那類過程，例如，1970年代的皮諾切特政變，或阿根廷的豪爾赫·維德拉政變；換句話說，沒有任何反革命的過程。

由於沒有反革命，右派有前進的過程，但遭到民眾抵制。我認為，我們必須站在這個水平上，鬥爭是在那個環境產生的。有趣的是，有新一代。今天處於鬥爭中的不是前一週期的人。而那些鬥爭者現在有了進步週期的經驗。我們將觀看，他們如何在政治上轉化，我們不知道。但是，產生早期週期的一代人沒有經驗，是純粹新自由主義造成的結果。現在，新一代正在領導這一進程。所以，我們拭目以待。我們將看到未來的結果如何。這是未知的，目前是未知的。

另一個層面是選舉的。這另一個層面上只有一個很重要的國家——阿根廷。那裏發生的事情是明確的，正如委內瑞拉將決定地緣政治和社會局勢一樣。2019年10月阿根廷的選舉結果將是決定性的。這是關鍵的選舉。我們正處於馬克里完全衰落的時刻，特朗普繼續押注他所有的牌，賭馬克里將再次當選。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即將違約的國家提供這些不尋常的貸款，一個無法償還債務的國家，獲得威

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財政平衡的貸款。這將作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拯救馬克里的冒險經歷而成為歷史。我的看法是不會成功。說到這裏，你注意到，馬克里的成功是非常不可能的。非常不可能，但不能排除。因此，阿根廷的週期變化，另一個政府上臺，即使不是克莉絲蒂娜·費爾南德斯·德基什內爾領導，也將改變該地區的所有事實。

費爾南德斯的態度非常保守，非常保守。但是，如果她上臺，她說什麼或她會是什麼並不重要，她的到來將意味著一個非常，非常有意義的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說，阿根廷的未來幾個月對於選舉情況至關重要，而且由於阿根廷很可能處於經濟危機、債務違約或類似巨大債務之中，這將對整個區域產生影響。這將發生在社會動員水準低於我們習慣的國家，但比其他地區的正常水準要大得多。因此，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阿根廷是這一切的中心。

最後，我們必須看看在意識形態層面，在備選方案的建設層面上發生了什麼。在這方面，這也是艱難的時期，但拉丁美洲左派在過去十年的所有建設仍然屹立不下。我們將看到如何被詮釋的。美洲玻利瓦爾省聯盟（ALBA）仍然屹立不倒，巴西的無地農民運動（MST）依然屹立不倒，拉美左派的知識網路依然屹立不倒，拉美馬克思主義依然活躍。在理論層面上，取得了重要進展。這是一個非常富有成果的十年。有許多拉丁美洲知識份子寫了非常有趣和原創的東西，反映了拉丁美洲跌盪的情勢。從這個意義上說，在知識層面，我認為，我們對正在做的事情也是可以樂觀的。



原文來源：《國際視點》2019年6月21日，
<http://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6127>

竭力尋求社會主義

吉迪恩·利維、伊利亞·布德拉伊茨基斯

以下乃加布里埃爾·利維 (*GABRIEL LEVY*) 對伊利亞·布德拉伊茨基斯 (*Ilya Budraitskis*) 《持不同政見者中的異見者》 (*Dissidenty Sredi Dissidentov*) 的回應，以及布德拉伊茨基斯對這一回應的回應。^[1]

加布里埃爾·利維(2018年6月17日)

在俄羅斯社會主義者伊利亞·布德拉伊茨基斯的這本書中，"新冷戰"是最具政治吸引力的文章主題。2014年夏天，俄羅斯軍隊湧入烏克蘭東部，與俄羅斯武裝的分離主義的"人民共和國"民兵以及加入他們的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者、雇傭兵和志願者並肩作戰，當時他寫下了這一本書。

布德拉伊茨基斯認為，在公共輿論中，"新冷戰"的存在已經被視為"明顯和無可爭議的事實"，但"輿論的生產已經走在了現實的前面"（第112-113頁）。

為了進一步質疑這些輿論背後的假設，在題為"知識份子與冷戰"（“Intellectuals and the Cold War”，此處為英文）的文章中，布德拉伊茨基斯考慮了原始冷戰，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91年期間發生在蘇聯集團與西方列強之間的冷戰的性質。他寫道，冷戰是一套"世界秩序原則"，由統治精英解釋，然後在知識界輿論和群眾的日常活動中得到確認（第112頁）。

持續的心理動員，以及對全球軍事衝突的擔心令整個社會神經緊繃，這個現實，成為一種實在的手段，作用在兩代人中，其中對信仰的忠誠結合著恐懼和面對命運的無助感。

冷戰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控制手段，通過這種手段，民眾被系統地剝奪了活動能力，這個前提，無疑對我有用。我懷疑布德拉伊茨基斯是否知道冷戰期間作為分裂對立一方的"西方"所做的努力，即嘗試分析這一鴻溝的中心面 —— 例如希勒爾·蒂金 (Hillel Ticktin) 等人在社會主義雜誌《批判》(1973年) 早期期刊上所做的工作。（蒂金寫了蘇聯的政治經濟，在世界資本主義的背景下詮釋。期刊網站在這裡。）

布德拉伊茨基斯認為，今天，冷戰的二元意識形態限制繼續存在。"今天仍未克服在敵對陣營之間作選擇而造成的創傷"（第123頁）。例如，他引用了對俄羅斯參與烏克蘭東部戰爭的反應，一方面，是俄羅斯極右翼的"歐亞主義者"亞歷山大·杜金 (Aleksandr Dugin)，另一方面，是美國歷史學家蒂莫西·斯奈德 (Timothy Snyder)。（請參閱此處（僅俄語）和此處。）

對杜金來說，烏克蘭東部的軍事衝突相當於"俄羅斯回歸歷史"。對斯奈德來說，這證實了烏克蘭最終必須承認它是歐洲的一部分。杜金的反歐洲或斯奈德的歐洲，沒有第三條路的餘地，布德拉伊茨基斯沮喪地如此斷言（第120頁）。

至少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比較樂觀。不可否認，精英控制的公共論壇日益被這種兩邊一面的輿論所支配。在"左派"方面，這種錯誤的二分法反映在"地緣政治"立場上，這種立場以帝國主義集團的有關性質為基礎，整體上否定或阻止社會的作用，特別是否定或阻止社會運動。但是這些社會運動是存在的，在知識份子中也有聲音反映了這些社會運動。

避開非黑即白的選擇

從20世紀40年代後期開始，在西方和蘇聯，知識份子開始轉變，"從能夠單純地執行意識形態規則的一個團體，轉變為準備獨立制定規則，使其更精確並且複製的團體"，布德拉伊茨基斯這樣寫道（第113-114頁）。在蘇聯，知識份子受到國家帝國主義和沙文主義政治政策的限制。這不僅界定了20世紀60年代關於科技革命和"具有人性的社會主義"的辯論，甚至界定了1970年代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關於"國家"和"普遍人文主義"價值觀之間關係的討論。

布德拉伊茨基斯認為，知識份子的"第三條路"，即避開"東西方（國家）衝突的二元對立結構"是"不可能的"，這是"不言自明的"，而且"不需要上層的特別確認"。對他來說，證據是，在1991年蘇聯解體前的20年裏，官方的"馬列主義"完全失

信，"這種崩潰"只能理解為軍事政治集團[即西方集團]的勝利。"（第115頁）。

為了更加謹慎並且有把握起見，我讀了這篇文章。我承認，西方關於上世紀90年代"共產主義崩潰"的自由主義說法在西方那些被稱為"公眾輿論"的空間---報紙雜誌，學術界等等---變得無處不在，勢不可擋。但在西方和前蘇聯國家，知識份子中肯定有部分人是持異議和批評意見的，特別是以更廣泛的蘇聯時代常有的方式去理解的話。

在俄羅斯，這些公共空間正在以新的方式形成，不受審查。在蘇聯解體前後，俄羅斯新聞業處於鼎盛時期，在聯合控制和普京時代的審查收緊之前，直接猛烈抨擊腐敗和第一次車臣戰爭的恐怖。在電影中，開始了對斯大林主義的清算，從萊姆·克利莫夫（Elem Klimov）的《過來看看（Come and See）》（1985年）到尼基塔·米哈爾科夫（Nikita Mikhalkov）的《被太陽燒毀（Burnt By The Sun）》（1994年）。在文學中，維克托·佩萊文（Viktor Pelevin）的"‘P’一代（Generation “P”，生長於普京時代的人）"（1999年）奇幻地將葉利欽的政權變成了一個荒謬的幻影。

這些只是當時開始俄羅斯旅遊的西方左派的記憶（也許是玫瑰色的？）。但是我想知道，這種豐富而混亂的發酵物是如何配合布德拉伊茨基斯論點的。

持不同政見者的歷史

布德拉伊茨基斯著作的中心部分是一篇較長的論文<持不同政見者中的異見者>，追溯上世紀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戈巴契夫改革時期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的社會主義傾向。這是一篇引人入勝且有價值的作品。

布德拉伊茨基斯描述了（第34頁）20世紀50年代末蘇聯的"社會不滿浪潮"，呼應了匈牙利、波蘭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工人起義——從車臣（1958年）和哈薩克（1958年）的大規模暴亂到對穆羅姆（Murom）和亞歷山大羅夫（Aleksandrov）的共產黨辦公機構的抗議和襲擊（1961年），並最終導致諾弗切爾卡茨克（Novercherkassk）叛亂（1962年）——不僅形成了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1956年）和尼基塔·赫魯雪夫的後斯大林主義"解凍"的背景，而且還導致了第一波社會主義持不同政見者團體的出現。他們大多由大城市的

學生和年輕工人組成，他們總是秘密見面，通常彼此隔絕，他們的活動幾乎總是因逮捕而中斷。

在斯大林統治的最後幾年，曾有先例，如"青年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Youth）"（1948年在沃羅涅日成立）和"爭取革命事業聯盟（Union of Struggle for the Cause of Revolution）"（1951年在莫斯科成立）。這些學生團體很快被逮捕和長期監禁鎮壓。但是，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解凍"帶來了這樣的公共論壇，如在莫斯科聚會，在弗拉基米爾·馬亞科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的雕像前讀頌詩歌和討論，並相應擴大政治活動。

社會主義的意義，當時和現在

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保守派，以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為首，在政治上向右翼滲透，對我來說，布德拉伊茨基斯對此的描述是最有趣的段落之一。

1974年，索爾仁尼琴被迫移民後不久，就對社會主義這一理念，尤其是社會主義持不同政見者發起了猛烈抨擊。他的主要目標之一是歷史學家羅伊·梅德韋傑夫，後者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受"歐洲共產主義"的影響，曾提出"經濟、教育和權力結構的民主化"，他認為可以通過非法出版物（samizdat），並通過包括對共產黨成員施壓這樣的官方管道，來追求這一目標。。

梅德韋傑夫作為一方，索爾仁尼琴及物理學家安德列·薩克·哈羅夫是另一方，除其他分歧外，雙方為了捍衛社會主義詩人巴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要向智利獨裁者奧古斯托·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發出呼籲，但雙方在呼籲措辭上產生嚴重分歧，關係緊張到了必須了斷的程度。梅德韋傑夫蔑視皮諾切特的"智利復興和鞏固之年"（其基礎是殺害和折磨數千名反對者）。布德拉伊茨基斯對此作了描述(pp. 65-66)。

在文集《從廢墟下麵（From Under The Rubble）》（1974年），索爾仁尼琴譴責"清理"同官方路線的分歧"微不足道的"馬克思主義者。他顯然想到了梅德韋傑夫。後者在地下出版物上回應說，對索爾仁尼琴來說，"總的來說，社會主義思想與其在現實中的實施沒有任何區別"；社會主義之所以在俄羅斯和中國等國家中獲勝，正是因為那裏數百萬人在資本主義下的生活苦難是如此的

嚴重。布德拉伊茨基斯寫道（第68頁）：

然而，對於地下刊物讀者中的很大一部分來說，這些結論很難令人信服。相反，與《古拉格群島》的作者（即索爾仁尼琴）相比，梅德韋傑夫的立場被認為是適宜和合作的。

正是在這個時候，持不同政見者的環境開始出現馬克思主義語言的使用——這在蘇聯政治和學術界（梅德韋傑夫工作過的地方）是完全主導的——本身就是負面的。“在對立的思想討論中，馬克思主義被視為一種‘蘇聯語言’，使用這種語言是不體面的”。

在我看來，這個觀點開始觸及到了問題的核心，這些問題不僅是蘇聯持不同政見者所面臨的，而且是任何想根據俄羅斯革命和蘇聯經驗瞭解社會主義的人也面臨的。我熱切地請求布德拉伊茨基斯進一步展開這一主題。

布德拉伊茨基斯所寫的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持不同政見者地下團體，既沒有梅德韋傑夫的威信，也沒有索爾仁尼琴的名聲，他們冒著被捕和監禁的危險，試圖恢復“社會主義”的含義。這個思想曾如此有力地激發了19世紀工人運動，激發了俄羅斯工人、農民和士兵舉行1917年的革命，在蘇聯戰後時期，這一思想的意義完全被弄亂了。每本教科書中無生命的“馬克思主義”文章，都是笑柄。這種語言確實變得不雅了。我清楚地記得，當我在1990年第一次訪問蘇聯時，我向新獨立的工會運動中的激進分子宣佈自己是社會主義者——他們看著我，好像我有兩個頭。在我天真的西方頭腦中，這個詞的積極內涵根本就沒有記錄在他們“社會主義”的生活經歷中。

社會主義思想被糟蹋了；其意思已經翻了個身。這個問題——我不瞭解，那些工人可能也不清楚——是持不同政見者在20世紀70年代一直爭論的。今天，在“社會主義者”巴沙爾·阿薩德和“共產主義者”習近平時代，仍未得到解決。

布德拉伊茨基斯關於俄國革命一百周年的文章《沒有繼承者的遺產》（“Nasledie bez naslednikov”）並沒有澄清這個問題。他爭辯說（第130頁），“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目標不是出自階級鬥爭本身的動態”；相反，只是擺出一幅康德式必行態勢；“列寧主義政黨承擔了這一道德負擔：一個國家向沒有任何定義準備的社會主義過渡”。很公平。但是布爾什維克試圖建立什麼樣的“社會

主義”呢？這種“社會主義的建構”，在俄羅斯及其境外，對社會主義作為目標的理解產生了怎樣的腐蝕作用？

在我看來，在布德拉伊茨基斯對持不同政見者的研究中，更有效地尋求一個有意義的社會主義靈魂。他解釋了（第56頁）弗拉基米爾·列寧的國家和革命如何成為20世紀60年代社會主義持不同政見者的關鍵文本。在革命前討論未來的社會主義國家會是什麼樣子時，列寧最充滿希望最民主的嘗試——與19世紀歐洲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更具有遠見和烏托邦式的想像不同——正式出版了，因此，在蘇聯可以廣泛引用。

列寧格勒持不同政見者米哈伊爾·莫洛斯特沃夫（Mikhail Molostvov）于1956年成立了討論小組，不久後被送到監禁營7年，他在回憶錄中說，工人在圖書館裡四處走動，在一些《國家和革命》書本中的一些段落下劃重點線，這些段落呼籲定期選舉和罷免所有官員，並限制其薪酬在平均水準。那一代的另一位持不同政見者伯里斯·威爾（Boris Weill）在監禁營會見了工人，這些工人用繪有鐵絲網的包書紙重新遮蓋了正式出版的列寧著作而被捕。

這些故事提醒我，索爾仁尼琴的早期小說——儘管他在1970年代倒向右翼，但對我來說，這些小說仍然大為有助於我對斯大林主義的理解——充滿了對這些問題的參考作用。在‘第一圈（The First Circle）’（第19章），他講述了列寧在《國家和革命》中，關於每個廚師都能參與國家管理的沉思。如索爾仁尼琴想像的那樣，斯大林的想法是列寧做過承諾，這些承諾變成了擊打斯大林背部的棍棒。每個廚師都能管理這個國家嗎？他（列寧）究竟在想些什麼事情？每個廚師星期五不去做飯，但去地區行政辦公室工作？廚師就是廚師：她必須做飯。但指導人民——這是偉大的召喚，只能信任特殊幹部，特別是所選的幹部。

《第一圈》（第90章）中的人物討論蘇聯特有的精神變態的“公正不平等”（？！）。在《癌病房（Cancer Ward）》（第29章）中，帕維爾·魯薩諾夫，這位代表蘇聯“工人國家”的人事官員和惡霸，受到主角英雄奧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譴責。當你有如百合般的白手時，你對工作瞭解多少？

在20世紀60年代末，在這些發表在地下刊物

上並在西方出版的書中，索爾仁尼琴顯然已經擺脫了蘇聯官方"馬克思主義"及其扭曲語言的束縛——而此時他還沒有發展出明確的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學生和持不同政見工人也有這種突破嗎？還是像羅伊·梅德韋傑夫一樣，他們在語言上，因而在某種程度的意識形態上，仍然受到官方框架的制約？布德拉伊茨基斯從他們的政治宣言中引用了引人注目的一些話，其中許多將蘇聯經濟描述為剝削性的，其政治制度是等級制度，這讓我想知道得更多。

有一些相關問題，就是關於監禁營作家（索爾仁尼琴最廣為人知）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布德拉伊茨基斯所研究的一小群學生和工人。這些群體在多大程度上將這些監禁營——在許多方面是一個隔離的世界——融入了他們對蘇聯社會和經濟的理解呢？他們讀過索爾仁尼琴嗎？瓦拉姆·沙拉莫夫（Varlam Shalamov）呢？我想，他比索爾仁尼琴在精神上更接近左翼持不同政見者——他的社會主義人文觀，他成形於年輕時20世紀20年代工人運動中的政治思想，甚至在他後來作品的悲觀情緒。在這裏也如此，我用局外人的眼睛，在我倫敦的家裏舒舒服服，讀著這些不是地下刊物的書。但我也許不是唯一的西方讀者，以索爾仁尼琴和沙拉莫夫為墊腳石，需要嘗試同布德拉伊茨基斯所指的這些墊腳石聯合起來。

地下分析

布德拉伊茨基斯對小型地下組織的關注是值得歡迎的，因為他們遠不如國際知名的持不同政見者那麼引人注目。他解釋道，那些自認為是社會主義者的人，幾乎都把蘇聯制度描述為具有階級分化特點的剝削制度。1956-57年，盧沃特·皮梅諾夫（Revolt Pimenov）與伯里斯·威爾（Boris Weill）在列寧格勒建立了持不同政見團體，他起草了一些文章，聲稱在蘇聯，"國家已成為唯一的資本主義者、唯一的地主和唯一的思想者"。布德拉伊茨基斯寫道（第49頁），對於皮梅諾夫，蘇聯經濟是"國家資本主義"；國有財產不能社會化；國家財產和社會主義是相互排斥的。另一個由莫洛斯特沃夫（Molostvov）組織的列寧格勒集團，雖然宣稱斯大林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都走上了官僚主義的道路，但與皮梅諾夫不同，提出了政

治方案，清楚地看到了改革前進的道路，主張"廣大勞動人民被納入國家管理中"（第50頁）。

一些左翼持不同政見者——如果我正確理解布德拉伊茨基斯的說法——因為蘇聯所有的反動特點，將其視為邁向真正社會主義社會的踏腳石。例如，20世紀60年代在列寧格勒成立的公社聯盟（the Union of Communards），其主要綱領檔取名為"從官僚專政到無產階級專政"，並收進了列寧宣導建立共和國的一篇題詞，提出要有選舉和罷免所有官員，"沒有警察，沒有軍隊，沒有國家官僚機構"。

社會主義持不同政見者政治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他們的國際主義，在1950年代，國際主義支撐著他們對東歐工人起義的支持，1968年又支持了"布拉格之春"。布德拉伊茨基斯強調（第73-76頁）烏克蘭和其他非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的社會主義持不同政見者的作用，他們試圖將社會主義思想與從俄羅斯帝國主義手中爭取民族解放的思想相結合，這與索爾仁尼琴和其他俄羅斯右翼持不同政見者日益尖銳的民族主義形成鮮明對比。

20世紀60年代中期赫魯曉夫政治"解凍"的結束，揭開了持不同政見者處境史上的新篇章。改革分子對蘇聯官僚機構"自我改革"的希望破滅了。布德拉伊茨基斯認為，社會主義的異見繼續遵循著兩個平行的趨勢：一種是工作在大城市的持不同政見環境和人權組織中的人，包括羅伊·梅德韋傑夫等知名人士；另一個包括"延續'解凍'傳統的地下社會主義團體"（第61頁）。

在1960年代後期，到1970年代，這些團體在整個蘇聯各地反復和重新出現：布德拉伊茨基斯撰寫了（第77-78頁）在基希涅夫（Chisinau，莫爾達瓦）、奧德薩（Odessa，烏克蘭）、塔林（Tallinn，愛沙尼亞）、沃羅希洛夫格勒（Voroshilovgrad，現為烏克蘭盧甘斯克）、裡亞贊（Ryazan），薩拉托夫（Saratov），彼得羅紮沃茨克（Petrozavodsk），高爾基（Gorky，現下諾夫哥羅德）和斯維爾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現在的葉卡捷琳堡），以及在列寧格勒和莫斯科的團體。"實際上，他們幾乎都採取了馬克思主義和'清理淨化'['ochishchenny']"的列寧主義的立場，認為[共產主義]黨已經墮落，蘇聯是某種或其他一種剝削社會"。這就是梅德韋傑夫和索爾仁尼琴衝突的背景。

蘇聯獨裁政權嚴重依賴控制和限制資訊流通（在這方面，至少在21世紀是無法複製的），持不同政見的團體在令人窒息的封閉環境中工作，經常只在監獄裡才瞭解彼此的存在。據我所知，布德拉伊茨基斯的文章是後蘇聯社會主義者第一次開始總結、比較和思考他們共同的經歷——這在當時是幾乎不可能的。我希望很快被翻譯成其他語言，並且希望關於持不同政見者遺產的討論將不僅在前蘇聯國家進行，而且還在國際上進行，他們為了恢復被蘇聯禁錮的社會主義的意義而英勇戰鬥，同樣重要。

伊利亞·布德拉伊茨基斯：環境如何界定"第三立場"的可能性

我可以說，我加倍感謝加布里埃爾·利維（Gabriel Levy）對我的書的回應：這不僅是細心和受過教育的讀者的評論，也是政治活動家的評論，這位社會主義活動家在將近三十年前目睹了蘇聯的解體。利維的政治立場，幫助他對這個戲劇性的過程，及其多樣性和矛盾作了評估：一方面，社會運動的氣氛，強烈尋求蘇維埃制度的民主替代物，廣泛的礦工罷工，以及獨立工會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殘酷的原始積累、轉向市場的破壞性過渡、大規模貧困以及後蘇聯政權演變的開始，我們今天仍然生活在這些過程的後果中。

這一經驗產生了問題，從本質上講，過去二十年來，俄羅斯左派沒有認真考慮過這些問題。“真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崩潰的客觀原因是什麼？在反對官方當局和自由反對派對蘇聯遺產的歷史政治猜測方面，我們能夠而且必須反對些什麼？最後，我們怎樣才能在我們自己的歷史延續與二十世紀的俄羅斯社會主義傳統之間建立一種關係呢？

顯然，我的文集《持不同政見者中的異見者》沒有徹底研究這些問題，但我希望有助於將問題正確地提出來。該文集中包括蘇聯社會主義持不同政見者歷史大綱在內的文章，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涉及到在蘇維埃制度的無批判性道歉和激進的反共產主義之間建立“第三立場”的可能性。

今天，“新冷戰”的言辭——再次更多的是“鬧劇”而不是“悲劇”——重新引出了強制人們在兩個對立陣營之間作選擇的邏輯，過去的許多知

識份子，從薩爾特（Sartre）和薩哈羅夫（Sakharov）的都屈從於這一邏輯。要擺脫這種選擇，擺脫其所顯示的政治獨立性的喪失，這些嘗試，往往被視為逃避責任，對社會解放或爭取人權的真正鬥爭漠不關心（在二中選一的冷戰邏輯中，人們被迫相互對立）。

這樣，“第三立場”的可能性不是一勞永逸的教條，而是由具體的力量情況確定。來自左翼的社會主義持不同政見者，在這些環境的不斷壓力下採取行動——不僅是蘇聯政權的鎮壓，還有知識份子情緒的“右轉”。從20世紀70年代初，這些就顯而易見。（蘇聯和後蘇聯知識份子的矛盾社會和政治性質問題，是我文集中另一篇文章的主題。

蘇聯的解體導致了蘇聯知識份子作為一個社會群體及其特定意識的崩潰。加布里埃爾提到的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驚人文化人造物基本上反映了這一階段，即知識份子思維方式的瓦解，以及一般社會意識的分裂。從“格拉斯諾斯特”時代（大膽地觸及過去創傷，這在以前是被禁止的），知識份子轉向1990年代的後現代主義。硬幣的另一面往往是教條式的政治判斷——最重要的是，關於“蘇聯”的永恆幽靈，因為這個幽靈阻礙了後蘇聯俄羅斯向全球現代性和“正常性”的過渡。（我在《永遠尋找紅色人類》（Eternal hunt for the Red human）一文中寫到這一點，在我的書裏也有。

在我看來，《持不同政見者中的異見者》中提出的思想可能不僅對俄羅斯左派，而且對目前國際上關於現代俄羅斯的政治性質及其與過去的蘇聯的關係的討論具有重大意義。

如果其他人希望加入這個討論，請給我發電子郵件投稿，按照通常的準則 [2]，我很樂意發佈這些來稿。

註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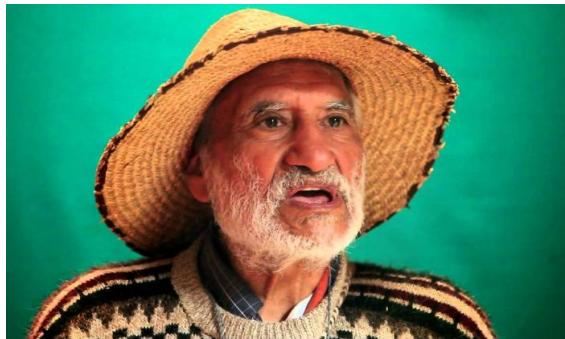
[1] 《持不同政見者中的異見者》(*Dissidenty Sredi Dissidentov*)於2017年自由馬克思主義出版(俄語版)。

[2] 參見此處：

<https://peopleandnature.wordpress.com/about/>

本文譯自：《國際觀點》，2019年3月29日，<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6007>

雨果·布蘭科：未來屬於土著 特德·漢密爾頓



布蘭科是拉丁美洲馬克思主義革命家菲德爾·卡斯特羅和切·格瓦拉的同齡人（他和格瓦拉在幾場辯論中是相對的兩方）。20世紀60年代初，他組織農民，從安第斯山脈中部的封建莊園主手中奪回土地。他被秘魯政府監禁多年，被控謀殺一名在戰爭中喪生的警察（布蘭科否認指控）。在獄中，他寫了《土地或死亡》(*Land or Death*)，提出如何在安第斯地區依靠土地改革的努力，發起共產主義運動。他的激進思想讓他遭到來自各方面的死亡威脅，他在智利、瑞典和墨西哥流亡多年。近年來，他回到秘魯。

布蘭科吸引我的，與其說是他的反叛經歷，還不如說是他當下的社會活動。受不了全球環境危機和私營企業對本土土地的侵佔——最近出現在美國聳岩（Standing Rock）地區的對抗中——布蘭科成了世界各地土著運動的宣導者。

布蘭科在秘魯的庫斯科(Cusco)地區長大，講土著語言，克丘亞語(Quechua)。2007年，他創辦期刊《土著鬥爭》(Indigenous Struggle)，內容涉及與土著群體發生衝突的政治和經濟力量。他繼續鼓吹土著社區以成功的方式對付威脅環境的全球新自由主義勢力。布蘭科在接受《無許可之許可權(Sin Permiso)》雜誌的採訪時說："土著運動是先鋒。"在反對這一制度和建立另類社會組織的鬥爭中，土著運動是最先進的。

83歲的布蘭科告訴我，現在，他不再外出，儘管他剛剛結束為期一個月的墨西哥之行，去看望反採礦活動人士。他的家裝飾簡樸，擺滿了

舊書和雜誌；他行事低調卻待人熱情。就我們兩人坐在餐桌旁。在談話中，他彬彬有禮，但坦率直接，用多年旅行和流放時的逸事趣聞來加強他的想法。

現在看來，拉丁美洲馬克思主義起義的時代似乎很遙遠，但布蘭科認為，這與當今問題有關。在我們的討論中，他以西班牙語熱情地談論特朗普、全球變暖、自然權利以及土著運動在當今全球政治氣候中的重要性。

《格爾尼卡》網絡雜誌訪問雨果·布蘭科

格爾尼卡：多年來，你一直把精力集中在財富分配和社會正義上。為什麼氣候變化現在成為緊迫的問題？

雨果·布蘭科：我一直為社會平等而奮鬥。但現在有更重要的問題：我們物種的生存。跨國公司統治一百多年，隨著他們把其他物種滅絕，他們將滅絕人類。

這些大型跨國公司的目標，是在最短時間內獲得最多的資金。為此目的，他們襲擊自然。為了這一目標，他們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在各地，包括在美國，水力壓裂毒害人們的飲用水源。政府或多或少也代表跨國公司的利益。甚至進步的政府也屈服。

格爾尼卡：你說過，土著群體可以在對抗全球變暖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怎麼會這樣？

雨果·布蘭科：近來，對大自然的打擊是強烈的，所以有更多的人起來保護生態系統。生態學家尊重土著，因為土著保護自然，而相對看輕金錢一類的東西。我是克丘亞土著人，我們有敬愛和崇拜自然的原則，在克丘亞，我們稱自然為Pachamama，或大地母親。但是，大洋洲、非洲、亞洲以及瑞典和芬蘭北部都有土著人民。土著人民的特點是，他們更熱愛自然、團結和合作，

而不是個人權利。

例如，在南非有人類學家與土著兒童的故事。他把一些糖果和水果放在樹上，他告訴孩子，“起跑，第一個到達那裏的人就得到所有東西。”孩子手牽手一起跑在那裏，把所有東西都分給大家。“你為什麼這麼傻？我說過，第一個到達者得到一切。”他們回答：“如果我們其中有一個人沒有糖果或水果，我們都會難受。我所以存在，是因為有你存在。”

在庫斯科 (Cusco) 一所大學學習農學的教師，當他們參加農民的農業博覽會時，他們瞭解到，不應該給種植最大馬鈴薯或最多馬鈴薯的人頒獎，而是給生產最多品種的人頒獎，因為當地土著認為這更重要。如果你問，“你在土地上生產什麼？”他們會說，“什麼都有”，河邊有鱷梨，山頂有土豆。

在秘魯，有些蘑菇只有在雨季才會生長。在庫斯科市場，有農民 (campesina) 出售一堆堆這種蘑菇。我告訴她，“我全買了，但你不用給我折扣。”對她，這應該是個很好的交易，因為通常賣得多則價格更低。但她告訴我，“不。如果我把他們都賣給你們，我該賣別人什麼？”銷售不僅僅是生意，而是社會關係。

我舉這些例子表明，作為“土著”是有意義的。有些人稱我們土著為“原始人”，他們是對的。因為我們保留了整個社會曾經擁有的原始組織，橫向平行的。他們稱我們為“野人”，我認為他們也說得對，因為野人是那些沒有被馴化的人。禿鷹是野生動物，公雞是被馴養的。我寧願當禿鷹，也不願當公雞。

格爾尼卡：有可能在國際層面上利用這種集體力量嗎？

雨果·布蘭科：我支持全球人民自我治理的觀點。這是對抗全球變暖和防止自然毀滅的唯一救贖之法。因此，土著人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受尊重。

馬克思從黑格爾學到哲學原理。首先是肯定，即命題；然後是否定，這是反命題；然後是統一，又回到命題，並納入反命題的元素。其命

題是原始社會：橫向的，而不是等級的。之後來到是[對立面]，文明：種姓制度，在歐洲是垂直的階級，由那些按照自己的利益進行控制和統治的人領導。而統一是該命題的復活，或再次走向橫向社會，用反命題的元素使其豐富，或者恢復社會的進步成份，不把物種生存置於險境。我認為我們需要達到這個統一。當整個社會都參與治理時，我們會達到。

我不相信領導者、強者或管理者。但我認為，我們需要推動的是集體運動。這就是我所相信的：自下的力量。有組織的社會可以這樣。

格爾尼卡：你能給我舉幾個例子嗎？

雨果·布蘭科：我在利馬坦博 (Limatambo) 見過，利馬坦博是庫斯科附近的農民地區，在墨西哥、希臘也有例子。在利馬坦博，農民問，“為什麼市長總是莊園主的兒子？為什麼我們不能提名自己的人？”因此，他們設立無記名投票，他們贏得了選舉。但能夠治理的並不是個人，社區會議才能夠治理。這是人民的任務，與墨西哥薩帕蒂塔人 (Zapatistas) 所做的事是一樣的。

薩帕蒂塔人有三級治理：社區、縣市和區域。按照“服從領導”的原則，成千上萬的土著民主自治。人民選擇一組男女作為治理者，但他們不選擇總統或秘書長；所有被選中的人都有相同的等級。一段時間後，他們改選所有人，沒有連任，所以每個人都在前臺，沒有不可或缺的人。當遇非常重要的問題時，他們召開大會，作集體決定。任何級別的權威都得不到一分錢。他們就像農民，每人都得到他們的那份口糧。毒品和酒精是被禁止的。我不知道你是否會稱之為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或共產主義。不過，我對此措辭也不感興趣。

我喜歡一位同志對我說的：“他們選了我。如果他們選我為社區治理者，那沒關係，因為我仍然可以為丈夫和孩子做飯。但他們選舉我為市政府工作。那我該怎麼辦？我不得不出行。我不得不教我的孩子如何做飯，這很好，因為現在我媳婦可以接受遠方的崗位，我兒子知道如何做飯。”因此，他們正在進步。

我們在那裏[與薩帕蒂塔人一起]，他們解釋他們如何養活自己，他們如何照顧自己，他們是如何帶回土著知識的。但是他們並沒有拒絕西醫，接納其他地區的外科醫生和醫生，這些醫生教他們如何建立和經營診所。他們不僅接受薩帕蒂塔人，而且還接受黨派成員(partidistas)。但是，黨派成員必須支付藥費 - 薩帕蒂塔人完全免費治療。最近，薩帕蒂塔人告訴我，"嗯，在診所裏，黨派成員比薩帕蒂塔人更多——因為自從我們養活自己以來，我們就不生病。

墨西哥切倫小鎮也有土著選擇自治。有一天，當墨西哥各地舉行市政選舉，各黨派來到切倫進行競選宣傳時，市民說：“不，我們不想要政黨，我們不接受任何宣傳”。然後，他們決定選舉自己想要的人，所以他們選出另一個管理委員會，沒有管理一切的總書記或總統。墨西哥總統佩尼亞·涅托不得不承認他們，並說，“既然他們是土著居民，他們有權遵守自己的習俗和傳統。”因此，他們有市議會，指揮武裝市政警衛保衛地區邊境與內部秩序。

在希臘，面對政府的緊縮政策，來自基層的活動有所增加。例如，政府放棄國家電視臺，在塞薩洛尼基(Thessaloniki)，工人控制電視臺，他們採訪了我。後來，由於他們關閉診所，醫護人員——護士和醫生——就起來成立診所。還有一家出版社由工人接手。雅典也有許多餐館由工人接手。有合作社從農村接收貨物並出售，避開中間商。我告訴他們，“你在這個城市做的事，正是薩帕蒂塔人在農村所做的：創造力量”。就這樣。政府是服務每個人的。不是服務一個政黨、一個人或一個領導人的政府。

格爾尼卡：土著群體是唯一適合與資本主義利益作鬥爭的群體嗎？

雨果·布蘭科：當然不是。你可以看到美國與克斯通[Keystone]輸油管道的鬥爭，在那裏不僅土著，還有來自美國各地的其他維護水源的人。當然，特朗普現在命令他們“建造管道”。但有抵抗。更重要的是，我相信最強烈的抵抗是婦女遊行。最大的反特朗普抗議是婦女遊行。在秘魯，該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遊行是利馬的尼·奧納·梅諾斯(Ni Una Menos)遊行，這是婦女遊行。

在阿根廷的羅薩里亞，有婦女遊行。在波蘭，他們也在為墮胎權而戰。我認為，婦女現在是先鋒隊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正在建造新世界。不僅是我們，還有社會正義的鬥士，還有那些致力於生產生態產品的人，那些從事另類自然醫學和另類自然教育的人，那些接管工廠並自治的人。他們都在為新世界而戰。

格爾尼卡：印度一家法院最近承認恒河(Ganges)和亞穆納河(Yamuna)擁有法律權利。自然的權利也出現在厄瓜多爾和玻利維亞的憲法中，許多土著群體認為這些權利很重要。你覺得這個思想怎麼樣？

雨果·布蘭科：我們必須捍衛[自然權利]，因為我們是自然的一部分。

紐西蘭當局在捍衛自然和人類方面邁出重要的一步，其他國家政府應當跟隨這一步驟。[紐西蘭北島的]萬加努伊河(Whanganui)現在是“法人”，因此，根據紐西蘭議會簽署的開創性協議，享有權利和義務。這意味著，這條長期受到毛利人崇敬的河流將享有與人同等的權利。毛利人萬加努伊部落已經為這條河流奮鬥了大約150年，這條河流是該國第三大河流，被公認為是祖先，即活的實體。現在，議會終於通過法律承認。

此外，2014年，阿爾貝托·阿科斯塔(Alberto Acosta，厄瓜多爾前能源和礦業部長)在利馬呼籲承認自然權利。他說，我們不會等待新自由主義政府這樣做，因為他們永遠不會承認自然權利。他在利馬組織保衛自然的會議。

格爾尼卡：你對未來幾年的土著群體有什麼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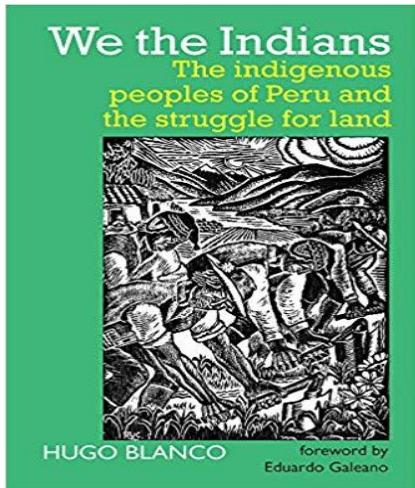
雨果·布蘭科：各大洲都有土著的鬥爭，反對種族主義和殖民心態，反對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政治。在墨西哥恰帕斯，薩帕蒂塔區，23年來發生的事情讓我感到樂觀。我聽到薩帕蒂塔人說：“不要抄襲我們。在適當的位置和時間，每個人將都知道如何做。”

本文譯自：《國際觀點》，2018年1月18日，<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5339>

雨果·布蘭科：從信奉托洛茨基主義到追尋土著力量

安德魯·萊德

以下乃書評《我們印第安人：秘魯土著人民與土地鬥爭》，抵抗叢書、國際研究與教育研究所、梅林出版社。



在關於革命潛力的當代思想上，雨果·布蘭科是重要的人物。他的想法和實際踐行包括了兩個大觀點：

第一，是托洛茨基主義傳統，這個傳統產生于俄羅斯工人革命的經驗，產生于其對官僚墮落和背叛的重要批判，產生於其武裝自衛以保護工人階級自主權的建議。第二，土著人民長期和不斷的抵制殖民者和企業家，因為後者為自己的利益而侵佔土著人民的土地和生活設施。今天，土著人民不想同化為資本主義生產模式，馬克思主義能否被擴展至滿足土著人民的這種需要和願望，是令人十分關切的問題。布蘭科的工作是重要的例子，可用以聯結這兩個立場和方法。

《我們印第安人：秘魯土著人民與土地鬥爭》，由國際研究與教育研究所和梅林出版社出版，布蘭科的這本新英文文集，展示他長期的行動和研究。該書收入的記錄包括他的組織工作、監禁和絕食，以及他對土著社區價值觀和生態經驗的思考。作品還包括他與偉大的秘魯小說家何塞·瑪麗亞·阿爾蓋塔斯（José María

Arguedas）的通信，以及他對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所闡述的新自由主義立場的強烈批評。

雨果·布蘭科是20世紀60年代偉大的游擊隊領袖之一。然而，他的戰略明顯不是當時風行整個南美大陸戰略的變種，後者的靈感來自古巴革命和切·格瓦拉模式。布蘭科自己指出，他拒絕用小型機動戰鬥隊的辦法，迅速對抗和推翻政府。相反，布蘭科呼籲進行防禦性的武裝鬥爭，以維持安第斯地區土著地區的自治權，以便在這些地方上進行長期的民主社會革命。在這方面，布蘭科部分繼承列昂·托洛茨基部分想法，托洛茨基提出人民民兵是適當的社會主義軍事組織形式。在20世紀60年代，布蘭科是第四國際的成員，他認為這是更大的革命戰略的時刻，最終可以推翻政府，並呈現社會主義的新生產模式的前奏。布蘭科的做法也預示後來薩帕蒂塔民族解放軍（Zapatista 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採用的方法。

薩帕蒂塔主義者（Zapatistas）也反對在土著社會民主進程採用有利於民兵的游擊戰略。同副司令馬科斯（Subcomandante Marcos）一樣，布蘭科最終決定，奪取國家權力的目標並不在目前的政治視野中，接受一種或多或少是永久的防禦姿態將更加現實和有效。這樣明顯遠離托洛茨基早先的做法，後者堅持與國家權力發生不可避免的對抗，並需要與其他地方的工人階級組織保持一致。

這為馬克思主義鬥爭和土著鬥爭的銜接提出了重大問題。馬克思主義思想主張工人階級是革命變革的主體。在一些教條式的提法中，這可能導致農村組織和社會集體邊緣化，可以被看作是過去的殘餘。然而，眾所周知，馬克思本人堅持認為有這樣的 possibility，即前資本主義社會可能呈現社會主義新秩序的先河，這些秩序不需要被分解成佔主導地位的城市生產關係。何塞·卡洛斯·馬里埃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對土著傳統社區（ayllu）空間進行分析，認為這

是抵抗資本主義積累和規則的領域，也是社會主義革命行動的潛力基地。布蘭科實際上發掘了馬里埃特吉洞見的潛力。

然而，這留下了土著鬥爭如何影響城市混血工人階級前景的問題。布蘭科自己說，國家和城市之間的對立已經過時，因為新自由主義使整個民眾陷入貧困。這表明，工人階級不同階層之間的團結仍然是基本目標；土著農民社區不是從根本上脫離了資本進程，而是構成工人階級的不尋常的階層，這種階層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價值觀特別不同。因此，這保留對國內和國際革命意識的更廣泛認識，而不是接受地方主義。

因此，這與土著身份的認同問題有關。布蘭科致力於保衛克丘亞（Quechua）和艾馬拉（Aymara）人民。與馬里埃特吉（Mariátegui）一樣，他認為他們繼承共產主義世界觀，這種世界觀與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特有的剝削性個人主義和分工不相容。因此，這是對民族特殊主義的部分辯護；這部分人口特別容易受到資本主義掠奪的影響，但也善於進行抵抗和鬥爭。重要的是，布蘭科拒絕根據遺傳來定義這個群體，相反，他認為這種身份認同是文化的，他認為這種文化是對外來者開放的，外來者可以改變，可以接受土著價值觀。他寫道，“藍眼睛的金髮女郎”可以參與印地安社區，而血脈遺傳是不必要的。布蘭科本人是混血兒；愛德華多·加萊亞諾形容他為“一個聰明、瘋狂的人，他決定成為印地安人，儘管他不是，結果卻是最為印地安的人。”我認為，因此在這裏，捍衛土著的特殊性提出了更廣泛的社會轉型的可能性；不僅“尊重差異”的可能性，而且通過關注這些社區保存維持的經驗和知識，改變整個社會秩序。

布蘭科有時堅持民主人文主義。例如，他堅持認為，“人類的鬥爭可以概括為爭取真正民主的鬥爭。”對他來說，土著傳統社區（ayllu）是直接民主的核心，克服資本主義國家固有的代議異化。然而，在理解布蘭科的人文主義時，也應該知道他深刻尊重非人類的社會成分。他寫道：

我求你，為了我們的蛇類姐妹、我們的蟾蜍兄弟、我們的甲蟲兄弟、為了樹木和植物、蝴蝶、為了幫助我們生存，阻止他們謀殺亞馬遜雨林。

他甚至談到“屬於人類的恥辱”。對布蘭科來說，社會主義的視野不止於人類；他不同意現代歐洲關於人類解放即是統治自然的觀念。在這方面，他與托洛茨基在1924年的著名評論大相徑庭，托洛茨基認為人會根據自己的品味改善自然。布蘭科說“強烈渴望成為一隻豺狼、蝰蛇、蟾蜍，任何只為食物而獵食的動物，任何從不施暴的動物。”布蘭科關於革命的思想，可以這樣理解為挑戰，即根據土著文化必有的某些認識論見解，重新塑造人類、民主和革命的概念。

秘魯人類學家瑪麗索爾·德拉·卡德納（Marisol de la Cadena）通過與馬里亞諾·圖爾波（Mariano Turpo）長達十年的對話，闡明這種世界觀，馬里亞諾·圖爾波是克丘亞（Quechua）思想家，他見過布蘭科，對其委身於政治信念受到啟發。瑪麗索爾·德拉·卡德納發展土著的“地球存在物”（earth beings）概念，即生態和物質存在物具有自身的能力、脆弱性和欲望。她還知道，土著傳統社區（ayllu）不僅是人類民主和集體所有權的世界，也是人類深刻意識到其與非人類成分相互作用的地方。我認為，閱讀布蘭科和馬里亞諾·圖爾波的文章，有助於我們理解土著生活世界如何呈現新的政治可能性，可以辯證地融入馬克思主義傳統。

近年來，我們看見很多人紛紛努力，把馬克思主義革命傳統同土著思想和實踐結合起來。洛葛仙妮·鄧巴爾-奧爾蒂斯（Roxanne Dunbar-Ortiz）、勞爾·齊貝奇（Raúl Zibechi）、阿爾瓦羅·加西亞·里納（Álvaro García Linera）、傑佛瑞·韋伯（Jeffery R. Webber）和葛蘭·肖恩·庫爾特哈德（Glen Sean Coulthard）為兩者結合作出貢獻。雨果·布蘭科深刻的身體力行和自我犧牲，以及長年的努力，使他成為特別有價值的傳奇人物。他傳承托洛茨基在俄羅斯背景下產生的見解，具有拉丁美洲游擊戰的經歷，以及追尋本世紀具有新活力的土著鬥爭精神。他行文零散無章——乃源於實際的鬥爭；但值得我們努力發掘他的探索成果，以豐富當前的政治與文化理解能力。

本文譯自《國際觀點》，2018年12月17日，<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5833>

談王實味與「王實味問題」（轉載）

王凡西

【編者按語：王實味是中共歷史上第一次文字大獄的被害人，本文作者以王實味老同學、老同志與老朋友的資格，為王實味作歷史見證。】

近年來，研究中共黨史的中外學者與一般關心中國民主運動的人，越來越對王實味發生興趣。這是容易理解的。因為王實味是中共歷史上第一次文字大獄的被害人；他是斯大林——毛澤東文藝政策施之於中國的第一個犧牲者；他又是中共內部第一個挺身而出、反對高幹特權、尋求內部民主的知識份子。

具有這樣的身分，儘管王實味在黨內從未擔任過顯要職位，儘管他遺留下來僅有幾篇雜文；可是他在中共思想發展與黨制定型的歷史上，卻確實扮過很重要的角色。以他為象徵的那種思想和作風，當然值得人們注意和研究的。

不過我現在對王實味發生興趣，現在來談他的種種往事，卻出於一種較為狹隘的目的：我要以王實味的一個老同學，老同志與老朋友的資格，用事實來說明他與我個人乃至與中國托派之間的關係。

這個關係似乎已成為王實味能否平反的關鍵了。

（一）

王實味原名思禕，實味是他投稿《現代評論》時開始用的筆名，後來就索性改用這個名字了。他是河南人。他和我於1925年秋季同時考入北京大學，同被編入文科的預科一年級，又同被編在一個小班（全班約20餘人，其中還有後來以「胡風」名字出名的張光人）裏上課，因此生活比較接近。對於文學，特別對於西方文學，他和我有同樣興趣。我們都受到當時北京文藝空氣的影響，都喜歡向各種報刊投點稿。在三·一八慘案前後，我們又都從布希米亞式小文人變成革命的共產主義者。這一些愛好上與思想發展上的共同點，很自然地使他與我之間形成了比較親近的友誼。

我在1925年冬天加入中國共產黨。王實味

入黨大概遲我幾個月。他的入黨介紹人記得是陳其昌，他們二人是同鄉。而其昌入黨比我早，他當時已經是北大黨支部的一名幹事。

成為黨員之後，大家忙於緊張的革命工作，王實味與我之間的私人來往反而少了，有時甚至相隔很久才見一次面。從1926年春天到1927年春天這個時期內，有關王實味的，深刻地留在我記憶中的，只有他的一件戀愛故事。這個故事多少能透露出王實味的性格，多少和他後來在延安所鬧的事情有點關聯。

當時的北大支部中有兩個新入黨的女同志：李芬與劉瑩。她們來自湖南，都是可敬可愛的人。兩個人中，李芬似乎更成熟些，工作能力也更強。因之，一般同學與特殊的黨員同學，對李芬有普遍的好感，而王實味竟愛上了她。為了表達愛意，他給李芬寫了信。可是受信人並無意思。在當時北京的革命黨人中，清教徒式的作風是相當有力的。同志中談情說愛，縱非有背黨紀，至少被看作消極行為，甚至被看作資產階級的浪漫行為。李芬是否受著這種風氣影響，不得而知。總之她沒有理睬，沒有回信；但是王實味卻不肯甘休，再接再厲。一連給對方據說五、六封信。這使得李芬非常不快或不安了，終於把這件事向組織公開。北大支部書記段某，也是湖南人，而且據許多人說，他對李芬也有意思。王實味苦苦的片面追求，既然要他來處理，他便小題大做起來。這是1927年春天，李大釗等已遭逮捕，卻尚未遇害。白色恐怖籠罩了北京，我們的工作進行得非常謹慎和隱秘。可是，這位書記要解決「王思禕事件」，卻在北京爛漫胡同的湖南會館召集了一次北京東城部委和北大支幹會的聯席會議，出席與列席者達十餘人之多，會議幾乎開了一個整天。

事隔58年，我已記不起會議的詳情。我只記得那位段書記（順便說一下，此人大約在一年後脫黨，加入了國民黨。後來聽說做過山東某縣的縣長）氣勢洶洶的發言。他強調王實味之所以入黨，只為了更方便地追求李芬，根本

不是來參加革命的。又說在此白色恐怖極端嚴重的時候，在此党的領導人遭遇大難，鬥爭萬分緊張與異常困難之際，身為黨員的王實味非但不化悲憤為力量，以行動答復鎮壓，卻拼命追求女同志，幹些無恥勾當，實在荒唐之至。他主張會議通過決定，給王實味以嚴厲的黨紀處分，縱然不開除黨籍，也該「留黨察看」。其他到會的人都發了言。大家都批評王實味，其中尤以陳其昌的批評最為厲害。他完全以「大哥」身份來責備這位「小弟弟」，說他不該為此胡鬧。但是誰都不支持段書記的「卑鄙動機論」，沒有一個人主張把王實味開除或給以嚴重警告。我的發言大意是這樣的：男同志給女同志談戀愛，不能算是錯誤；但當一方不願接受而另一方仍不斷追求，那就不好了。現在只要王實味答應不再寫信，事情就算完結。我不主張把主要屬於私人性質的事情，提高到黨和革命的平面來考慮。段書記頗不以我們的「自由主義」的看法為然，但他居於一人的少數，只好服從多數意見。結果給了王實味一個正式批評，要他不再給李芬寫信。

列席會議的王實味（記得李芬沒有來）始終不曾說一句話，靜聽大家對他的批評。等到批評做出了結論，他表示接受，「案子」便告結束，「自我檢討，徹底認罪」的那套辦法，當時是連蘇聯共黨內部都不曾實行呢。

當晚王實味跑到我的寓所來看我，情緒非常激動，說他沒法不愛李芬，不過他會克制自己，不會再給她寫信。同時非常憤怒，極端不滿段書記的見解與作風。他認為段對戀愛的看法是封建的，處理這件事情的態度是官僚的。

「事件」發生後不久，我和王實味便分別了。我去了武漢，他留在北京。隨之而來是革命的大失敗，全國革命者遭到可怕的迫害。彼此在艱難的條件中鬥爭，甚至為最起碼的生活而掙扎。我與王實味不問不聞者達數年之久，一直到1930年春天，才與這位老同學再度搭上關係。那時我已因贊成蘇聯共產黨左派（即所謂托派）的政見而被黨開除，王實味則與黨失去了聯絡，正在尋找回歸組織的路子。

（二）

我被開除黨籍後，為了生活，翻譯了普列

漢諾夫的一本哲學小冊子：《從唯心論到唯物論》，上海滬濱書店出版。王實味見到這本書，立即寫信給書店，請他們將一封附有他住址的信轉交給我。

得信當晚我就去看他。他住在靠近華界的、法租界菜市路的一條小弄堂裏。弄堂很髒，房子很舊，他那個亭子間尤其破敗湫隘。四壁空空，一燈如豆，充分顯出房主人的淒涼光景。

我意外地發現他已有愛人，而這位愛人非他，正是李芬的好友，我們北大黨支部裏的另一位女同志劉瑩。她當時正在產後，躺在床上——孩子呢？因為生下來無法撫養，死掉了！他們讓我坐在一隻破舊衣箱上（這是除了那張破床之外的唯一傢俱），開始了三個老同學一夕談。大動亂中三年離別後的重敘，真有「相對如夢寐」的滋味。

我們自然提起李芬，但談得不多。她此時一定尚未在湖南遇難，或已經遇難而未為他們所知，因為我搜索記憶，李芬壯烈成仁的事，還是後來在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中首次得悉的。他那時最最關心的二件事：第一，急於想弄清楚黨內分成二派的政治歧見；第二，怎樣解決當前瀕於絕境的生活。我費了很多時間給他說明斯大林派與托洛茨基派對於中國革命的不同看法。我對他講了過去革命中的兩條路線，講了二派對當前局勢的不同估計，特別講了黨中央盲動政策的錯誤，以及托派主張以革命民主政綱來重新團結革命力量，以此再度走向新革命的理由。王實味聽了我的說明是有印象的，但他沒在二派之間作左右袒。他自認在這方面主意不夠，知道得太少，今後要多多留心研究。他告訴我，他和劉瑩此時都失去了與黨的聯繫，正想重行歸隊。不過在重新參加組織之前，他要弄清楚黨內二派的誰是誰非，以便決定向哪一派去申請加入。

談到生活，他告訴我正在找徐志摩幫忙，可能給一家大書店譯點稿子。這件事我曾在1951年寫的一篇短文中作過比較詳細的記述，下面是有關的一節：

「正在這個時候，徐志摩在編一譯文叢書。王實味與徐志摩原不相識，不知是誰介紹，又彷彿是他自薦的，總之，他跟徐志摩約好了會面的日子。到了日期，他準時來到了徐志摩的

家，也記不得為甚麼，徐志摩竟爽了約。第二天，王實味再去拜訪，這回卻早了一點，他不知道徐志摩起身晏。一進門，娘姨對他說：『大少爺還不曾起身』，請他稍等一下。王實味無名火起三千丈，掉頭就走。回得家來，結結實實寫了一封信，將這位『大少爺』罵了個狗血噴頭。徐志摩接讀來信，自知理虧，當即摸到王實味的地方去，著實道了歉。最後總算講好了，請王實味『幫忙』，翻譯哈代的《土人還鄉》。」

這一件頗能代表王實味風格的趣事，發生於我們那一晚長談之後不久。

譯書「公事」談妥了，王實味卻連買書的本錢都沒有。當時我也過著「家無隔宿糧」的日子，但比之于王實味，我在上海終究多點社會關係。是我，想辦法給他買了本《湯麥士》，哈代的那本原文書的。

(三)

王實味與我在上海來往了大約一個整年——從1930春天到1931年春天。他為譯書忙，我為左派反對派的組織忙，彼此見面次數很少，我相信不可能多達十次。除我之外，王實味當時與之來往的，據我所知，只有陳其昌，即延安整風時多次提到的陳清晨（順便說明一下，此人亦即後來給魯迅寫信的陳仲山）。陳其昌當時也因贊成反對派而被開除，他屬於陳獨秀派。不過王實味卻從未加了托派，既不曾參加我所屬的「十月」派，也不曾參加陳其昌所屬的「無產者」社。

政治上他是較多同意托派主張的。特別對於當時中國局勢的估計：是直接革命的形勢呢，還是革命業已失敗，他認為反對派的看法比較正確。但他懷疑反對派另起爐灶，重建新黨來領導革命是否可能。他希望大家始終留在黨內，即使被開除也不要企圖自立門戶。他的這個想法，我相信是他後來設法回到黨內，並前赴延安的主要原因。

不過這些並不是他與我偶爾會面時談論的主題。我們每見必談，每談必爭的一個問題是他後來因之出名的「人性論」。他深深相信：不論一般的政治也好，或特殊的革命政治也好，人性都起著很大作用。他認為馬克思主義

者太強調客觀，太看重物質，以為改變了客觀的物質條件，人性就能夠變好。他認為未必。依他之見，改變人性這項工作是獨立的，如果說它不比改變社會的物質環境更重要，至少是同樣重要，要同時進行。王實味這套理論，往往伴以大量感慨和牢騷。革命失敗了，得勝的新朝權貴們露出來的「人性」竟比北洋老軍閥的更醜更惡，這使他悲憤；而更使他痛心疾首的，則因他眼見為數不少的「老朋友們」，一見氣候轉變，立即改轍易轍，甚至認賊作父，賣友求榮。每當他談到這些「軟骨頭的無恥之徒」時，總是要情緒激動地問你：「如果這次革命不是失敗而是成功，這些傢伙不也成了新政權裏的領袖或幹部了嗎？有了這些官兒，革命政府即使有最好制度，還能不變質墮落嗎？」

對於他這套「改革社會必須改革人性」論，初時我是與他認真爭辯的。我說馬克思主義者並不否認人的個性不同，他們承認各個人的性格有好有壞。革命黨並不輕視對革命者的教育，也不放棄對每個黨員的品格的注意。我還說了馬克思主義有關客觀與主觀二者關係的較為抽象與根本的一些原理。可是這些話都是白費。毋須我講，王實味自己早就知道。知道了並且領會到這些事實與道理，卻絲毫不妨礙他繼續堅持這個有關「人性」的見解。因此，在後來的談天中，我再不跟他鄭重其事地辯論了。其實他自己也未曾將見解徹底發揮，更不曾付之實行的。如果真正貫徹他的理論，他應該改行去當牧師，至少始終幹他的教師行當，不應再幹革命，可是他至死還是個革命者。

那時我正約集幾位朋友一起翻譯托洛茨基的《自傳》。王實味英文程度好，我請他幫忙譯一點，他答應了，譯了兩章：「紐約」與「集中營內」。這件事，據後來延安文件上說，王實味曾經自動向黨組織報告了的。又說他曾替托派譯了列寧的遺囑，此事我卻不知，可能是經由陳其昌的關係，發表在王獨清編輯的公開雜誌上的。

王實味和我，以及和托派的往來，據我所知所憶，盡於此矣。1931年5月我被國民黨拘捕，最後割斷了我與他之間的來往。1932年春天，我已被判刑而囚禁在上海漕河涇的監獄裏，一天下午，獄吏把一包食物和兩本書交給

我，說是有人來探監，沒有允許接見，留下了這些東西給我。兩本書都是英文的，一本便是我給王實味購買的《還鄉記》，另一本是法國福樓拜的名著《薩蘭波》。從書，我猜出了前來探監的人。他那時已經將書翻譯完畢，特意送來給老朋友在獄中消愁解悶。

從此以後，一直到抗日戰爭勝利，我才再聽到王實味的消息，那是從趙超構寫的《延安一月》得知的。

(四)

新民報記者趙超構寫的《延安一月》，讓我於久違之後，再獲得這位老友的消息。原來他去了延安，而且在那裏闖了大禍。「一個臉呈死灰色的青年，讓丁玲帶著，出來背書似地向記者們痛罵自己。」為甚麼呢？為了他寫了一篇「反黨」文章：《野百合花》。

王實味何時去延安，我至今不曾查考出來。根據我所見到的一些有關文獻來推測，他大概是在抗戰開始後，特別是在京滬淪陷後，當全國大批知識青年奔向延安之際進入陝北的。他何時離開上海，我也不清楚。1934年冬天，我被釋放出獄，重回上海時，他早已不在那裏了。陳其昌曾經同我談起過我被囚期間王實味的生活。但是一直留在我記憶中的只有這樣一件事：他和劉瑩生了第二個孩子——一個女孩。孩子落地時，他們又是一貧如洗。此時，幸得其昌將全家可當的東西統統送進當鋪，得洋20元，拿去給他們應急，這才保存了那條小生命。當時李芬已在湖南遇難，為了紀念他們共同懷念的親人，給孩子取名「念芬」。

在他們離滬去延安之間的兩三年中，王實味究竟在何處工作，幹甚麼工作，我只記得陳其昌說他是去山東教書的。他們二人之間的關係此時也斷了。因為1935-36年我都在上海，與陳其昌一起，經常見面，卻從不曾聽他談起這位老同學的消息。據延安整黨文獻上的記載，「王實味直到1936年還與托派分子陳清晨通信」，如果這是真實的話，也不過是最普通的問候吧了，否則我不可能不知道的。

共產黨贏得內戰勝利，一切機關從鄉村遷入城市，中央由延安最後搬到了北京。這時候，「冠蓋滿京華」，而「斯人」獨不見。我猜王

實味始終不曾把自己「改造好」，未能重新獲得上面信任。不過我還是希望，有朝一日，我會在中共的報刊上忽然見到他的名字，我不希望他能有「一官半職」，只希望藉此可以證明他尚在人間。可是空等了幾年，我這個起碼希望卻終於讓毛澤東出來給打破了。

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最後提到王實味，文如下：

「……還有個王實味，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在延安的時候，他寫過一篇文章，題名『野百合花』，攻擊革命，誣衊共產黨。後來把他抓起來，殺掉了。那是保安機關在行審中間，自己殺的，不是中央的決定。對於這件事件，我們總是提出批評，認為不應當殺。他當特務，寫文章罵我們，又死不肯改，那就放在那裏吧，讓他勞動去吧，殺了不好。……」（見1969年原文復刊《毛澤東思想萬歲》第421頁）

毛澤東給王實味發的這個「訃聞」自然使我悲憤。一個真摯、熱情、坦率的文人，一個懷有純潔高尚的理想主義的革命者，一個為中國共產主義的事業艱苦奮鬥了幾達20年之久的老黨員，竟為了對黨提出忠告與批評的小文章，給加上「國民黨探子」的罪名處死了！但是我並不感到震驚，因為自從二十年代末期以來，斯大林以及全世界斯大林主義者對待政治上與思想上異己者的野蠻和荒唐的作風，我已見慣不怪了。

我只是期待著看到更詳細、更客觀的有關乎王實味案的文獻。

(五)

最近在海外一間大學的圖書館裏見到了中共出版的一本《黨史通訊》（1984年8期），其中有一篇專談「王實味問題」的文章（作者宋金壽）。它滿足了我多年的期望，它讓我知道王實味當年在延安如何闖禍，他發表了一些怎樣的意見，結果得到怎樣的處置，他何時與如何被殺，以及中共的新領導者對王實味這個人採取怎樣的態度。

根據這篇文章提供的材料，我想給海外的讀者們，特別給對於王實味其人及其思想懷有興趣的朋友們，介紹一下我這位亡友因以遇難的見解。同時，我要以一個被牽涉在內的證人

資格，向國內對此案有權審議的人們，提出我的要求和申訴。

先談王實味到底犯了甚麼錯誤，後來又背了怎樣的罪名。

王實味的錯誤，在那篇文章裏給概括成三大項：

一、「站在資產階級立場，混淆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

二、「以青年人的代表自居，挑撥青年與黨的關係；鼓吹極端自由主義與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

三、「主張和宣揚資產階級的文藝觀。」

這三大錯誤，主要表現在王實味從1942年2月至3月期間所發表的4篇文章裏（《政治家、藝術家》、《野百合花》、《我對羅邁同志在整風檢工動員大會上發言的批評》、《硬骨頭與軟骨頭》）。

這4篇文章，我見過的只有《野百合花》。它的文字與內容，今天留在我記憶中的也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了。其他3篇，彷彿都不曾以「反面教材」在任何文件和報刊上重載。尤其發表在延安中央研究院壁報《矢與的》上面的《硬骨頭與軟骨頭》，以及由王實味寫作的另外幾篇雜文，據說「今天已無法看到」，只能「從延安《解放日報》上刊登的反駁王實味的文章的引述中見到一些。」（見《甘肅師大學報》1980年4月號杜哲文寫的《關於王實味的一篇文章的題目》）

不過這次《黨史通訊》上的文章把這幾項錯誤介紹得還算詳細。從它顯然偏頗的敘述中，我們多少仍能看到王實味的真正意見。

「歌嘵玉堂春，舞回金蓮步」是《野百合花》文中的名句。作者用以形容當時延安業已形成的「升平氣象」，用以反襯「李芬烈士和抗日前線戰士們的犧牲」。作者認為這些「黑暗」點不應該諱而不言，應該揭發出來，讓大家改正。可是不少首長認為上層幹部們的及時行樂是理當的，最多也只是小毛病、「小事情」、「算不得甚麼」、「天塌不下來」——這在王實味看來，是非常危險的，是官僚腐化的開端，因而大聲疾呼，要整頓這股「不正之風」。

這個態度，我無論如何看不出是「十分明顯的資產階級立場」。恰恰相反，我覺得它是

反對資產階級立場的，是反對資產階級對革命根據地的腐蝕作用的。

說王實味挑撥青年，鼓吹絕對平均主義，證據也是見於《野百合花》，在那裏，作者說了如下的話：

「青年之可貴，在於他們純潔，敏感，熱情，勇敢，他們充滿了生命底新銳的力。別人沒有感覺到的黑暗，他們先感覺；別人沒有看到的骯髒，他們先看到；別人不願說不敢說的話，他們大膽地說。因此，他們意見多一些，但不見得就是『牢騷』；他們的話或許說得不夠四平八穩，但也不見得是『叫嚷』。我們應該從這些所謂『牢騷』、『叫嚷』和『不安』的現象中，去探求那產生這些現象的問題的本質。」

這哪能說是「挑撥」呢？古今中外的任何改革與進步，若就改革者方面的動力來說，主要都得歸結到王實味文中所指出的青年人那些可貴的德性。別的不說，就拿中共本身的歷史來說吧，當年如果沒有《新青年》「挑撥」起中國一批青年的「純潔、敏感、熱情、勇敢與充滿了生命的 新銳的力」，「挑撥」他們起來大聲疾呼，反對舊中國的「黑暗」與「骯髒」，哪里來的中國共產黨？哪里來的中國革命？延安當局那時要出來反對並壓制這種「挑撥」，只能證明在割據區域內做了十幾年執政黨的中共，此時已染上濃重的官僚主義的色彩，已部分喪失其革命的青春氣了吧。

至於所謂「鼓吹絕對的平均主義」，指的是《野百合花》中如下的句子：

「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尤其是在衣服問題上一切應依合理與必要的原則來解決。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面對上面感覺到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惟沒有愛，而且——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他自己倒真有點特殊主義。事情都只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面同志，身體好也罷壞也罷，病也罷，死也罷，差不多漠不關心。」

王實味在這裏明明說「一切應依合理與必

要的原則來解決」；他分明不曾主張不論衣食或其他待遇，應一律平等，一切平均。主張在任何情況下的人人平等與物物平均，自是不符實際的幻想。硬要如此主張，甚至硬要如此實行，在客觀上會起反動作用。所以馬克思主義者反對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平均主義。但這絕對不是說，馬克思主義者主張等級分化，鼓吹一部分人的特殊享受，另一部分人的無權、受苦。馬克思主義者時時刻刻要在「必要與合理的原則」下，去消滅特權，使人人能逐漸趨於平等，使種種享用趨於平均的。

中共的某些（我不想說所有）領導者是否躲在「反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的盾牌後面，心安理得地度其「特權」生活呢？經過「文革」與「反四人幫」二次鬥爭的大量揭露，我只能說王實味實在有「先見之明」。我們只能佩服他言人所不敢言的大無畏精神。

王實味被扣上的第三頂帽子是「主張和宣揚資產階級的文藝觀」。關於這，宋金壽的文章裏說了 並引了如下的話：

「在文藝思想上，王實味割裂了文藝工作與整個革命工作的關係，鼓吹文藝工作的任務就是要『暴露黑暗』。在《政治家、藝術家》一文中，王實味把藝術家同政治家對立起來，要藝術家去『揭露』政治家心靈的『黑暗』。王實味要一切文藝工作者把文藝作為『揭露』我們自己『弱點』的手段，他說：『大膽地但適當地揭破一切骯髒與黑暗，清洗他們，這與歌頌光明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在文章的最後，王實味向藝術家發出號召：『謹以真摯的赤忱和熱望，敬向藝術家同志們發出一個微弱的呼聲：更好地肩負起改造靈魂的偉大任務罷，首先針對著我們自己和我們底陣營進行工作。』」

我不知道這裏一再轉引的王實味的文句是否經過篡改；但即使字字真實，我也看不出《政治家、藝術家》一文作者的立場是「資產階級的」，「割裂了文藝工作與整個革命工作的關係」。證以最近30年來中共的文藝政策及其所造成的結果，特別看到了所謂「文化大革命」中文藝之如何受到摧殘，一般文化人與特殊的藝術家之如何遭到糟蹋，我們只能說王實味確曾提出過及時的警告，他確有真知灼見。經過

「十年浩劫」之後，今天竟尚有人主張文藝工作者必須是「歌德派」，必須為黨的領導者隱惡揚善，必不可揭發「不正之風」，必不可對「自己的陣營」提出批評；否則便是「敵我不分」，便是「站錯立場」——這，至少是讓人驚奇的。

王實味在1942年春天寫作的這幾篇雜文，其中所透露的思想與感情，比之以34年後，即1976年4月5日北京十萬群眾在天安門廣場以詩歌表達出來的抗議，雖然無此激昂，卻更為系統與深刻。

更有意思的是，宋文第一次告訴了我們王實味這幾篇文章在延安所造成巨大影響。它說：

「《矢與的》（按：這是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壁報——西）正式出版於（1942年）3月23日。在壁報的發刊詞中說，『以民主之矢，射歪風之的』，並提出壁報主張『徹底民主』、『絕對民主』，又說，『誰阻礙民主，誰就會在民主前碰出血來』。在這種宗旨之下，壁報上除了連續發表了王實味的文章以外，還有不少鼓吹極端自由主義和絕對平均主義……《矢與的》壁報出版以後，看壁報的人川流不息。有幾期壁報貼在布上掛延安南門外，看壁報的人像趕廟會一樣多。當時，王震去看過《矢與的》壁報，對壁報上的文章表示很不滿意。毛澤東在一個晚上去看了《矢與的》壁報，毛澤東說，『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加重號並非原有一——西）

上一段文字裏顯然有故意歪曲與捏造壁報原作字句的地方。例如，加上引號的徹底民主與絕對民主，凡稍有共產主義運動常識的人都知道，那是決不可能寫在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壁報上，作為正式主張的。但雖如此，這段文字卻非常出色地給我們描寫了王實味這幾篇小文章如何在當時造成了大哄動、大影響。它又形象地告訴我們毛澤東著名的《文藝講話》與王實味的思想發難之間的密切關係。

延安南門外張貼的壁報，無論在形式上與內容上，都與30多年後天安門前與西單牆上的詩歌與文章，前後一致，相互呼應的。

(六)

王實味讓延安當局如此痛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文章之外，又由於他爭取民主的行動。關於這一重要方面，《黨史通訊》裏的文章有如此記述：

「1942年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開全院大會，動員整風並檢查工作。副院長範文瀾向全體同志作了關於整頓三風和檢查本院工作的動員報告。會上，就成立院整風檢查工作委員會的人選和出版壁報的問題發生了爭論。關於院整風檢查工作委員會人選問題，院務委員會的決定是各研究室主任以上的領導同志為當然委員……同時，在群眾中推選一部分同志，共同組成。但王實味率先提出，院整風檢查工作委員必須由群眾直接選舉產生，各研究室主任，即使是院長，同樣必須經過選舉才能成為院整風檢查工作委員會的成員，才有領導整風檢查工作的資格。於是，贊成院務委員會的決定和贊成王實味意見的同志之間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論。結果，贊成王實味意見的占多數。最後決定院整風檢查工作委員會的成員由群眾直接選舉產生，並進行了選舉。在出版壁報問題上，……王實味則提議，為了保障投稿人的民主權利，壁報上的文章可以不署真名或用匿名。一部分人反對王實味的提議，認為整風檢查工作是黨中央、毛澤東的號召，幫助院領導檢查工作，光明正大，不應匿名。同樣，這個問題也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最後，認為可以匿名的也占了上風。於是，一些同志高唱，這是『民主』的勝利。」（加重號並非原有——西）

王實味的此一鬥爭，我是從宋金壽的轉述中首次知道的。列寧的民主集中制，本來與後來斯大林的官僚集中制有本質上的不同，最主要的分別是前者必須先有自下而上的選舉，然後自上而下的集中；後者則只有上面的「領導」，只有上面的指派，而群眾則只有絕對服從的義務，絕無選擇領導與監督領導的權制：這裏只有集中而無民主。至於匿名，亦即無記名投票或無記名發表意見這個極為重要的民主措施，那是被當作「陰謀」而絕對排斥的。

早期中共有健全的民主制。後來經過一再「布爾雪維克化」，終於讓王明與康生一夥將全套「蘇共模式」介紹並應用到中共裏了。1942

年的延安，王明雖然在政治上已居下風；但在那棄王投毛的康生主持下，中共組織，尤其是它的特務體制，卻已將近完成其「布化」手術了。

王實味那次民主鬥爭，正代表著中共党制徹底走向斯大林主義化的一個里程碑。在中共的思想以及黨制的變遷史上，它是重要的一頁。人們只有熟悉了這一頁，才能充分理解中共于全國勝利後的那些「運動」，特別是那些針對知識份子的「改造」運動。

(七)

針對王實味要求「絕對民主」的發難，延安最高當局如何反攻，《黨史通訊》這篇文章裏有比較詳細的敘述。只因不想讓我這篇文字過於冗長，不再逐一轉錄，這裏只摘述其大致的經過如下：

一、1942年3月31日，即在王實味發表他《政治家、藝術家》的一個星期之後，毛澤東在延安《解放日報》的改版座談會上，不指名地批評了王實味的錯誤。

二、同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作出「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其目的在於「糾正王實味帶頭刮起的小資產階級歪風。」

三、4月6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高級學習組發言，指出「在整風發動階段中存在著三個問題」。毛說：「批判王實味，解決一部分青年知識份子的問題，需要做兩方面的工作：一是思想上的，二是物質上的。」

四、同時，胡喬木根據毛澤東多次講話的精神，兩次找王實味談話，還寫過兩封信，希望王實味改變錯誤立場。

五、4月7日，中央宣傳部約集中央研究院的負責幹部和積極分子開座談會。會上指出王實味的有系統的錯誤與一部分同志的「自發性偏向」之間，應加區別。從此，中央研究院開始了對王實味的思想批判。

六、同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了中央研究院齊肅的文章《讀〈野百合花〉有感》。自此開始了對王實味的公開點名批判，惟仍以同志相稱。

七、5月2日至23日，召開由毛澤東與凱豐

主持的「延安文藝座談會」，批評了「王實味的資產階級文藝觀，把對王實味的思想批判提到了新的高度。」

八、同年「4月底5月初」，康生在中央社會部的一次會議上說：「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四月在香港的報紙上發表了。」康生此時已把王實味當成敵人。稍後，康生更具體地說王實味是「托派分子，也是復興社分子，是兼差特務。」

九、5月27日起，中央研究院召開「黨的民主與紀律」座談會，討論王實味錯誤的程度。一部分人認為這不過是自己人間的意見差異，另一部分人則認為王實味在「組織上雖仍是同志，但是思想上已成了敵人。」

十、6月1日，座談會上有人提出王實味與托派的關係問題，會上討論從此便一變而為對王實味的批判與攻擊。

十一、6月4日，王實味奉命出席會議。聽取人們對他「平時散佈托派言論」的揭發，並對他提出了許多質問。「王實味承認了自己同托派王文元（王凡西）等的關係，以及同志們對他的揭發。」

座談會開到6月11日結束。中央研究院的黨領導做了結論：「支配著王實味的思想是托洛茨基分子的思想。」「王實味是個托洛茨基分子。」

十二、王實味被定為托派以後，又牽連到中央研究院潘芳與宗錚，以及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成全與擔任中央婦委的王里。自7月起直至10月，這5個人被批鬥了72天。結果被打成「5人反黨集團」。

十三、10月，王實味被正式開除黨籍。

十四、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於一夜間在延安逮捕了200多名「特務」、「漢奸」、「叛徒」、「托派分子」。王實味在被捕之列，被關押在棗園後溝的西北公學內。

十五、1947年3月，「胡宗南進攻延安，黨中央和邊區各級機關以及人員，全部撤離延安。王實味同時被押撤離。過黃河到晉西北根據地以後，在未經黨中央批准的情況下，由中央社會部的幾個人決定，下令槍殺了王實味。」

（八）

我這裏真得感謝《黨史通訊》這篇文章的作者，他告訴了我關於王實味闖禍、挨鬥與被殺的詳細情形。更加使我感激的是，他讓我知道了中央新的領導人對於王實味問題的看法。

文章作者「查閱了一些歷史材料，同時走訪了部分曾經接觸或受理過王實味問題的老同志，瞭解了他們當時的認識，以及現在對於王實味問題的基本觀點……，歸納起來有以下幾個要點：」

「一、對王實味的思想批判是完全應該的，也是必要的。王實味有嚴重的錯誤，不僅有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立場和觀點（包括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錯誤，而且也有托派思想。」

「二、『五人反黨集團』是不存在的，應給予平反。事實上，除王實味外，其餘四人（成全、王里、潘芳與宗錚）已於1982年2月2日由中共中央組織部作出決定，正式給予平反，撤銷對他們的處分，並恢復名譽——雖然這四個人早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了。」

「三、王實味到底是不是托派分子？多數同志認為，有關部門應該進行重新審查，如果是錯案，即使人死了也應該給予平反。」

「四、槍殺王實味是不對的。許多老同志認為，即使王實味是托派分子也不應該槍殺。」

關於王實味的思想問題，我不想於上面的略談過的一些之外再說甚麼。他對民主、特權以及文藝創作的見解，至少還有他的幾篇短文在。究竟它們是否代表「資產階級立場」，今後有心的讀者，會憑以作出自己的判斷的。

歷史是最公平的裁判，雖然它需要比較長的時間。我相信它終於會宣佈在這些問題上，到底正確的是誰。是王實味呢，還是將他殺害的那些掌權者？其實，通過「十年浩劫」的慘痛經驗，歷史已經為我們作出它的初步判決了。

作為長文的結束，我這裏只想就王實味的托派關係再說幾句話。

中共的新領導者對於托派、乃至對於王實味的態度，顯然與毛澤東——康生的態度有很大的不同，特別與信口亂吠的康生不同。毛澤東說過王實味「不應當殺」，但他還是一口咬定那個被害人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殺

了人，還隨便加人以荒唐的罪名，這種做法，我相信目前的中共領導人已在逐漸改正了。他們自己在「文革」中吃過這種苦頭，現在似乎認真想把中國推上法治的軌道。對於這，我們當然是擁護、贊成的。中國的托派，即早年由中共分裂出來的左派共產主義者，於1952年12月間全體被捕，一直給加上反革命的罪名囚禁在監獄裏。1979年6月，中共的新領導人決定將他們全部釋放——這件事，當然也值得歡迎。這是當權者「撥亂反正」，他們要以「法治」來代替「人治」的證據。不過，直至目前為止，據我所知，中共新領導人對於國際托派與中國托派的評價，基本上仍受著斯大林——王明——康生的影響，仍舊停留在這一幫人所劃定的框子裏。他們既無決心、又無興趣去弄清楚六十年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斯大林派與托洛茨基派所爭論的問題誰是誰非。他們也沒有決心與興趣去弄明白這兩派在中國問題上的是非曲直。今天他們顯然已否定了康生從莫斯科帶來的一套對中國托派的誣譖，即已不再把陳獨秀及其他托派說成為「漢奸」、「特務」與「復興社分子」；但他們仍不肯把中國托派以革命陣營中的一派相待，仍不肯給他們作政治上的「平反」，仍不肯恢復他們應有的名譽。這，不但對歷史說是不公正，而且對實際的政治說是大大地有害。因為，我們若只就社會主義建設一點來說吧，蘇共當年左派反對派的政綱（先反對斯大林的極端右傾，後反對斯大林的「極左」冒險主義），對於今天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也仍具有無上參考價值。

中共的新領導人認真要找到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他們應該詳細徹底地研究二十年代中、後期與三十年代初期發生于蘇共的內部的各派（主要以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為代表的）關於建設社會主義的不同意見。而要真正進行這種研究，首先得取消斯大林為了保證一己勝利而強加在敵對派系頭上的種種荒唐罪名。必須首先為那些被斯大林陷害致死的人「平反」，為他們「恢復名譽」。

如果中國的新領導能給國際和中國的托派「平反」，能給他們「恢復名譽」，那麼王實味的「托派嫌疑」便自動地不成為問題。

這是我由王實味問題而引起的對中共領導的最佳期望。

不過我又願意退後一步，願意在中共對托派的現有看法之下，出來為王實味說幾句話。我要以「被告」的證人資格，向可能「重新審查王實味一案」的那些主持人，提出以下的陳述：

在我的回憶錄中有這樣一句話：

「在中共統治區內，一些自動前去參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實味等），遭到了無情鬥爭，並最後被殺害了。」

這裏我應該指出，這句話說得不甚確切。正如我在上面所憶述的，王實味雖與陳其昌和我有過長期較密切的關係，雖然他思想上受過托洛茨基某些意見（特別是文學方面的見解）的影響，但他始終不曾參加過中國托派的任何組織。

我們可以說王實味曾經是托派的一個同情者，卻不能說他是托派分子。

必須聲明的第二點是，王實味大約從1929年至1934年這個期間與黨失去聯繫，為想重新參加組織，他那時確曾徘徊於「中央派」與反對派之間。但最後他參加前者而不參加後者，而這完全是出於他獨自的決定。當他決定重新加入中共組織之後，便斷絕了與托派朋友的來往。

這裏絕不可能存在甚麼「派遣」問題；絕對談不上甚麼「滲透」用意。

希望我這兩項證言能多少有助於王實味最後一關的平反，更希望王實味的平反又能有助於他今天多半還存活著的妻女的遭遇。

王實味前往延安時，妻子劉瑩與女兒念芬一定不會同去。因為我不會見有任何文件提到過她們。我猜，當時她們是回湖南老家去的。在後來戰爭和革命的艱苦歲月裏，特別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她們是怎樣度過來的呢？或者她們根本不曾挨過來嗎？

但願她們一向無恙；更願她們終能因丈夫與父親的沉冤得白而免受不該受的歧視。

1985年2月10日寫畢

後記

文章寫完，重看一遍，發覺意猶未盡。由於寫作的目的使然，我側重事實方面憶述了我的這位老朋友，卻不曾在性格與才能方面介紹他——至少是介紹得很不夠。翻翻我33年前以「潤土」筆名發表在香港《星島晚報》上的那篇舊文：《記野百合花作者王實味》，其中有幾段文字似可補此文的不足。因此摘錄在下面，作為本文後記。

「就作家論，王實味卻是有才氣的。他的文字漂亮，口語寫得生動。和張天翼是同學，二人感情好，竟致寫的東西有時可以混淆。」

「只因他生活窘，每月的柴米油鹽等著他筆頭上寫下，所以大多時間，不得不花費在譯作上。……」

「王實味不是恃才傲物的人，尤其不會故作倨傲。他宅心善良，性子耿直。要說毛病，也許是暴躁一點，太易激動。一不合意，他便會臉色變青。對朋友，不分新舊，他一樣會任性使氣。胡風跟他，一度曾經是同班同學，胡風也是出名的拗性子；可是相形之下，這位曾被魯迅先生稱為不懂世故的批評家，竟可說是頗為圓通的。」

「在普通朋友中，王實味這種性格最多是『吃不開』；和他相處久了，很多人還會瞭解他，喜歡他，因為他實在是真實得可愛。因此王實味的朋友雖然不多，所往來的卻都說得上是性氣之交。可是在較大的圈子中，在政黨的同志中，王實味的脾氣就難於叫人諒解了。」

「他加入中共很早，約在1927年春天，他入黨，與其說是由於思想，毋寧說是由於感情。對於他，任何種類的壓迫都是難於容忍的。舉凡政治、經濟、思想等領域內既成的與陳舊的東西，他幾乎都反對。說得抽象些，大概他的血液裏天賦有反叛的氣質，正是這個氣質，使他走進了一個站在最左邊的革命黨。不是馬克思主義使他成為共產黨員的。關於馬克思主義，他不但讀過，而且還譯過一些書，可是始終不能算已精通，這是說，馬克思主義始終不曾進入他的靈魂深處。不管他讀過多少本歷史唯物論的著作，他卻牢牢地保持著一個見解，那就是『人性改革論』。根據歷史唯物論，社會制度改變，人性才會跟著逐漸地改變；根據

王實味的見解，若不同時（或者首先）改革人性，則社會制度也終於改不好的。至於如何改變，則他就想到教育、藝術、甚至道德說教方面。」

「為了這個『人性』，王實味和他的朋友不知面紅耳赤地吵過多少嘴。吵多了，後來朋友們多半當他說瘋話，或者和和他的調，隨他去。可是在紀律嚴明、思想劃一的政黨裏，這可闖下大禍了。這回在《野百合花》案中，『人性論』構成了王實味的諸大罪狀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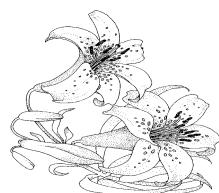
* * *

「社會科學中的思想命題，跑進文學家藝術家的頭腦中去時，多半要改變面貌的。文藝家彷彿有一種特權，他們可以，而且一定要用自己的方式來表現這些思想。在嚴格的社會科學家的眼中，這些方式或者可笑，或者荒謬，或者幼稚。但若拋開那些可笑、荒謬與幼稚的思想方式，直接與百分之百地，依照社會科學的方式來從事文學或藝術的創造活動，結果一定不行，他們的努力一定失敗。正是為了這個緣故，一些真正高明的革命導師們，不會把思想尺度與藝術尺度混為一談。他們對於某些文學家或藝術家的偏差見解，常能採取寬容態度。當年馬克思對於海涅與佛拉烈格拉脫，列寧對於高爾基，以及高爾基本人之對於詩人布羅克，便都是這樣的。」

「王實味的『人性論』，乃至他的『自由主義』，如果與布羅克的『人文主義』及其『反教化主義』相比較，倒是正常得多的。布羅克的思想，有好些地方簡直是標準的瘋話。可是這些瘋話並不曾構成過甚麼『案件』。」

「把政策性拿來作為一切文藝活動的標準且視對此標準的違背為一種刑事案件，這在蘇聯是斯大林獨攬大權以後才有的事。」

【原載香港《九十年代月刊》1985年7月號，現在重刊時，根據原稿校正了一些錯漏】



王實味冤案未徹底平反（轉載）

裴毅然

王實味（1906～1947）冤案並未徹底平反——未恢復黨籍，這對眾多國人來說，怕是一個多少還有點爆炸性的新聞。當然，這只是一則舊聞，舊聞成新聞，乃是因為它一直被有意無意捂著蓋著。

眾所周知，1982年2月，中組部發文〈關於潘芳、宗錚、陳傳綱、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謂“五人反黨集團”問題的平反決定〉，但

“五人集團”只平反了四位，缺席 最主要的人物——王實味。王實味的平反，一波三折，延時十年。1992年1月7日，由公安部派人至湖北十堰王遺孀劉瑩處，當面交送〈關於對王實味同志托派 問題的復查決定〉與一萬元慰問金。83歲的劉瑩（1908～ ）對姍姍來遲的〈決定〉出奇平靜，未發一語，其子王旭楓反而激動得熱淚盈眶。劉瑩堅決不收慰問金，後將此金交十堰文聯為青年文學獎勵基金，以紀念丈夫。但是絕大多數國人（包括相當一批研究者）都未注意到：這項影響如此巨大的平反要案原本應是中組部的差事，何以由公安部完成？而且，既然平反，何以沒有恢復黨籍？絕大多數國人也認為冤案已經昭雪，完成“大團圓”。

筆者也是最近讀了《溫濟澤自述》，才豁然開朗，探得謎底。溫述關鍵一段轉錄於下：

我在1988年給中組部的報告中，提出了三條建議：一、對王實味錯劃為托派的問題，予以平反；二、王實味被開除黨籍應予恢復；三、開個小型座談會，我和當年 參加過批判王實味的人參加，總結一下從此案中應吸取的教訓。事後瞭解，1991年，中組部把我的這三條建議送請十幾位老同志審閱，對第一

條，十幾位老同志 都畫了圈表示同意；第二條，畫圈的只有兩位；第三條，無人畫圈。因此，王實味的黨籍沒有得到恢復。談到總結經驗教訓，除胡耀邦說過一次，再也沒有人提起。[1]

十幾位老人，想來是鄧小平、陳雲、彭真、習仲勳、薄一波、王震、鄧穎超等諸老。說是中組部復查，最後還得老人畫圈，並按老人的“集體意志”定奪。十幾位老人 都同意平反，故有公安部的平反，公安部出面只證明王實味無罪，只負責刑事部分的錯殺，但不涉及組織關係。恢復黨籍，只有兩位老人畫圈，因此不能恢復，不能 由中組部出面，表明王實味仍然有錯，說了寫了不利黨的話，擁有不利於黨的思想，做了不利於黨的事，犯有仍須批判的政治錯誤，不能讓他的靈魂回到“黨的懷抱 ”，即最終不承認當年批判王實味有錯，錯殺不等於錯捕，錯捕不等於錯批。至於開個小型座談會，大概都認為毫無必要，翻檢這樁沒光沒彩的陳舊老賬，有那必要 嘗試？竟無一人畫圈。

十幾位中共老人的批示，不僅說明他們對王實味冤案的態度，也說明中共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集體認知水準，尤其說明他們對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態度。無一人表示應該開個總結教訓會，即無一人認識到歷史是最好的教師，意味深長且含蘊多多呵！就是從情理上，冤枉人家49 年，開個會，請遺孀來一下，安慰安慰，讓當年打過王實味的尚存者表示一下懺悔，而且向外界樹立“不回避歷史錯誤”的光輝形象，政治得分多多，能花幾個錢？能費多少事？筆者認為，十幾位老人的這一“集體”態度，其

實表明中共的一大通病：不願認錯。除了痛及全體老幹部的文革，無論土改、鎮反、肅反、反右、反右 傾、四清，直至清污、六四，就像王實味案一樣，沒有一樁徹底認錯。就說反右，至少打了55萬餘人（最近有資料表示右派總數實為3178470人，中右 1437562人），[2] 認一聲錯又抵得上人家22年的受得罪麼？但至今堅持“擴大化”，仍然不給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陳仁炳等五人平反，因為還得留著他們證明只是“擴大化”。

不願認錯，表明中共不願授人以柄的敵對思維定勢，不肯開啟反思的邏輯起點，堅守第一雄關——我們沒錯，毋須反思，更毋須懺悔。然而，這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應有之態麼？

說來不信，如此轟轟烈烈的驚天大案，王實味家人居然20年後才開始得知。文革初期，女兒王勁楓從高音喇叭裏聽到毛澤東1962年的一段講話，方知父親的“下場”，但不敢也不願將此訊告知母親。不久，兒子王旭楓也從一本書中得知父親被殺的結局。最後，王妻劉瑩于1978年從廣播中聽到王實味的名字，聽清已於 1947年處決，頂著三項罪名——反黨集團成員、國民黨特務、托派分子。

中共建黨老人、長期擔任統戰部長的李維漢，1981年向中組部提出復查王實味案，並在回憶錄《回憶與研究》中提出“一個懸案”，確認王實味的問題是思想問題而非敵我矛盾、與托派的關係是歷史問題而非現實問題、是個人問題而非組織集團活動。饒是有李維漢這樣重量級人物出頭，王案平反仍被長期擱置。1984年8月11日，李維漢去世，臨終前向溫濟澤託付王案平反。[3] 被擱置的原因是1981年11月托派骨幹王凡西在境外出版《雙山回憶錄》，內有這麼一句：“在中共統治區內，一些自動前去參加工作的托

派（例如王實味 等），遭到了無情的鬥爭，最後被殺害了。”就這麼一句不負責的晚年回憶，卻坐實了王實味的托派身分！1985年，王凡西在香港月刊《九十年代》再發表《談 王實味的“王實味問題”》，詳細交代自己與王實味的交往，尤其1930年春重逢上海的細節，在他與另一托派分子陳其昌交談托派觀點時，王對某些觀點表示同情，但反對他們“自立門戶”，又因王已結婚，生活拮据，依靠寫作翻譯度日，因此翻譯了托洛茨基自傳中的兩章。王凡西在文中著重表明自己在《雙山回憶錄》中的那段話說得不準確：“這句話說得不甚確切……王實味與陳其昌和我有過長期較密切的關係，雖然他思想上受過托洛茨基某些意見（特別是文學方面）的影響，但他始終不曾參加過中國托派的組織。（原文著重點改為下劃線——編者）” “必須聲明的第二點是：王實味大約從1929年至1934年這個期間與黨失去聯繫，為想重新參加組織，他那時確曾徘徊於‘中央派’與反對派之間，但最後他參加前者而不參加後者，而這些完全是出於他獨自的決定。當他決定重新加入中共組織之後，便斷絕了與托派朋友的來往。” [4]

1942 年5月23日，延安文藝座談會結束，旋正式進入整風。5月27日，在康生（總學委副主任、社會部長）授意下，中央研究院召開全院“黨的民主與紀律”座談會，開始“糾偏”，最初幾天還局限於思想偏向，態度尚溫。6月1日起，會議中心從批評轉入批判，從和風細雨的同志式幫勸轉入急風暴雨的敵我鬥爭；王實味抵抗了幾天——稱病缺席，後被抬著擔架至會場接受批鬥；6月4日正式提出退黨，6日被迫收回退黨要求；1943年4月1日被捕，由中央社會部長康生正式下令，戴上三頂大帽：“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反

黨五人集團成員”。最後一項罪名牽連到赴延不久的兩對夫妻——潘芳、宗錚；陳傳綱、王汝琪，乃是為了突顯這一案件的反革命組織性，從而證明整風運動之必要與搶救審幹之實績。1947年3月，國民黨進攻延安，王實味被押解撤出，行至山西興縣，7月1日由康生批准秘密處決，推屍入井。

鑄成王實味冤案除了中共內部的“敵情思維”，還有一些外因。王實味兩篇最著名的“反動雜文”——《野百合花》、《政治家·藝術家》被國民黨印成小冊子——《關於〈野百合花〉及其他》——四處散發，油印、鉛印，還加按語：“中共……歌贊延安是革命的聖地……然而……在陝北、貪污、腐化，首長路線、派系交哄，‘歌嶃玉堂春，舞回金蓮步’……使為了抗日號召跑向陝北的青年大失所望，便使許多老共產黨員感到前途沒落的悲愁。”對國民黨來說，王實味的雜文可謂遞了攻擊延安的炮彈，乃是求之不得的“內部異聲”。這也是王實味自己都感覺抬不起頭來的致因。他對前來幫勸的溫濟澤痛哭流涕：“我有錯，但是，的確出於我愛黨的好心啊！”^[5]搶救他的溫濟澤、李言也認為王只是思想認識方面的問題，但康生批評他們是“溫情主義”，指稱王是托派分子與國民黨藍衣特務，要他們“不要麻痹”。溫濟澤躬身自檢，覺得當然是領導看得遠見得深，撰文《談溫情主義》發表於《解放日報》。

王實味案說明延安時期的中共，就已淪入“兩個凡是”的毛式思維——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延安整風其實是1957年反右的前期預演，形式、程式一模一樣。1942年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開整風動員大會，號召大家向領導提意見，幫助黨整風，即最初的動員鳴放，屬於“布餌”階段。王實味在院

內壁報《矢與的》上發表短文，提出“絕對民主”、“必須有大至大剛的硬骨頭”、“是不是對‘大人物’有話不敢說”、“我們決不能讓邪氣更大的人得勢”、“我們的眼光不應只看到本院，更應注意全延安以至全黨”。^[6]當然，王實味的所謂“托派言論”今天已被證實完全正確，而且發出預言般光芒：“史達林人性不可愛”、“中國大革命的失敗，共產國際應該負責”、“蘇聯對季諾維也夫叛國案的審判是可懷疑的”、“托派理論有些地方是正確的”。^[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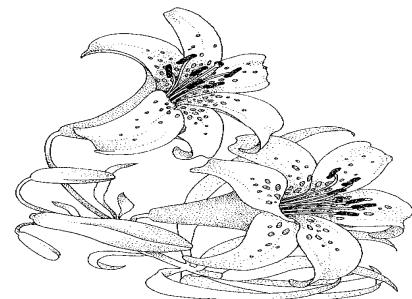
歷經半個世紀，1992年的中共對王實味案仍不能直面正視，說明什麼問題呢？一粒水珠折射陽光：承認錯誤的難度自然就是距離真實真理的差距。

2008年秋於滬·三湘

註釋：

- [1]溫濟澤：《溫濟澤自述》，中國青年出版社（北京）1999年6月第1版，第156頁。
- [2]郭道暉：《毛澤東發動整風的初衷》，載《炎黃春秋》（北京）2009年第2期，第10頁。
- [3]黃昌勇：《王實味傳》，第254頁。
- [4]溫濟澤：《溫濟澤自述》，中國青年出版社（北京）1999年6月第1版，第153頁。
- [5]溫濟澤：《溫濟澤自述》，中國青年出版社（北京）1999年6月第1版，第144～145頁。
- [6]溫濟澤：《溫濟澤自述》，中國青年出版社（北京）1999年6月第1版，第144頁。
- [7]溫濟澤：《溫濟澤自述》，中國青年出版社（北京）1999年6月第1版，第146頁。

【中國資訊中心《觀察》雙月刊2009年第一期】



民族主義和經濟（1934年1月4日）

列·托洛茨基著 施用勤譯



意大利法西斯宣揚神聖的民族利己主義是唯一創造性的因素。德國國家社會主義把歷史歸結為民族，又附帶著把民族歸結為種族，把種族歸結為血緣。但在那些在政治上沒有上升或下降到法西斯主義的國家中，經濟問題也日益陷入民族框架內。不是所有人都敢公然地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自給自足。但實際政策在各處都趨向於盡可能地與世界經濟嚴密地隔絕。就在20年前，教科書灌輸，蘊涵在人類發展的自然和歷史條件中的世界分工，是財富和文化的強大因素。現在，世界交換成了所有災難和危險的源頭。後退，回家，回到民族源頭！應該糾正佩里¹海軍上將，他在日本的“自給自足”上打出了條裂縫，但更嚴重的錯誤是赫里斯托福·哥倫布²，它是如此沒有分寸地擴展人類文化的舞臺。

¹ 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美國海軍軍事活動家，海軍準將（1841）。以武力威脅迫使日本政府簽訂 1854 年條約，結束兩個多世紀以來日本與外界的隔絕狀態。條約規定向美國軍艦開放函館和下田兩個日本港口。——譯注

² 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航海家，生於義大利熱那亞。1492-1493 年率領西班牙探險隊尋找通往印度的最短海上航路；乘三艘輕快帆船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發現的民族的不可逾越的價值與19世紀的錯誤的價值——民主和社會主義——對立。我們在此再一次落入與舊教科書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中，更糟糕的是與確鑿的歷史事實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中。只有惡意的無知才能操作赤裸裸的民族和自由主義的對立。實際上，新歷史的全部解放運動，哪怕是從荷蘭爭取獨立的鬥爭開始，同時具有民族和民主的性質。被壓迫和被分裂的民族的覺醒，它們為自己的被肢解的民族的統一，為擺脫外來壓迫爭取獨立的鬥爭，沒有爭取政治自由的鬥爭是不可能的。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在民主革命的霹靂和暴風雨中，形成了法蘭西民族。在19世紀的一系列戰爭和革命中，形成了意大利和德意志民族。北美民族的強勁發展在18世紀的爭取解放的起義中受到洗禮，並由北方各州對南方各州在內戰中的勝利而得到徹底的保障。民族不是由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發現的。在其新的，即資產階級意義上的愛國主義是19世紀的產物。法蘭西人民的民族意識可以說是最保守的和最穩定的，至今仍從民主傳統中得到滋養。

但滲透著中世紀的割據主義的人類經濟發展沒有停留在民族框架之內。但發展趨勢表現在：重心，至少是先進國家的，從國內市場轉向外部

（“聖瑪麗亞號”、“平塔號”、“尼尼亞號”）橫渡大西洋，於 1492 年 10 月到達聖薩爾瓦多島（發現美洲的正式日期），爾後到達巴哈馬群島其他島嶼、古巴、海地。在後來的幾次探險（1493-1496, 1498-1500, 1502-1504）中發現了大安的列斯群島及一部分小安的列斯群島、南美洲和中美洲沿岸。——譯注

市場。如果對19世紀來說，民族命運和經濟命運的融合是引人注目的話，我們這個世紀的基本趨勢就是經濟和民族之間的不斷增長的矛盾。在歐洲，這個矛盾的尖銳性達到了完全難以忍受的地步。



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最具有能動性。如果在19世紀中期，德國人民束縛在幾十個封建國家的籠子裏的話，然而在創建帝國的40年後，德國工業在民族國家的框架裏弊悶得喘不過氣來。世界大戰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德國資本渴望沖上更廣闊的舞臺。作為上等兵的希特勒在1914-1918年間不是在民族統一的名義下，而是在超民族的帝國主義綱領的名義下戰鬥的，該綱領可以用著名的公式“組織歐洲”來概括。聯合在德國軍國主義政權下的歐洲，應該是更加宏大的任務——組織星球——的橋頭堡。

但德國並非例外。它只是在更加強烈和侵略性的形式中表達了每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趨勢。戰爭是這些趨勢衝突的結果。誠然，像任何一個巨大的歷史震盪一樣，戰爭引發了各種歷史問題，順便在歐洲更落後的部分（沙皇俄國、奧

³ 魯登道夫 (Erich Ludendorff, 1865-1937) 德國陸軍上將，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任興登堡將軍的助手（1914 年任東線參謀長，1916 年起任德軍最高統帥部第一副總軍需長），1914-1916 年實際指揮東線軍事行動，1916-1918 年指揮德國全部武裝力量。參加過 1920 年的卡普叛亂，1923 年和希特勒一起在慕尼

匈帝國）推動了民族革命。但這僅僅是消逝在過去的時代的遲到回聲。就其實質來說，戰爭具有帝國主義的性質。它試圖用消滅、破壞、野蠻的方法來解決進步的歷史任務：在世界勞動分工準備的整個舞臺上組織經濟。

無須說，戰爭沒有解決這個任務。相反，它進一步打碎了歐洲。它加深了歐洲和美國的相互依賴，同時也加深了它們之間的對抗。它推動了殖民地的獨立發展，同時加劇了宗主國對殖民地市場的依賴。過去的所有矛盾在戰爭的結果中變得更加尖銳。當歐洲在美國的協助下對自己的被破壞的經濟進行總體修復的頭幾年中，可以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生產力的恢復必然意味著還原所有導致戰爭的災難。今天的危機在自身中綜合了過去的全部資本主義危機，首先意味著民族經濟的危機。

國際聯盟企圖把戰爭沒有解決的任務從軍國主義的語言翻譯成外交協定的語言。如果魯登道夫³ 未能用劍成功地“組織歐洲”的話，白里安⁴ 試圖借助于甜蜜的外交雄辯建立“歐洲聯邦”。但一系列不斷的政治、經濟、金融、海關和貨幣代表會議只是展現了這個事實，即對我們時代的不可拖延的緊迫任務來說，統治階級是不稱職的。

從理論上，任務可以這樣表述：怎樣在居住在歐洲的各國人民充分自由的文化發展的情況下，保障在這個大陸上的經濟統一？怎樣把聯合起來的歐洲納入全世界的協調的經濟中？解決這個問題不是在把民族神聖化的道路上，而是相反，把生產力徹底從民族國家強加給它的桎梏中

克發動法西斯暴亂。——譯注

⁴ 白裡安 (Aristide Briand, 1862-1932) 法國政治家。1909-1931 年間曾多次任法國總理和外交部長。鼓吹建立“歐洲聯邦”（1928 年凱洛格—白裡安公約等）。——譯注

解放出來。然而，歐洲統治階級因軍事和外交方法的破產而感到沮喪，今天從相反的一端來解決這個任務，即企圖強行讓經濟服從已經過時的民族國家。普洛克儒斯忒斯之床的神話在宏大的規模中再現。統治者不是為新技術清理配得上它的舞臺，而是把經濟機體砍、切得支離破碎。

墨索里尼在不久前的一次綱領性的講話中宣佈“經濟自由主義”的死亡，即自由競爭的王國的滅亡。思想本身並不新。托拉斯、辛迪加、財團早已把自由競爭擠到了後院。但與自由資本主義的企業相比，托拉斯更不能與有限的民族市場妥協。隨著世界經濟讓民族市場服從自己，新的壟斷吞噬了競爭。經濟自由主義與經濟的民族主義一起過時了。為經濟輸入民族主義的屍毒來拯救它的嘗試，導致血液感染，它的名稱是法西斯主義。

人類的歷史提升是力求以最小的勞動消耗獲得盡可能大的財富。文化增長的這個物質基礎同時為評價社會制度和政治綱領提供了最深刻的標準。在人類社會領域中，勞動生產率的規律具有同樣的意義，就像引力規律在力學領域中一樣。過時的意識形態的消失不是別的，正是造成奴隸戰勝野蠻，農奴勞動戰勝奴隸勞動，自由雇佣勞動戰勝農奴勞動的規律的體現。勞動生產率的規律不是直線性地為自己開闢道路，而是矛盾地、狂風似地和跳動式地、跳躍性地和左右搖擺式地克服地理和人類學的以及社會的障礙。因此在歷史上出現了許多“例外”，它們不過是“規則”在現實中的特殊折射。

在19世紀，爭取最高勞動生產率的鬥爭主義以自由競爭的形式進行，它支持資本主義經濟通過週期性的行情震盪來實現動態的平衡。但競爭

正是由於自己的進步歷史作用導致了托拉斯、辛迪加和財團的可怕的集中，它同時意味著所有經濟和社會矛盾的集中。自由競爭像一隻不是孵化鴨崽而是鱷魚的老母雞。如果它不能應付自己的孩子的話，就不足為奇了。

經濟自由主義已經徹底過時了。它的莫希幹人⁵越來越少信心地呼喚力量的自發遊戲。需要新方法來確立托拉斯的摩天大樓和人類需求之間的相互關係。需要徹底地改變經濟和社會的結構。但新方法與舊習慣，更重要的是與舊利益產生衝突。勞動生產率的規律痙攣地在它自己製造的障礙中掙扎。當代經濟體系的巨大危機的實質就在於此。

被民族和世界經濟的破壞趨勢搞得措手不及的保守的政治家們和理論家們開始傾向於這個結論，災難的主要原因是技術的過高的發展。很難想出更悲慘的奇談怪論了！法國政治家和金融家卡約⁶在人為地限制機械中看到拯救。這樣，自由學說的最有教養的代表出乎預料地被最愚昧的工人所左右，這些人在一百年前曾經砸毀過紡織機。進步的任務是讓經濟舞臺和社會關係適應新技術，現在則反其道而行之：為讓生產力適應舊的民族舞臺和舊的社會關係而遏制和壓縮它們。大洋兩岸為解決這個離奇的任務消耗了不少智力：如何把鱷魚趕回到雞蛋中。最新的經濟民族主義因其反動性而受到譴責：它阻礙和降低人的生產力。

封閉經濟的政策意味著人為地壓縮那些能夠成功地讓其他國家的經濟文化產生成果的工業部門。同時，割據傾向意味著人為地引進那些在民族土壤中找不到有利條件的部門。這樣，經濟獨立的臆想產生了兩個方向的沉重的附加開

⁵ 莫希幹人系北美印第安人的一個種族，因歐洲殖民而衰亡。——譯注

⁶ 卡約 (Joseph Caillaux, 1863-1944) 法國激進分子，

于 1911-1912 年任法國總理，多次任財政部長。——英譯者注

支。

此外又加上了通貨膨脹。作為通用替代物的黃金在19世紀成了所有配得上貨幣名稱的貨幣體系的基礎。放棄黃金兌換能比海關更成功地把世界經濟打成碎塊。通貨膨脹作為經濟內部比例失調和它的國際聯繫的失調的表現，又加劇了這個失調，幫助把它從功能性的變成生理性的。這樣，“民族”貨幣體系為經濟民族主義的致命工作加冕。



這一學派的最無畏的代表安慰自己，在封閉經濟中雖然會窮一些，但民族會變得“更和睦”（希特勒），隨著世界市場的意義的降低，對外衝突的導火索也會減少。這樣的希望只是表明，割據學說不僅是反動的，還是徹頭徹尾的烏托邦。民族主義的源頭實際上是可怕的衝突的實驗室：帝國主義像饑餓的老虎，它退到自己的民族巢穴中，是為新的大幅度的跳躍。

經濟民族主義的理論甚至似乎是依靠“永恆”的種族規律，實際上反映的也只是世界危機的絕望情況。慈善家是由痛苦的需求造成的，就是這方面的經典的例子。翻車的列車的乘客蜷縮在荒涼車站的椅子上，禁欲主義地彼此要對方相信，舒適敗壞人的身體和精神。但所有人一個不落地幻想著列車能把他們送到他們可以在那裏在兩條乾淨床單中舒展四肢的地方。現在所有國

家的實業界的直接關心是好歹撐住，活下來，哪怕是在休眠狀態中，在民族市場的堅硬的床上，但所有這些意不由衷的禁欲主義者們都幻想著新的世界行情的強大的列車。

它是否能來？由於整個經濟體系的結構性的破壞，行情預見現在很難，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舊的工業週期像健康軀體中的心跳一樣，以穩定的節奏為特徵。戰後我們已經看不到行情的正確交替了：老化的心臟出現間歇。

應該把被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政策與上述情況聯繫起來。被急不可耐的利益和社會危險推動的國家政權借助緊急措施介入經濟生活，這些措施的後果它自己在多數情況下都預見不到。但如果把新戰爭的爆發放在一邊，它會長期推翻各種經濟力量的自發工作，還有計劃調節的自覺嘗試，則可以充滿信心地預見從危機和蕭條朝復蘇的轉折，哪怕如果英國，尤其是美國今天的有利徵兆看來是還不成春的早燕。

危機的破壞性工作必將達到——如果還沒有已經達到的話——一點，這時陷入貧困的人類需要新的大量物質。煙囪將會冒煙，機輪將會轉動。復蘇將會變得十分明顯，實業界會從麻木中醒來，很快就會忘記昨天的教訓，會輕蔑地把自我否定的理論連同它的作者扔到一邊。

但是，寄希望於面臨的復蘇規模將與今天的危機一樣，是最大的幻想。我們知道：在兒童期、成年期、老年期的心跳是不同的。在資本主義上升時，危機具有短暫性，生產的暫時降低會在最近一個階段中得到豐富的回報。不像現在，我們進入行情上升是暫時的，而危機變得越來越深的時代。瘦牛把茂盛的草吞得一點也不剩，仍餓得不行。

世界經濟的氣壓計的指標一旦開始上升，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都暴露出了進攻的急躁。爭取國外市場的鬥爭將變得空前尖銳。關於割據優勢的

真誠考慮將被立即拋棄，民族和睦的明智計劃被扔到桌下。這不僅適用德國資本主義和它的爆炸的能動性，或遲到的、急躁的和貪婪的日本資本主義，也適用於在其新矛盾中強大的美國資本主義。



美國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完善的類型。似乎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國內市場的相對平衡，保證了它對歐洲的巨大的技術和經濟優勢。但美國介入戰爭的事實本身，是被破壞的內部平衡的表現。戰爭帶入美國結構中的那些變化，把進入世界市場變成對美國資本主義的生死攸關的問題。許多人說，這個進入應該採取罕見的戲劇形式。

勞動生產率的規律對美國和歐洲的相互關係來說，對確定美國在世界上今後的地位，有決定性的意義。揚基賦予勞動生產率規律的最高形式被稱為：傳送帶、標準化、系列生產。似乎已經找到了可以翻轉世界的阿基米德⁷支點。但舊大陸不想讓它被翻轉。所有人为自衛而反對所有人，用街壘、海關和刺刀來保衛。歐洲不買商品，不付債，並為此而武裝起來。饑餓的日本憑藉可憐的五個師佔領了整個一個國家。世界最高技術

⁷ 阿基米德（Archimedes，約西元前 287-前 212）古希臘學者。生於錫拉庫紮（西西里島）。最先研究出各種形體的面積、平面和體積的計算方法。他所寫的關於靜力學（阿基米德定律）的奠基性著作，提供了

似乎無力對付依靠低得多的技術的障礙。勞動生產力率的規律似乎失去了力量。

但這僅僅是表像。人類歷史的基本規律必然會派生和次要現象進行報復。美國資本主義早晚應該嘗試在整個我們的星上為自己開闢道路。用什麼方法？不擇手段。高係數的勞動生產率還意味著高係數的破壞活動。鼓吹戰爭？絕不是。我們什麼也不鼓吹。我們只是嘗試分析世界形勢並從經濟機制的規律中得出結論。沒有比智力上的膽怯更糟糕的東西了，一旦事實和趨勢與我們的理想或偏見矛盾時，它就轉過身去不看它們。

只有在世界發展的歷史框架中才能為法西斯主義找到屬於它的位置。在它自身中沒有任何創造性的和獨立的東西。它的歷史使命是把經濟困境的理論和實踐搞到荒謬的地步。

民主的民族主義一度曾引領人類前進。現在，它在東方殖民地國家中仍能扮演進步角色。但衰敗的法西斯的民族主義除了死亡，什麼也帶來。它不是在準備民族框架內準備安定經濟，而是在世界舞臺上的火山爆發和巨大的衝突。在近25-30年中在這部分中觀察到的一切，與這個日益迫近我們的地獄之音相比，就成了田園序曲。這一次事關的不是經濟的暫時降低，而是它的徹底粉碎和我們的整個文化的崩潰，如果勞動的、能思考的人類不能及時地掌握自己的生產力並在歐洲和世界規模上給予它以正確的組織的話。

原文譯自網上下載的Национализм и хозяйство，收入《托洛茨基文集》（1933-1934年），托洛茨基著，施用勤譯。

在自然科學和技術中運用數學的範例。有許多發明（阿基米德螺旋、用水中稱量的方法測定合金的成分、重物升揚系統、軍用投擲機等等）。為錫拉加紮人抗擊羅馬人設計了防禦工程。——譯注

Hongkongers Breaking Old Chains and Constructing a New Society Siu Dim

On the New Year Day of 2020, more than one million Hong Kong people defied violent threats from the authorities and demonstrated in the streets, continuing the mass mobilizations started from last June. The slogans of the resistance have changed from “Hongkongers Add Oil” to “Hongkongers Fight”, from breaking old chains to constructing a new society.

Hong Kong police has violently repressed the protests, particularly the brutal invasions in the campus of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U) and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oly U) in last November. On the day of confronting CU protesters, the police fired 4,693 ammunitions, including 2,330 tear gas; on the second day of surrounding Poly U, the police fired 7,647 ammunitions, including 3,293 tear gas. From June to November 2019, the police fired a total of 29,863 ammunitions. Up to 15 January 2020, the police arrested 7,019 protesters, of which 40% were students.

Hong Kong protesters, particularly the youths, were very brave in confronting police brutality. Their resistance drew a lot of atten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According to a survey in the United States, over half of the interviewees sympathized with the protesters. That pressured the US Congress and President Trump to pass th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the regime in Beijing then tried more covert repressive measures.

Beijing suddenly replaced the Director of the Liaison Offic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Hong Kong, showing their dissatisfaction with him. Yet under the theme of reinforcing overall rule, the policy of repression against the resistance remains unchanged. Even though Beijing intends to improve Hong Kong’s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it will not be effective due to vested interests. Moreover, the goals of the resistance are not about economic issues, but the political demands of withdrawal of extradition bill, and then of resisting the brutality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olice. The driving force of sustained resistance is humanistic sympathy and support towards the protesters on the frontline.

The mass resistance against repression has resulted in the breaking of old chains: breaking through political indifference and dependency, refusing the existing order, resisting the regime and the elite rule of vested interes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violent repression reveals the huge disparity in force between the police and the protesters. More protesters understand the heavy cost of armed struggle, and worse still, that it will not solve the problem. Thus, it becomes necessary to explore alternatives.

The turning point of the resistance, from marching on the streets to building people’s power in the society, is marked by the overwhelming victory of the pan-Democratic parties and the failure of pro-Beijing parties in the 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s on 24 November 2019, opening the way for organization in the society based on social and livelihood demands.

Meanwhile, a yellow economic circle, or ethical consumer circle, with the aim of reinforcing solidarity, has been in experiment soon after the resistance began. In recent months, there were long

queues along the so-called yellow shops. In addition, online yellow shops and collective purchasing are in practice. Some people withdrew money from banks which belongs to mainland capital or exchanged Hong Kong dollars with US dollars. The possibility of community currency is also put on the agenda. All that means people are using the identity of consumer to fight.

Traditionally, working class organize trade unions to fight against capitalists. On 5 August 2019, several hundred thousand students, workers, and merchants went on strike against the regime. The march on New Year Day was for the first time led by trade unions, symbolising efforts on building people's power via trade unions. Old and new trade unions work together to link political demands with workers' movements. At the end of 2019, the "Two Million Citizens' Joint Alliance for Strikes" has 49 trade unions, with 18 new or being formed,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members in the new trade unions exceeded 6000. By the end of January 2020, the number of applicants for Hospital Authority Employee Alliance alone has exceeded 15,000.

So far, Hongkongers have forged an identity of unity to fight the regime and are in the long and fluctuating process of trying to organize autonomous force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explore pluralism and democratic self-governance, and resist efforts by the regime and elites to divide the movement with propaganda for Hong Kong Independence or emphasis on the State.

It takes long and hard work to construct a new society that is based on conscience and fraternity instead of cut-throat competition, that respects life over profits, shows social justice with rule of law for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nd achieves equality, overcoming discriminations based on gender, age, race, religion, culture, education, and others. Due to the lack of a clear vision and path, the resistance has to learn lessons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resistances world-wide, in order to fight for a better future.

The Arab Spring of 2011 inspired a new wave of global resistances. In 2019, there were widespread resistances and struggles. While crises of capitalism deepen, more and more people, particularly the young, are rising up to fight against corrupt regimes, economic crises, global warming, among others. The Rojava experience is especially worth studying. Since the outbreak of civil war in Syria in 2011, Rojava has strived to be an autonomous movement. It forges alliance among Kurds, Arabs, and other peoples. While organizing "People's Defense Force" and "Women's Defense Force" against invasion, Rojava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local autonomy, women's liberation, and ethnical co-existence and harmony, as well as implementing different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based on cooperatives.

Looking back at recent years of resistance in Hong Kong, we find that the Umbrella Movement of 2014 was suppressed but it triggered the valiant resistance in the Fish-ball Revolt in 2016. Since 2019, there are large-scale mass movements against the regime, with the unity of the valiants and non-violent protestors. After experiencing the limits of resisting the brutal regime on the streets, the movement has begun exploring alternative ways of building more deep-rooted and long-lasting people's power in the society, from breaking old chains to constructing a new society. While having ups and downs, it is evolving as an important experiment of grassroots people's struggles for autonomy.

31 January 2020

Hong Kong

- 2 Hongkongers Breaking Old Chains and Constructing a New Society.....Siu Dim
8 Power to the People, Practice of Local Democracy – Proposal for Local Council Reform (Reprint).....League of Social Democrats

China

- 9 COVID-19: Reflections on Neoliberalism and Ecological Rupture.....Qing Yan

International

- 12 The Politics of Climate Looting.....Adam Dylan Hefty
17 The Left and Right in Latin America Today: An Interview with Claudio KatzClaudio Katz, Jeffery R Webber
25 Desperately Seeking Socialism.....Ilya Budraitskis, Gideon Levy
30 Hugo Blanco: The Future is Indigenous.....Ted Hamilton
33 Hugo Blanco: From Trotskyism to Indigenous Vitality.....Andrew Ryder

History

- 35 A Talk on Wang Shiwei and “The Question of Wang Shiwei” (Reprint)Wang Fanxi
45 The Unjust Case of Wang Shiwei Not Yet Rehabilitated (Reprint).....Pei Yiran

Theory

- 48 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Life (4 January 1934).....Leon Trotsky

Article in English

- 53 Hongkongers Breaking Old Chains and Constructing a New Society.....Siu Dim

香港

- 2 香港人抗爭的破與立.....小點
8 權力歸於人民 實踐地區民主-區議會改革芻議 (轉載).....社會民主連線

中國

- 9 新冠肺炎：再次反思新自由主義與生態斷裂.....青岩

國際

- 12 氣候搶劫的政治.....亞當·狄倫·赫夫蒂
17 今日拉美之左派和右派：克勞迪奧·卡茨訪談.....勞迪奧·卡茨、傑佛瑞·韋伯
25 竭力尋求社會主義.....吉迪恩·利維、伊利亞·布德拉伊茨基斯
30 爾果·布蘭科：未來屬於土著.....特德·漢密爾頓
33 爾果·布蘭科：從信奉托洛茨基主義到追尋土著力量.....安德魯·萊德

歷史

- 35 談王實味與「王實味問題」(轉載)王凡西
45 王實味冤案未徹底平反 (轉載)裴毅然

理論

- 48 民族主義和經濟 (1934年1月4日)列·托洛茨基

英譯

- 53 Hongkongers Breaking Old Chains and Constructing a New Society.....Siu Dim